

申报	系列：教师系列
	教学科研并重型
	专业：应用经济学
	职称：副教授

业绩成果材料

（申报人的业绩成果材料包括论文、科研项目、获奖以及其他成果等）

单 位（二级单位） 经济管理学院

姓 名 胡浩钰

材料核对人：

单位盖章：

核对时间：

华南农业大学制

目 录

一、科研项目

- 1.1 主持：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立项通知及有关佐证材料..... 1
- 1.2 主持：关于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立项通知及有关佐证材料..... 67
- 1.3 主参：关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通知及有关佐证材料..... 83

二、论文、著作等

- 2.1 检索证明..... 85
- 2.2 以第一作者发表本专业论文情况
- 2.2.1 Impact of city size on self-employ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ese migrants..... 87

三、其他业绩

- 3.1 指导学生学科竞赛
- 3.1.1 正大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本科组总决赛“国家三等奖”..... 103
- 3.2 社会服务
- 3.2.1 资政报告《关于以电竞产业为新引擎推动我省“赛事经济—城市消费”融合发展的建议》获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智和副省长张少康同志批示证明 105
- 3.2.2 资政报告《中美“对等港口费用”政策对中国造船业的冲击与应对》获广东省人民政府综合采纳证明 119
- 3.2.3 资政报告《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力“百千万工程”》获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劲军，副省长

张少康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雅红同志批示证明 133

**【佐证材料切记与目录页所列页码对应, 不要用图片格式的材料
进行打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通知

（包干制项目）

胡浩钰 先生/女士：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相关项目管理办法规定和专家评审意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资助您申请的项目。项目批准号：72504094，项目名称：代际差异视角下生育政策调整的福利效应及保障策略研究，资助经费：30.00万元，项目起止年月：2026年01月至2028年12月，有关项目的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附后。

请您尽快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grants.nsfc.gov.cn>），**认真阅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填报说明》并按要求填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对于有修改意见的项目，请您按修改意见及时调整计划书相关内容；如您对修改意见有异议，须在电子版计划书报送截止日期前向相关科学处提出。

请您将电子版计划书通过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grants.nsfc.gov.cn>）提交，由依托单位审核后提交至自然科学基金委。自然科学基金委审核未通过者，将退回的电子版计划书修改后再行提交；审核通过者，打印纸质版计划书（一式两份，双面打印）并在项目负责人承诺栏签字，由依托单位在承诺栏加盖依托单位公章，且将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订在其中一份计划书之后，一并报送至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纸质版计划书应当保证与审核通过的电子版计划书内容一致。**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对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进行审核，对存在问题的，允许依托单位进行一次修改或补齐。**

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电子版计划书、报送纸质版计划书并补交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截止时间节点如下：

1. **2025年9月5日16点**：提交电子版计划书的截止时间；
2. **2025年9月12日16点**：提交修改后电子版计划书的截止时间；
3. **2025年9月23日**：报送纸质版计划书（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包含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的截止时间。
4. **2025年10月9日**：报送修改后的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的截止时间。

请按照以上规定及时提交电子版计划书，并报送纸质版计划书和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逾期不报计划书或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且未说明理由的，视为自动放弃接受资助；未按要求修改或逾期提交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者，将视情况给予暂缓拨付经费等处理。

附件：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25年8月27日



申请代码	G0410
接收部门	
收件日期	
接收编号	72500403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申 请 书

(2025 版)

资助类别: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类) [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亚类说明:			
附注说明:			
项目名称:	代际差异视角下生育政策调整的福利效应及保障策略研究		
申 请 人:	胡浩钰	BRID:	00377.00.66350
办公电话:	18975277160		
依托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483号		
邮政编码:	510642	单位电话:	020-85280070
电子邮箱:	aaronhhy@scau.edu.cn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基本信息

申请人信息	姓名	胡浩钰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民族	
	学位	博士	职称	讲师				
	是否在站博士后	否			电子邮箱			
	办公电话				国别或地区	中国		
	申请人类别	依托单位全职						
	工作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研究领域	养老保障；生育政策评估						
依托单位信息	名称	华南农业大学						
	联系人	唐家林			电子邮箱	kyc.jhk@scau.edu.cn		
	电话	020-85280070			网站地址	http://kjc.scau.edu.cn/		
合作研究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代际差异视角下生育政策调整的福利效应及保障策略研究						
	英文名称	Research on the welfare impacts and protective strategies of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s through an intergenerational lens						
	资助类别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亚类说明		
	附注说明							
	申请代码	G0410. 社会治理与社会保障						
	研究期限	2026年01月01日 -- 2028年12月31日				研究方向：养老保障		
	申请直接费用	30.0000万元						
	研究属性	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						
中文关键词		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生育政策调整；综合福利状况；代际差异；生育支持						
英文关键词		Social pension security system;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 Comprehensive welfare statu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Fertility support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With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f overlapping care needs for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it is crucial to expedite the development of a robust system for basic elderly care and child-rearing services. This project leverages the Chinese Household Multidimensional Welfare Databas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s on the welfare levels of both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elderly parents from an inter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The content includes four key aspects. First, by leveraging the capability framework, we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welfare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to classify and elucidate the full spectrum of changes in the welfare levels of both generations before and after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s. Second, given that having three children is currently an improbable choice for most families, the study primarily uses the two-child policy as a reference to identify the impact of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s on the welfare levels of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elderly parents. It further dissect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ital stability, labor market outcome,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hird, based on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 welfare levels of both generations under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s, the study explore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o better support offspring's fertility and improve elderly care security for parents. Fourth, by integrating case studies and interview data, the study ultimately develops a set of replicable protection models and optimized policy solutions. This project has substantially enriched the research landscape on fertility policy relaxation, providing critical insights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a fertility-friendly societ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a high-quality elderly care security system.



报告正文

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内容翔实、清晰，层次分明，标题突出。
请勿删除或改动下述提纲标题及括号中的文字。

（一）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建议 8000 字以内）：

1. 项目的立项依据（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需结合科学研究发展趋势来论述科学意义；或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来论述其应用前景。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个体福利提升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迈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保障政策密集出台，中国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共建共享共富、尊重和保障人民权益、全面小康”的公共政策理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被确定为新时代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目标之一。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就是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凸显了深入研究福利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也为后续出台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奠定坚实基础。

生育和福利的关系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例如当生育收益外溢时，通常会增进他人或社会的福利。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随着出生率不断下滑和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见图1），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势必将面临严峻挑战。出于应对低生育困境和人口结构老化的需要，社会上鼓励多孩生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时代需要和民众呼声的双重驱动下，中央政府加快了生育政策调整步伐，自2013年起相继出台以放松生育管控为核心的“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2021年又进一步实施“全面三孩”政策。当下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引发学者们的热议，有研究表明其可能对不同人群产生差异化影响。具体地，围绕子代来看，虽然政策放宽促成生育堆积效应短期内得以释放（葛润和施新政，2023；杜永潇和董浩，2024；Lei et al., 2025），但也衍生出劳动参与率和收入水平下滑（黄乾和晋晓飞，2022；Wu, 2022；Liu et al., 2024；Chen and Tian, 2025），性别工资差距扩大等问题（Zhao et al., 2023；Huang et al., 2024）。对父代而言，“全面二孩”政策抑制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长之余，同样大幅提升了个人



幸福感,尤其是在孙辈临近出生的关键时期(Di Gessa et al., 2020; 程广帅, 2024)。可见,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很可能存在代际差异。聚焦到个体福利方面,现如今代际福利差异在中国也备受关注。一方面,其与传统孝养伦理维护、阶层固化、健康不平等现象加剧等息息相关(张苏和王婕, 2015; 王博贤等, 2023; 方迎风等, 2024); 另一方面父代照料孙辈与子代行孝表现也直观地反映了家庭代际关系的好坏(王海漪, 2021)。在此情形下,当前子代和父代的福利状况到底如何?面对一老一小照护需求叠加的新图景,生育政策调整将会如何影响两代人的福利水平?在生育政策不断放松的制度环境下,现行的生育支持手段和社会保障措施能否对两代人的福利水平产生增进效应?为了更好地回应子代不敢生、养不起,以及父代养老资源可能面临稀释挤占的现象,今后又该如何逐步健全福利保障措施?这一系列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成为本项目格外关注的现实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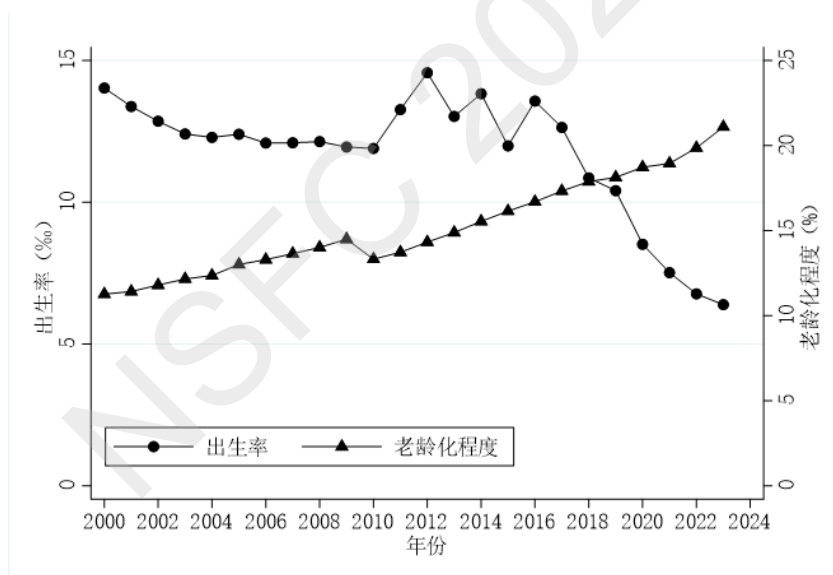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23年中国出生率和老龄化程度变化趋势

注: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福利经济学派诞生后,众多学者分别选取效用、偏好和幸福感等主观指标以及收入、消费和财富等客观指标测度福利水平。阿马蒂亚·森于1992年提出可行能力理论,强调个体福利可以通过对功能性活动、能力与自由的评价来实现,由此推动学术界将福利的分析视角逐渐从宏观转向微观层面。与此同时,受制于中国福利保障制度不够完善,个体福利状况也引发学者们的关注(Wang et al., 2020; Li et al., 2022; 孙三百和洪俊杰, 2022; 翁辰等, 2023)。进一步区分



子代和父代后发现，现有文献大多只围绕收入贫困和主观福利这两个单一维度进行分析（解垚，2020；朱莉等，2024），而缺乏从综合福利的角度挖掘相关特征事实，造成难以对个体福利水平形成整体把握。显然，全面准确地测量两代人的综合福利状况，并捕捉生育政策调整前后的福利动态变化，将会给现阶段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健全养老保障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本项目将

生育政策调整后，目标人群的生育意愿更有可能转化成生育行为（Lei et al., 2025），由此带来的**孩子数量变动将促使家庭资源配置发生变化**。那么对两代人的福利水平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现有研究存在理论分歧。在子代方面，**一种观点**认为生育政策调整可能造成福利受损，例如就业机会减少、收入水平下滑、性别工资差距扩大（黄乾和晋晓飞，2022；Wu, 2022；Zhao et al., 2023；Liu et al., 2024；Chen and Tian, 2025）；**另一种观点**指出生育政策调整不仅不会抑制女性劳动参与，还可能激励育龄夫妇外出务工，以及提升婚姻稳定性（王安邦等，2022；彭争呈等，2023；Tong and Zheng, 2024）。对于父代来说，**多数学者认为**随着低龄孙辈的数量增加，祖父母育儿有助于降低孤独感和减缓认知功能衰退（Zhang et al., 2022；Caputo et al., 2024），获取更多赡养费用与保持亲子关系和谐（于也雯和龚六堂，2021；Choi et al., 2021）；**少量文献发现**照料孙辈也可能挤占父代劳动供给（Bertogg, 2023；Chen and Lyu, 2025），引发幸福感和健康状况变差（余靖雯等，2023；Glaser and Di Gessa, 2025）。此外，还有学者证实较多的低龄孙辈同样会稀释父代获取的情感支持（刘慧君和王惠，2022）。

在长期少子化和加速老龄化的现实背景下，随着生育政策不断放松，大多数家庭都将面临一老一小双重照护压力（钟晓慧和彭铭刚，2022）。为此，中国于2021年9月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推动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落实好社会保障“保基本”作用的同时，进一步把托育服务当成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将有助于弥补托育服务短板，破解托育服务难题，以及减轻家庭照护忧虑。围绕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对个体福利的影响来看：一方面，两者直接作



用于子代和父代，不仅促使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取得显著提升，还降低了祖母患慢性病和抑郁症的概率（Lin and Wang, 2019; Wood and Neels, 2019; 江涛, 2021; 陈梅等, 2023）。另一方面，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也存在调节效应，它们既有助于强化社会养老预期，又便于获取更多就业机会（张川川等, 2017; 石智雷和王璋, 2023; Fang and Miao, 2024）。作为子代生育支持和父代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基石，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能否在两代人的福利提升中发挥更大作用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深化托育与养老服务改革，制定促进生育和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政策。立足于评估现有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有效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炼子代和父代福利保障的优秀做法与实践经验，并探索出可推广的保障模式及政策优化方案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国务院《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中虽然明确了生育支持和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与基本方案，但各地仍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出台保障细则。从现实层面看：第一，**多层次保障体系**上，针对子代不敢生、养不起的顾虑，如何具体落实普惠托育、生育补贴、育儿假、弹性工作制等生育支持措施；围绕父代在经济福利、生活照料以及身心健康上出现的痛点和难点，怎样稳步有序的确保解决方案落地见效。第二，**多维度保障类型**上，着眼于那些幼儿较多的成年子女，抑或高龄、伤残和贫困的老年父母，又该如何健全长效帮扶机制，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目标。

结合以上论述，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分别概括如下：

项目组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成果，**挖掘并提炼出个体福利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地，基于可行能力框架，分类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进行福利测度，为揭示子代和父代的福利水平**提供工具与方法**。项目将具体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等微观数据，刻画出目标人群及其老年父母福利水平的特征事实，捕捉生育政策调整前后的动态变化，继而给现阶段如何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健全养老保障体系带来理论依据。同时，结合中国面临的低生育困境与人口老龄化挑战，其实践经验或许还可同面临相似情景的发达经济体（韩国、日本等）展开国际比较。

近年来，虽然部分学者探讨了放松生育管控对子代收入、劳动参与以及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王安邦等，2022；Wu，2022；Zhao et al.，2023；Huang et al.，2024；Chen and Tian，2025），但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育儿成本上升、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的背景中，**新型4-2-2或4-2-3家庭结构**会进一步稀释父代原有养老资源，导致家庭内部“资源竞争”加剧的问题。因此，从代际差异视角考察生育政策调整的福利效应，将为理解近年来两代人福利水平的变化提供完整图景。内在机制方面，目前盛行两种典型观点。就子代而言，一种观点基于生育惩罚的视角，认为多生孩子将造成个人在收入等方面出现福利损失；另一种观点指出较多的孩子不仅能提升婚姻稳定性和幸福感，还可以显著改善健康状况。**针对父代来说**，一方面祖父母育儿能增进经济与健康福利；另一方面，受资源稀释或代际竞争增大的影响，较多的低龄孙辈也会对收到的关爱陪伴形成一定挤占。上述两种观点都能逻辑自洽并且得到了已有文献的支持。因此，本项目将分别围绕子代婚姻稳定性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父代隔代照料与代际支持的角度，进一步厘清生育孩子与养育孙辈的成本-收益，从而丰富生育政策调整影响两代人福利的研究成果。

公共政策与社会力量作为改善目标人群及其老年父母福利状况的两大重要支柱，在构建生育支持和高质量养老保障体系过程中迫切需要两者发挥协同作用。显然，同时从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两个供给端入手，扎实推进育龄女性生育支持和老年人群服务保障一体化建设工作，对于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妥善应对一老一小照护需求叠加的压力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项目结合生育政策不断放松的制度环境，系统评估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对子代和父代的福利增进效应后，收集分析局部地区在生育支持与老年福祉提升方面的**典型案例和访谈资料**，梳理具体保障措施，提炼实践经验，进而从**多层次保障体系、多维度保障类型**两方面探索出可推广的保障模式及政策优化方



案。基于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的角度，本项目有望为当下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健全高质量养老保障体系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

鉴于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完善社会保障和促进生育的政策，项目组**对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目标人群及其老年父母福利水平的测度与成因揭示，将为分析掌握社会福利水平的趋势性变动提供全新视角**。具体地，通过揭示放松生育管控引发的代际福利差异现象，本项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目前“一刀切”政策的盲目性与随意性，切实提高增进福利方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以及探索出协同推进生育支持和高质量养老保障体系的长效机制。同时，基于生育政策调整影响两代人福利水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也有助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更好地理解出台一项公共政策对于提升民众认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影响，从而为其构建差异化、针对性的治理政策体系带来有益的施政参考。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本项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拟重点考察生育政策调整对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因而与之联系紧密的文献主要涉及“个体福利的测度与评价”、“生育行为对子代福利的影响”、“孙辈出生对父代福利的影响”、“生育政策及其调整对个体福利的影响”、“生育政策调整的配套性支持策略”等内容在国际和国内的研究进展。在这个部分，项目组将系统回顾现有文献，明晰理论演进脉络，继而通过对文献的分析、综合与借鉴形成本项目可能的边际贡献。

1.2.1 个体福利的测度与评价

就个体福利的测度方法而言，目前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学术界主要盛行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功利主义效用论**，代表性人物有庇古、马歇尔和穆勒等。他们主张通过效用来测量福利水平，将福利具体等同为幸福与快乐，视为欲望满足以及选择行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二是**客观主义学派**，费雪、希克斯以及德沃金等学者指出福利可通过衡量个体拥有物的数量进行测度，例如收入、财富和消费等。三是来自**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他将个体福利定义为一种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在具体测度过程中，由于能力难以被直接观测，可行能力通常概括为“人们可能实现的、有价值的、与生活相关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对个体可行能力进行评价，就是围绕个体能够实现的各项功能性活动展开测量，



主要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现阶段构建福利评价体系过程中，可行能力理论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认可，并且也逐步被推广开来。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过往文献中既有选择从单一或多维度视角进行简单统计描述，也有利用可行能力框架去尽可能全面揭示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群体的福利水平。具体地，学者们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选取合适的度量指标：**一是经济条件**，通常涵盖收入、消费和家庭资产等（贺雪峰，2019；Naidoo，2019；Suppa，2021；Li et al.，2022）。**二是发展空间**，包括工作稳定性、获取技能培训的机会等（Vick，2020；Hwang and Nam，2020；Nguyen，2021）。**三是权益保障**，分别从超时工作、孩子受教育权利、养老和医疗保障等角度入手（Strotmann and Volkert，2018；Sehnbruch et al.，2020；孙三百和洪俊杰，2022；翁辰等，2023）。**四是生活水平**，例如住房数量、住房产权、饮食质量、取水便利、清洁能源使用等（Wang et al.，2020；Amarante and Colacce，2022；欧阳鑫和张应良，2023；Omri et al.，2025）。**五是主观福利与健康状态**，主要涉及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以及身心健康等（解垚，2017；Zhang et al.，2021；王武林等，2021；Chen and Leu，2022）。

总体来看，在中国，无论是劳动年龄人口还是老年群体，他们目前的福利水平都呈现上升趋势（李路路和王元超，2020；Wang et al.，2020；沈扬扬等，2022；张文娟和付敏，2022）。究其原因，可能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强有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陈飞等，2022）、易地扶贫搬迁和社会保障政策（张川川等，2017；刘明月等，2022；欧阳鑫和张应良，2023）、代际支持（Yuan et al.，2021；吴帆，2022）、居住环境与社会资本（Liu et al.，2022；黄谦等，2024）等。当然，也不乏有部分学者指出某些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现阶段并未取得预期的改善效果或仍旧面临较大的福利损失风险，即**相对剥夺现象**依旧存在，例如领取低保人群、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女性/高龄/独居/受教育程度偏低的老年人等（Qi and Wu，2018；焦娜和郭其友，2021；张文娟和付敏，2022；王亚军等，2023；Zhang et al.，2023）。

1.2.2 生育行为对子代福利的影响

在探究生育孩子与子代福利的关系上，生育惩罚是一个经典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简言之，若为人父母后导致母亲的工资收入、工作时长和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而父亲并未受到明显影响，那么这一特征事实通常被称作“生育惩



罚”或“母职惩罚”现象（Healy and Heissel, 2022）。

近年来，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为生育惩罚现象存在提供了有力佐证。具体来说，Lundborg et al.（2017）使用接受体外受精作为反映女性生育的外生变化指标，从收入视角证实生育给丹麦女性的职业生涯带来严重后果。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数据，Shen（2022）也证实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生育小孩都会显著降低女性工资，并且这种影响的严重程度正在持续上升。在劳动参与方面，Zhou et al.（2022）和Huang et al.（2025）相继依托1982-2015年的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与伪事件研究方法，同样发现生育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了巨大且持续的负面影响，例如三分之一的职场女性在生育头胎的当年离开劳动力市场，8年以后她们的劳动参与率仍低于孕前水平。类似地，这种“惩罚”还表现在夫妻之间性别收入差距扩大（Kleven et al., 2019; Bergsvik et al., 2020）、女性升职概率降低和职业权威受到削弱（Lucifora et al., 2021; Glauber, 2023）、母亲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大幅提升等方面（Berniell et al., 2023）。

针对生育惩罚现象发生的原因：第一种解释是短期内可以归因于女性工作时间减少，而长期趋势的形成则与女性集中在较低层级的工作岗位有关（Chen et al., 2021）。第二种解释认为扮演父母角色后可能带给母亲的身心压力更大，从而限制了她们的工作能力（Healy and Heissel, 2022）。第三种解释指出上述现象也许是受到家庭内部分工和配偶观念保守影响的结果（Lebedinski et al., 2023）。

与此同时，其他学者则探讨了生育孩子给成年子女婚姻稳定性、健康状况和幸福感等方面带来的有利影响。例如，Markussen and Strom（2022）将流产作为生育的外生冲击，得出当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出生后，挪威夫妻之间的婚姻稳定性将会得到显著提升。在中国，通过考察生育对父母心理健康与认知功能的影响，Chen and Sun（2022）证实拥有一个儿子不仅会改善母亲的心理健康，还能够提升父亲的数学成绩和记忆能力。与之类似，张震和马茜（2024）以CFPS 2010-2018年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详细考察了生育事件发生前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变化轨迹，结果表明生育事件对个人幸福感提升具有积极的预期收益，且在事件发生的当年达到顶峰。

1.2.3 孙辈出生对父代福利的影响

孙辈出生，标志着祖父母身份正式确立。作为老年生活中最充实的角色之



一，祖孙之间进行资源交换和代际互动的广度、深度等都可能对父代的福利水平产生较大影响。然而详细梳理现有文献后发现，囿于研究背景、数据来源、指标选取和模型设定等方面的差异，学术界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看法。

第一支文献认为孙辈的存在尽管能使祖父母的角色得到强化，但随着角色超负荷与角色冲突加剧，其对老年劳动供给、性别收入差距和心理福利等更多表现出负面影响。具体而言，Rupert and Zanella（2018）证实与未成为祖母的同龄人相比，孙辈的出现会造成处于工作年龄阶段的美国祖母的劳动时间减少约30%。利用欧洲地区的数据，Backhaus and Barslund（2021）和Frimmel et al.（2022）也相继揭示出祖父母身份对女性就业产生了负面冲击。类似地，Malisa（2024）和Bolano and Bernardi（2024）发现第一个孙子出生不仅会提高祖父母的退休概率，甚至还可能引发提前退休现象。在性别收入差距上，Gortz et al.（2025）考察了丹麦祖父母在第一个孙子出生前后的劳动力市场轨迹，结果显示在全职就业减少的驱动下，孙辈出生后五年和十年，他们的性别收入差距分别扩大了3.8%和10.1%。从心理福利来看，较多的低龄孙辈既降低了祖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也会导致抑郁程度加重（刘慧君和王惠，2022；Leimer and van Ewijk, 2022；Yamamura and Brunello, 2023）。

第二支文献则指出祖父母身份的转变能够增加代际互动和亲密程度，继而有助于改善自身的福利状况。选取欧洲地区年龄在50岁以上的祖父母作为研究对象，Di Gessa et al.（2020）得出首次当祖母能显著提升个人幸福感，并且这种积极效应在孙辈出生时间临近阶段尤其强烈。Brown et al.（2021）对50岁以上美国人的离婚现象进行考察发现，一旦身份转变成亲生祖父母，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出“制动效果”，从而阻止离婚事件发生。基于比利时的人口登记数据，Rutigliano et al.（2023）也探讨了孙辈出生对祖母居住安排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成年女儿最小的孩子超过2.5岁时，祖母更有可能迁往成年女儿所在城市生活。最后一支文献表明孙辈出生与祖父母福利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以健康维度为例，Sheppard and Monden（2019）指出首次当祖父母，虽然能降低女性发生抑郁的概率，但缺乏显著影响主观预期寿命的证据。Wu et al.（2023）证实祖母身份转变在加剧身体机能衰退的同时，也能确保其保持较高的生活满意度。Yang（2022）则揭示出祖父母身份转变对个人抑郁的影响存在跨国差异，即在低收入国家可能产生积极效应，而高收入国家恰好相反。

1.2.4 生育政策及其调整对个体福利的影响



在数量-质量权衡假说的驱动下，国内外学者已经围绕生育政策与子代福利的关系展开大量研究，但目前得到的结论存在一定分歧。具体来看，在健康方面，Wu and Li（2012）认为当独生子女政策限制家庭可拥有的孩子数量后，随着分配给母亲的资源增多，她们得以提升卡路里摄入量，继而降低体重过轻和出现低血压的概率。从生命周期结果来看，利用超生罚款额的省份-时间变化，Huang et al.（2021）发现那些年轻时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更大的人群，不仅人力资本水平更高，能够获取到更多从事白领工作的机会，还有助于增强女性的平权意识。与之相反，Cao（2019）通过考察“一孩半”政策对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证实其造成该群体的劳动参与率降低4.6个百分点，周工作时长缩短1.4小时，月收入减少54.5元。依托一个内嵌代际支持和人力资本积累的生命周期模型，并结合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展开分析，Choukhmane et al.（2023）也得出独生子女政策同样削弱了成年子女的代际赡养预期，从而使得他们的总储蓄增加30%。

聚焦到老年福利方面，现有文献基本认为生育政策造成了福利损失。例如，刘生龙等（2020）强调与多子女老人相比，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由于收入水平低、身体状况差，普遍流露出消极情绪和较低的幸福感和获得感。Chen and Fang（2021）评估“晚稀少”政策的长期影响后发现，其导致老年人在抑郁等心理健康维度上的表现尤其糟糕。Guo et al.（2022）构造一个反事实实验预测了独生子女政策对代际同居的影响，结果表明若中国所有家庭未来都只有一个成年子女时，他们与父母同居的概率将会大幅下降，并且这种降幅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中格外突出。潘嗣同和史清华（2023）考察独生子女政策与农村居民养老决策的因果关系后得出，受男性子嗣拥有率更低等原因的影响，他们被迫从依靠家庭养老转向社会养老模式。

为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国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十年间进行了大幅调整。这不仅意味着家庭结构和规模发生变化，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换言之，“4-2-2”或“4-2-3”式家庭通常需要同时赡养多位老人、抚育多位低龄幼儿，所以难免造成家庭在养老资源和育幼资源的配置上面临严峻挑战（刘慧君和王惠，2022）。当前，已有部分学者分别从就业、收入、性别不平等和婚姻满意度等视角切入，探究了新形势下生育政策调整对子代福利的影响。就“单独二孩”政策而言，王安邦等（2022）发现其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是否选择外出务工具有显著促进效应。黄乾和晋晓飞（2022）、Zhao



et al. (2023) 则指出“单独二孩”政策的推行，不仅显著降低了城镇女性的月收入和小时收入，还减少了女性移民的就业机会，以及造成移民的性别工资差距扩大。从“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效应看，利用该政策作为生育的外生变化，Wu (2022) 证实孩子数量在广延和集约边际上都对母亲劳动供给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类似地，Liu et al. (2024) 采取广义罗伊模型得到的政策处理效应也显示，当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农村女性每周的劳动时间将会减少7.5-12.3小时。Tong and Zheng (2024) 指出生育政策发生调整后，希望拥有多个孩子的男性会提升婚姻满意度。最后，Huang et al. (2024) 和Chen and Tian (2025) 分别考察了“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收入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所得结论也为政策实施后可能造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加剧提供佐证。

与此同时，随着“恩往下流”正演变为中国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趋势之一，这种下位优先型分配模式势必造成父代面临赡养资源供给不足、老人福祉降低的现象更加突出（狄金华和郑丹丹，2016；钟晓慧和彭铭刚，2022）。在生育政策不断放松的制度环境下，现阶段正有一批家庭陆续新增一个或两个幼龄成员，推动着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模式发生新变化。那么此情形背后老年父母原有的福利水平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目前仅有极少数的文献试图做出回应。例如，程广帅（2024）选取CFPS2014年和2018年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运用因果推断方法揭示出“全面二孩”政策不仅造成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下滑17.8%，还可能致使他们的周工作时间削减16.72小时。

1.2.5 生育政策调整的配套性支持策略

中国逐步调整生育政策，正式标志着子代在生育意愿转化成生育行为过程中不再面临严格的政策约束（Lei et al., 2025）。然而，即便在普婚普育等传统价值观仍占据主流的今天，日渐宽松的生育政策并未促使生育率持续回升，政策预期目标与实际生育水平之间依旧存在鸿沟（黄乾和晋晓飞，2022；石智雷等，2024）。梳理文献后发现，除了受到育龄女性规模锐减、婚育年龄延迟、生育意愿下降、二孩家庭基数较小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外，还有学者证实，家庭能否承受住与生育-养育-教育相关的经济成本也是当前响应政策号召，做出多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前提（杜永潇和董浩，2024）。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分别从托育服务供给、带薪产假、育儿假、生育补贴以及工作-家庭平衡计划等方面入手逐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旨在减轻家庭育儿的总成本，确保孩子“生得出、养得起、教得好”（黄乾和范子昂，2023；



石智雷和滕聪波，2023；石智雷等，2024）。聚焦于托育服务上，近年来陆续有学者重点论证了托育服务对子代生育决策，以及两代人福利水平的影响。具体地，Wood and Neels（2019）发现正规托育服务可及性提升能够激励比利时的双职工夫妇生育小孩。江涛（2021）和陈梅等（2023）指出公共托育服务缓和了工作-养育的时间冲突，因而不仅会促使生育数量增加，还可能显著提升二孩生育意愿。在福利效应方面，利用来自日本、墨西哥和中国的数据，Zhang and Managi（2021）、Marcos（2023）、石智雷和王璋（2023）也相继证实了公共托育服务对母亲就业行为的刺激效应，她们既提升了就业概率，也相应延长了工作时间。对于老年父母而言，Lin and Wang（2019）强调当正规托幼机构覆盖率较高时，不仅会促进祖母积极就业，还可以缓解其患慢性病和抑郁症的风险，其中经济条件较好、文化程度较高以及生活在城市的祖母获益更大。类似地，Fang and Miao（2024）也发现托育服务给农村地区同住祖母从事非农就业活动带来便利。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和高龄化并存的现象日益突出，**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性作用也引发众多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除了常规的养老、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障外，政府还会面向产妇、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等人群提供一些特殊的社会保障项目进行补偿，例如产假、税费减免、生育津贴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等（袁涛，2024）。有学者考察带薪产假延长对女性移民的影响后得出，该政策虽然有助于提升二孩生育意愿，但也造成了失业风险加剧，因而容易引发新的福利不平等现象（石智雷和王璋，2024）。针对老年父母，周广肃等（2020）证实以“新农保”为代表的社会养老保险不仅可以促使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生活得到较好保障，而且有助于降低消费不平等、缩小消费差距。郭瑜和张寅凯（2021）发现较高的养老金数额显著增强了城市老年人的自养能力与经济独立性，推动他们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和非家人护理。各级政府围绕生育、养老、医疗、住房以及社会救助等方面持续完善子代和父代的支持与保障策略，尤其发挥好祖父母在育儿环节的重要作用，短期内能帮助目标人群妥善应对工作-家庭冲突，长期来看亦有助于推动中国尽快走出低生育困境（Wang and Zhao, 2022; Pinto, 2023; 何文炯, 2024）。

1.2.6 文献评述与进一步拓展空间

梳理现有文献后发现，**个体福利问题已经引发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Naidoo, 2019; Wang et al., 2020; Li et al., 2022; 张文娟和付敏, 2022; 翁



辰等，2023）。然而，在利用可行能力框架测度个体福利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聚焦于美国、德国和韩国等地（Vick et al., 2020; Hwang and Nam, 2020; Suppa, 2021），对于少量选用中国作为分析背景的成果，学者们也主要关注的是贫困人口（王武林等，2021; Li et al., 2022; 翁辰等，2023）。Wang et al. (2020)、孙三百和洪俊杰（2022）虽然探讨了中国普通居民的福利水平，但他们在功能性活动的指标选取上比较主观，同时测度过程中也只采用了一种加总形式，这不仅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结果的科学性与严谨性，还很难对之后得到的福利评价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可见，对中国放松生育管控前后目标人群及其老年父母福利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仍需进一步探索。

其次，针对生育孩子、祖父母身份转变将会如何影响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的关系，现有研究暂未达成共识。理论层面上，就子代而言，这很大程度上与生育惩罚和生育收益的相对大小有关；聚焦于父代的福利表现，则可能是角色扩张与角色压力、家庭资源稀释与代际竞争增大等多种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下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为此，有必要继续厘清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机理，从而给实证考察放松生育管控对两代人福利水平的影响方向、具体效应和作用机制等提供分析依据。

最后，现有生育政策及其调整影响个体福利的研究大多围绕子代展开，而对于父代或许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在家庭结构发生新变化的情形下，随着托育服务和儿童教育费用不断攀升，老年父母极容易在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环节处于劣势地位，高度关注此类人群的福利保障问题刻不容缓。与此同时，针对生育政策调整下成年子女不敢生、养不起的问题以及祖父母育儿日益普遍的现象，已有学者尽管初步探讨了生育支持的发展方向，但现阶段围绕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系统剖析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如何推进两代人福利保障体系建设仍不够明确，有待进一步地科学论证。



主要参考文献:

- [1] 陈梅, 张梦哲, 石智雷. 公共托幼服务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23, 23(6): 2280-2296.
- [2] 杜永潇, 董浩.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与家庭生育响应——基于社会分层视角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24, 39(1): 64-86+227-228.
- [3] 方迎风, 刘浩然, 张芬. 中国健康的代际流动性[J]. 中国软科学, 2024, (3): 188-200.
- [4] 葛润, 施新政. 全面二孩政策如何影响家庭生育决策?[J]. 经济学(季刊), 2023, 23(4): 1392-1407.
- [5] 郭瑜, 张寅凯. 代际关系、养老保险与中国城镇养老新图景[J]. 社会学研究, 2021, 36(2): 160-180+229.
- [6] 黄乾, 范子昂. 生育支持政策提升了女性生育意愿吗?——基于企业—员工匹配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23, 37(5): 18-34.
- [7] 黄乾, 晋晓飞. 生育政策放松对中国城镇女性收入的影响[J]. 人口研究, 2022, 46(6): 103-116.
- [8] 江涛. 幼儿园供给扩张能提高生育吗?——来自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财经研究, 2021, 47(8): 94-108.
- [9] 焦娜, 郭其友. 多维剥夺视角下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的识别与治理[J]. 中国人口科学, 2021, (3): 82-97+128.
- [10] 李路路, 王元超. 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 总体倾向和影响机制(2005—2015)[J]. 开放时代, 2020, (6): 129-146+9.
- [11] 刘慧君, 王惠. 三孩政策下低龄孙子女数量对祖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作用[J]. 人口学刊, 2022, 44(2): 57-71.
- [12] 刘明月, 冯晓龙, 张崇尚, 仇焕广. 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与机制[J]. 中国农村观察, 2022, (5): 61-79.
- [13] 刘生龙, 胡鞍钢, 张晓明. 多子多福? 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精神状况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8): 69-84.



- [14] 欧阳鑫, 张应良.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差距与福利不平等[J]. 农业技术经济, 2023, (2): 78-93.
- [15] 潘嗣同, 史清华. 独生子女与养老决策:来自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J]. 中国软科学, 2023, (12): 80-89.
- [16] 彭争呈, 邹红, 宋泽. 多孩生育政策抑制了女性就业吗——基于单独二孩政策的研究[J]. 经济学动态, 2023, (1): 89-105.
- [17] 沈扬扬, 詹鹏, 周云波.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来自 CHIP 2013—2018 的证据[J]. 经济科学, 2022, (3): 35-49.
- [18] 石智雷, 王璋, 魏爽, 杨国超. 生育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与托底效应——来自生育补贴政策田野实验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24, 59(11): 175-191.
- [19] 石智雷, 王璋. 公共托幼服务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J]. 中国人口科学, 2023, 37(3): 51-67.
- [20] 石智雷, 王璋. 延长产假对流动女性“生育—失业”的影响基于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J]. 社会, 2024, 44(2): 213-242.
- [21] 孙三百, 洪俊杰. 城市规模与居民福利——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J]. 统计研究, 2022, 39(7): 114-124.
- [22] 汪伟, 杨嘉豪, 吴坤, 徐乐. 二孩政策对家庭二孩生育与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 CFPS 数据的考察[J]. 财经研究, 2020, 46(12): 79-93.
- [23] 王安邦, 何可, 张俊飏. 放开生育政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吗?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 (9): 82-99.
- [24] 王武林, 冯浩铭, 纪庚.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老年人养老保障水平及供给框架研究[J]. 人口研究, 2021, 45(5): 79-90.
- [25] 翁辰, 朱红根, 陈杰. Sen 的可行能力视角下扶贫资金的减贫效应研究[J]. 统计研究, 2023, 40(11): 108-122.
- [26] 解垚. 养老金与老年人口多维贫困和不平等研究——基于非强制养老保险城乡比较的视角[J]. 中国人口科学, 2017, (5): 62-73+127.
- [27] 解垚. 中国多维剥夺与收入贫困[J]. 中国人口科学, 2020, (6): 87-99+128.
- [28] 许玲丽, 陈彦琳. 生育决策、居住安排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2, 42(6): 1530-1543.
- [29] 于也雯, 龚六堂. 生育政策、生育率与家庭养老[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5): 38-56.
- [30] 余靖雯, 麦东仁, 龚六堂. 社会养老保险、家庭隔代抚养与老年人健康[J]. 经济学(季刊), 2023, 23(1): 108-124.
- [31] 袁涛. 低生育率、生育权益与生育权益保障——兼论积极保障理念下中国特色生育保障体系构建[J]. 社会保障评论, 2024, 8(4): 32-47.



- [32] 张川川, 李雅娴, 胡志安. 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预期和出生人口性别比[J]. 经济学(季刊), 2017, 16(2): 749-770.
- [33] 张苏, 王婕. 养老保险、孝养伦理与家庭福利代际帕累托改进[J]. 经济研究, 2015, 50(10): 147-162.
- [34] 张文娟, 付敏. 中国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及其变化趋势[J]. 人口研究, 2022, 46(4): 55-68.
- [35] 张震, 马茜. 生育的幸福效应——兼论其对低生育率的支撑[J]. 人口与经济, 2024, (2): 44-60.
- [36] 钟晓慧, 彭铭刚. 养老还是养小: 中国家庭照顾赤字下的代际分配[J]. 社会学研究, 2022, 37(4): 93-116+228.
- [37] 周广肃, 张玄逸, 贾坤, 张川川.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J]. 经济学(季刊), 2020, 19(4): 1467-1490.
- [38] 朱莉, 黄柏林, 刘呈军, 彭刚. 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研究[J]. 人口研究, 2024, 48(1): 118-132.
- [39] Amarante V, Colacce M.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mong older people in fiv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2, 159(3): 945-965.
- [40] Backhaus A, Barslund M. The effect of grandchildren on grandparental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Europ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21, 137: 103817.
- [41] Bergsvik J, Kitterod R H, Wiik K A. Parenthood and couples' relative earnings in Norway[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20, 36(2): 218-235.
- [42] Berniell I, Berniell L, de la Mata D, Edo M, Marchionni M. Motherhood and flexible jobs: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J]. World Development, 2023, 167: 106225.
- [43] Bertogg A. Needs or obligations? The influence of childcare infrastructure and support norms on grandparents' labour market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23, 33(1): 17-33.
- [44] Brown S L, Lin I, Mellencamp K A. Does the transition to grandparenthood deter gray divorce? A test of the braking hypothesis[J]. Social Forces, 2021, 99(3): 1209-1232.
- [45] Caputo J, Cagney K A, Waite L. Keeping us young? Grandchild caregiving and older adults' cognitive functioning[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24, 86(3): 633-654.
- [46] Chen Y, Fang H.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China's "later, longer, fewer" campaign in old ag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1, 151: 102664.
- [47] Chen Y, Lyu Y. Grandchild care and grandparents' labor supply[J]. Economic Modelling, 2025, 143: 106936.



- [48] Chen Y, Zhang H, Zhou L. Motherhood and gender wage differentials within a Chinese firm[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21, 70(1): 283-320.
- [49] Chen Z, Tian X. The relaxation of birth control policies adversely affects women's income: Evidence from China's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5, 90: 102340.
- [50] Choukhmane T, Coeurdacier N, Jin K. The one-child policy and household saving[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23, 21(3): 987-1032.
- [51] Fang G, Miao L. Expanding boundaries: The impact of kindergarten availability on women's employment in China[J]. *Labour Economics*, 2024, 88: 102542.
- [52] Frimmel W, Halla M, Schmidpeter B, Winter-Ebmer R. Grandmothers' labor supply[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22, 57(5): 1645-1689.
- [53] Glaser K, Di Gessa G. Grandparental childca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ole of activities and reasons for care[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25, 366: 117711.
- [54] Glauber R. Motherhood, fatherhood, and the gender gap in occupational authority[J]. *Sociological Forum*, 2023, 38(3): 637-659.
- [55] Gortz M, Sander S, Sevilla A. Does the child penalty strike twic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25, 172: 104942.
- [56] Guo N, Xia X, Zhang J. A matching model of co-residence with a family network: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J]. *Economic Journal*, 2022, 132(648): 2873-2917.
- [57] Guo R, Li H, Yi J, Zhang, J. Fertility, household structure, and parental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8, 46(1): 145-156.
- [58] Healy O J, Heissel J A. Gender disparities in career advancement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Evidence from the marine corps[J].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22, 112: 561-567.
- [59] Huang Q, Fan Z. Relaxation of fertility policy and firm's short-term hiring of female employees: Evidence from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25, 188: 106904.
- [60] Huang W, Lei X, Sun A. Fertility restrictions and life-cycle outcomes: Evidence from the one-child policy in China[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1, 103(4): 694-710.
- [61] Huang W, Wang Y, Wu H, Zhou Y. The motherhood penalty and low fertility in China: A pseudo-event study[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25, 38: 28.
- [62] Kleven H, Landais C, Sogaard J E. Children and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enmark[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 2019, 11(4): 181-209.
- [63] Lebedinski L, Perugini C, Vladislavljevic M. Child penalty in Russia: Evidence from an



- event study[J].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23, 21(1): 173-215.
- [64] Lei H, Ma J, Chen X, Ding Z. Fertility policy,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fertility transiti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5, 85: 336-352.
- [65] Leimer B, van Ewijk R. Are grandchildren good for you? Well-being and health effects of becoming a grandparent[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22, 313: 115392.
- [66] Li X, Gao Q, Tang J. Who are identified as poor in rural China’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pply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capability approach[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22, 27(2): 221-246.
- [67] Lin M, Wang Q. Center-based childcare expansion and grandparents’ employment and well-being[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9, 240: 112547.
- [68] Liu H, Chen B, Li Y, Morrow-Howell N. Neighborhood resources associated with frailty trajectories over time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in China[J]. *Health & Place*, 2022, 74: 102738.
- [69] Liu S, Jin T, Li M, Zhou S.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s and female labor supply: Estimation of marginal treatment effect using Chinese census data[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24, 59(6): 1865-1892.
- [70] Lucifora C, Meurs D, Villar E. The “mommy track” in the workplace. Evidence from a large French firm[J]. *Labour Economics*, 2021, 72: 102035.
- [71] Lundborg P, Plug E, Rasmussen A W. Can women have children and a career? IV evidence from IVF treatmen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6): 1611-1637.
- [72] Malisa A. Grand-parenthood and retirement[J]. *Labour Economics*, 2024, 90: 102547.
- [73] Marcos M. Grandmothers and the gender gap in the Mexican labor marke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3, 162: 103013.
- [74] Markussen S, Strom M. Children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Separating the effects of the first three children[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22, 35(1): 135-167.
- [75] Nguyen H. Expectations versus reality: The well-being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garment factories in Myanmar[J].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2021, 160(2): 219-242.
- [76] Pinto M F. Stay at home with grandma, mom is going to work: The impact of grandmothers’ retirement on mothers’ labor decision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23, 72(1): 283-327.
- [77] Rupert P, Zanella G. Grandchildren and their grandparents’ labor suppl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8, 159: 89-103.



- [78] Rutigliano R, Schnor C, Zilincikova Z. Moving closer for the grandchild? Fertility and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f a mother and her adult daughter in a dynamic perspective[J]. *Demography*, 2023, 60(3): 785-807.
- [79] Sehnbruch K, Gonzalez P, Apablaza M, Mendez R, Arriagada V.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QoE) in nin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J]. *World Development*, 2020, 127: 104738.
- [80] Shen C. Widening inequality: The evolution of the motherhood penalty in China (1989-2015)[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22, 8(4): 499-533.
- [81] Sheppard P, Monden C. Becoming a first-time grandparen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fixed effects approach[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9, 81(4): 1016-1026.
- [82] Suppa N. Walls of glass. Measuring deprivation in social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21, 19(2): 385-411.
- [83] Tong Y, Zheng B. Policy-induced fertility suppression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J]. *Demography*, 2024, 61(6): 2027-2051.
- [84] Vick B. Measuring multi-dimensional deprivation among U.S. veteran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0, 150(1): 191-218.
- [85] Wang Q, Mukhopadhyaya P, Ye J. An evaluation of the changes in wellbeing in China-2005 to 2015: An exploratory study[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61: 101457.
- [86] Wang Y, Zhao X. Grandparental childcare, maternal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birth of a second child: Further knowledge from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2, 139: 762-770.
- [87] Wood J, Neels K. Local childcare availability and dual-earner fertility: Variation in childcare coverage and birth hazards over place and time[J].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Revue Europeenne De Demographie*, 2019, 35(5): 913-937.
- [88] Wu X. Fertility and maternal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the new two-child policies in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22, 50(2): 584-598.
- [89] Yin Z, Liu J, Wang Y. Fertility policy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3, 86: 102475.
- [90] Yuan Z, Zheng X, Hui E C M. Happiness under one ro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lders in China[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21, 22(2): 727-765.
- [91] Zhang C, Managi S. Childcare availability and maternal employment: New evidence



- from Japan[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1, 69: 83-105.
- [92] Zhang Y, Wang Q, Zhao M. Negativity bias in welfare policy feedback effects on mass publics[J].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2023, 36(4): 1015-1043.
- [93] Zhang Z, Ma C, Wang A.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rural China from 2010 to 2018[J]. *Economics Letters*, 2021, 204: 109912.
- [94] Zhao Y, Zhang L, Lu Y, Wen B. More rights but less gains: Relaxed birth control policy and the loss for women[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23, 31(2): 159-191.
- [95] Zhou X, Ye J, Li H, Yu H. The rising child penalty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2, 76: 101869.

2. 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 以及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此部分为重点阐述内容);

2.1 研究内容



以下是各个模块内容的详细介绍：

本部分的研究内容主要涵盖三个方面：利用分类构建的综合指标体系对子代和父代的福利水平进行测度，直观反映他们的福利保障诉求；从横向与纵向维度准确刻画出一孩、多孩家庭中子代和父代的福利表现及变化趋势；根据政策响应与个体特征分类剖析不同人群的福利状况，重点关注相对弱势人群的福利不平等现象。

本项目主要依托CFPS和CHFS等数据，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从功能性活动视角分别对两代人的综合福利状况展开测度。具体地，根据生育政策调整影响子代和父代的侧重点不同，拟围绕**物质福利、发展空间、主观福利、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等5个方面分类构建指标体系。基于上述二级指标，本项目还进一步选取了合适的三级指标，旨在全面揭示和刻画成年子女及其老年父母的综合福利状况。同时，借助模糊集理论和主成份分析法，确保测度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叶静怡和王琼，2014；Wang et al., 2020；翁辰等，2023）。此外，项目组还将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中央部委发布的**托育和养老服务试点地区名单**，前往广东、



湖北和四川的6个城市开展专项调研活动，力求获取更多全面反映子代和父代特征的数据资料。

其中，**横向维度**主要是对一孩、多孩家庭中子代和父代之间的综合福利状况进行比较，继而为后续考察生育政策调整对两代人福利的影响效应奠定统计基础；**纵向维度**则是从时间层面揭示上述人群在放松生育管控前后的福利水平变化，以期为进一步深入探究该变化背后的政策约束力量或个体因素等提供参考依据。

在政策响应方面，本部分主要从**政策实施后目标家庭是否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入手，通过观测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变化，从而揭示出子代和父代的福利表现。就个体特征而言，侧重于分析**四类相对弱势人群**的福利状况：年龄偏大、收入偏低、未与子代或父代同住、农村户籍。从统计描述的视角看，通过细分不同维度的福利指标，并结合政策响应与个体特征的差异，很有可能为考察生育政策调整引发的福利不平等现象呈现先验证据。

本部分拟在厘清放松生育管控影响目标人群及其老年父母福利的内在逻辑后提出理论假说，再从实证层面检验生育政策调整对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的影响差异。进一步地，围绕子代婚姻稳定性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父代隔代照料与代际支持等剖析潜在机制，判断到底是哪条渠道发挥主导作用。最后，根据政策响应与个体特征的不同揭示出生育政策调整对两代人福利的异质性影响。

无论是在子代还是父代内部，放松生育管控究竟能否增进两代人的福利，现有文献仍旧存在较大分歧（王安邦等，2022；黄乾和晋晓飞，2022；Wu，2022；Tong and Zheng，2024；程广帅，2024）。鉴于三孩不太可能成为多数家庭的生育选择，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的主要目标是促使二孩生育群体扩大（王跃生，2023）。因此，本项目将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分别利用CFPS与CHFS等数据库评估“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对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的具体影响，从而较好地回应上述争议。

当然，从代际视角剖析生育政策调整的福利效应难免会因遗漏变量（如地区差异、社会规范变化等不可观测特征）和反向因果的存在而产生**内生性偏误**。



本项目预期的处理方式是在尽可能控制可观测变量的基础上，借鉴Wu（2022）和彭争呈等（2023）的做法，选取**是否具备二孩生育资格、拥有二孩生育资格×符合条件后的年份数作为工具变量（IV）**，从界定政策目标人群的角度来捕捉生育行为的外生变化。关于估计方法的选择，除了运用常见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外，还将参考黄乾和晋晓飞（2022）、Chen and Tian（2025）、Huang et al.（2025）等学者设计的实证方案，采取**双重差分（DID）模型**进行评估，以确保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与有效性。此外，考虑到受政策影响的个体并非完全处于随机分布状态，这意味着上述数据清洗过程中也会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可能性，于是本项目同样借鉴了王安邦等（2022）和Yin et al.（2023）的做法，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引入**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来纠正选择性偏误。

本项目是从代际视角来剖析“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的福利效应，所以在探究子代和父代福利差异背后的成因时，**分析思路上有明显区别**。具体地，针对两类二孩政策如何影响子代福利水平，已有研究存在理论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多生孩子会造成就业机会减少、工资收入降低等损失（Guo et al., 2018; Berniell et al., 2023; Tumen and Turan, 2023; Chen and Tian, 2025）；另一种观点则强调较多的孩子可以提升婚姻稳定性和幸福感、改善健康状况（Markussen and Strom, 2022; Chen and Sun, 2022; 张震和马茜, 2024）。因此，本项目围绕主观和客观层面出发，试图从**婚姻稳定性和劳动力市场表现**两个角度进行解释。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到底会怎样影响父代福利水平，本项目在充分考虑了角色压力与角色扩张、资源稀释与代际竞争等因素的作用后，决定从**隔代照料、代际经济支持、代际情感支持**三个方面选取合适度量指标进行分析。整体来看，学者们认为孙辈出生影响祖父母福利水平的内在机制比较复杂，既有可能通过增加代际互动频率、提升祖孙关系亲密度来实现福利增进目标（Di Gessa et al., 2020; Rutigliano et al., 2023），也有可能通过角色超负荷或角色冲突，以及家庭资源分配压力加剧等削弱祖父母福祉（Rupert and Zanella, 2018; 刘慧君和王惠, 2022; Yamamura and Brunello, 2023）。

结合上述研究思路，本项目将分别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依托CFPS和CHFS数据考察“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是否会通过子代婚姻稳定性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父代隔代照料和代际支持等渠道发挥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机



制检验过程中同样可能伴随着内生性挑战，因而也将采取IV方法进行补充验证（Wu, 2022；彭争呈等，2023）。本部分的研究有助于回应放松生育管控可能造成两代人福利水平存在差异的成因，继而明晰子代和父代实现福利提升目标的潜在路径，一定程度上填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围绕“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对两代人福利的影响来看，很有可能会因为政策响应与个体特征的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结果。具体地，**在政策响应的异质性方面**，可以根据政策实施后目标家庭是否实际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行为来捕捉两代人的福利水平变化，例如可支配收入是否减少、身心压力是否增大等。关于**个体特征的异质性效应**，现有研究发现，生育孩子对生产率较低的成年女性的负面影响更大（许玲丽和陈彦琳，2022）；与父母或配偶父母同住，不仅有助于增加成年女性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概率，还能显著提升她们的劳动参与率（Wang and Zhao, 2022；Fang and Miao, 2024）；照顾孙辈将造成城市中年祖母难以正常工作（Ma, 2021）。这些特征恰好反映出个体容易因禀赋不同、资源积累上的区别，导致福利状况存在差异。可见，从个体特征出发，探讨生育政策调整对年龄偏大、收入偏低、未与子代或父代同住、农村户籍等四类相对弱势人群福利的影响同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全面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打造高质量养老保障体系的新时期，充分利用公共政策与社会力量的支持，并发挥好两者的协同作用，不仅有助于降低家庭育儿成本，还能妥善应对现阶段一老一小照护需求叠加的挑战。为此，本部分将继续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出发，通过考察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能否在增进两代人福利过程中发挥驱动作用，探寻逐步健全两代人福利保障体系的理论思路。

剖析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福利提升效果存在**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两种分析视角。前者的重心在于强调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会分别对两代人福利水平产生直接影响。有研究表明，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的形式、程度、质量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子代和父代的福利状况（Lin and Wang, 2019；Fang and Miao, 2024；石智雷和王璋，2024）。后者则主要是探讨正常情形下，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能否对两代人福利水平起到巩固提升效果，抑或当相对弱势人群面临负面冲击时，发挥出减少甚至避免福利损失的作用。基于此，本项目拟分别从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两方面入手，探讨不同类型的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对子代和



父代福利提升的作用效果，详细内容概括如下：

首先是直接效应分析。简言之，即围绕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对两代人福利水平的影响展开评估，判断到底是何种形式、何种程度以及何种质量水平的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能够直接改善两代人的福利状况。**其次是调节效应分析。**当成年子女可以平衡好工作与家庭的关系，祖父母能够承受住孙辈照料任务或家庭照护资源向幼儿倾斜的压力时，引入一定的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支持便能恰好减轻育儿负担，起到巩固和提升两代人福利水平的效果。若是面向相对弱势人群出台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专项扶持措施，那么意味着他们家庭照护资源原本分配紧张的局面将会适当缓和，继而显现出更为典型的福利提升效应。鉴于当下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呈现多样化特征，本项目针对托育服务，拟从**居住地城市、社区/村庄、家庭**三个层面选取具体度量指标；类似地，考虑到社会保障主要涵盖常规型和特殊型两大类，本项目也将围绕**城市层面和个体层面**设计相应指标。

为完成上述研究内容，特别需要充分利用宏微观数据来构造代理变量。在**居住地城市的托育服务**上，**数量可及性**分别采取托育机构数量与婴幼儿人数之比、托育机构每班平均入托人数作为度量指标，**质量可及性**则分别用托育机构教职工人数与婴幼儿人数之比、校舍建筑面积与婴幼儿人数之比、托育机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进行度量。具体数据主要来自省级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以及地级市政府统计公报等。关于**社区/村庄层面、家庭层面的托育服务**信息可以依托现有数据库进行深度挖掘，例如CFPS2014年问卷在基础设施与环境模块调查了村/居地界内是否分布有托育设施；CHFS2015年问卷专门询问受访者在住房周围一公里范围内是否存在托育场所；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问卷询问家庭中6岁以下孩子是否已经上托儿所、入托机构的性质、家庭平均每月缴纳的入托费用等；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还额外提供了子代送托意愿、预期送托时间、托育机构类型，以及家长对托育机构的位置偏好等信息。

从**社会保障的内容**来看，**常规型社会保障**主要围绕受访者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的情况进行测量；**特殊型社会保障**方面则根据两代人的诉求不同做出取舍，例如子代采用带薪产假天数作为代理指标，父代侧重于选择领取退休金（养老金）和享有健康照护服务两类指标来刻画。值得一提的是，现行数据中虽然基本都调查了社会医疗保险、健康照护服务和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情



况，但几乎很少会涉及到受访者带薪产假方面的问题。因此，本项目拟参考石智雷和王璋（2024）的做法，手工收集各省份在《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前后推出的产假时间数据。综上，围绕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的角度，探讨两者在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提升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的效果，这将为后续减轻生育养育负担、推动养老保障与养老服务供给提质升级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国家《“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明确提出每千人拥有4.5个托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5%等详细要求，各地已逐步在托育服务和养老保障方面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举措。本部分针对现有政策文件进行详细梳理后，拟分类遴选出局部地区在少子化、老龄化时代提升两代人福利水平的典型案例，尤其注重归纳各地在子代生育支持和父代养老保障上的具体做法与实践经验，最终探索出一套可推广的保障模式及政策优化方案。

在放松生育管控时代，如何通过一揽子公共政策工具来有效刺激生育、应对一老一小照护需求叠加的挑战，以及健全基本养老和育幼服务体系等，这些话题不仅是学者们经常讨论的内容，还引发各级政府部门的密切关注。考虑到**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可能发挥直接的驱动作用，同时**生育补贴**、**（祖）父母育儿假制度**、**弹性工作安排**、**税收减免**和**消费券**等措施也备受部分人群的青睐，本部分试图围绕这些方面遴选出成年子女生育支持和老年父母福利保障的典型案例。

具体地，一方面，通过走访卫生健康委员会、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民政局等**政府部门**，以及部分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基层社区**养老服务站**等，详细了解目前生育保险费的征缴与待遇保障、产假延长制度的修订与落实、老年人养老-医疗-康复一体化服务项目进展等情况，同时深层次剖析如何通过资源整合，加快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托育与养老服务供给实现提质扩容目的，进而确保政策目标人群及其老年父母享受方便可及、普惠优质、安全又放心的托育和养老服务，切实缓解育儿照料负担和家庭养老资源分配紧张的局面。另一方面，项目组还将前往**用人单位**调研了解企业层面对于响应生育支持政策的看法、企业生育成本负担、以及具体推进阻力与工作落实情况等，例如“生育友好岗”的设置成本与岗位数量、产假提供与生育津贴发放情况、弹性工作制的待遇保障、员工哺乳假/育儿假审批流程繁琐程度等。

一直以来，中国家庭都盛



行“重小轻老”或“老小并重”两种做法，这就使得从三代框架来看，大部分家庭都容易面临一老一小照护需求叠加压力的挑战。在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面对一老一小问题，国务院明确提出通过发放育儿补贴、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等手段降低生育-养育-教育负担，以提升养老金待遇、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来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由此可见，目前顶层设计上已经逐步明确两代人福利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与基本方案。然而，涉及到具体细节、做法和实践模式等仍存在进一步的挖掘与培育空间，为此，本项目将遵循**公共政策与现实需求导向**的原则展开详细探索。

在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根据成年子女目前不敢生、养不起的原因调查，经济负担重、房价高企、婴幼儿无人照料、教育竞争激烈、女性难以兼顾家庭与工作等是他们的主要顾虑。那么随着各个地区逐步完善托育服务、生育补贴、育儿假、税收减免和弹性工作安排等生育支持措施，是否就能真正发挥出激励生育的效果？面向老年父母，由于他们在年龄、兴趣爱好和社交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养老服务需求也日渐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特征。因此，有必要围绕多层次保障体系和多维度保障类型展开分析。第一，针对子代不敢生、养不起的顾虑，如何确保一系列的生育支持措施得到具体落实？围绕老年人在经济福利、日常照料和身心健康上经常出现的痛点与难点，各地该如何立足实际，确保解决方案落地生效？第二，着眼于幼儿数量较多的子代，抑或那些高龄、伤残和贫困的父代，又需要怎样健全长效帮扶机制？针对这些问题，项目组将根据**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和**全国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试点地区名单**，重点选取广东、湖北和四川等地6个城市的典型案例与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最终从**多层次保障体系**和**多维度保障类型**两方面形成一套可推广的福利保障模式及政策优化方案。

2.2 研究目标



2.3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围绕上述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本项目在理论和实证层面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如下：



3. 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手段、关键技术等说明);

3.1 研究方法

本项目主要运用理论分析、实证研究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结合可行能力分析框架,分类构建福利测度综合指标体系,并整合匹配好现有数据形成“中国家户成员多维福利数据库”。其次,在归纳梳理前沿理论与国内



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生育政策调整影响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的作用逻辑提出可验证的理论假说，并设计科学稳健的实证方案，依托前述微观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对放松生育管控引致的福利效应进行严谨的定量分析。**最后**，以生育政策调整下提升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的干预策略为基础，辅以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法，探索出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的政策优化方案。

3.2 技术路线

本项目将沿着图 3 的技术路线逐次推进：

NSFC 2025





3.3 拟采取的研究方案

为了有效地推进研究内容，实现好研究目标，项目组将在本部分对各个模块的初步实施方案进行依次介绍。

3.3.1 模块一实施方案

依托可行能力分析框架，利用分类构建的综合指标体系对子代和父代的福利水平展开测度后，本部分将进一步揭示出不同人群的福利表现及动态演变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运用可行能力理论测度个体福利过程中，**难免经常会面临两个挑战**：其一是上述理论虽然同时强调了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的重要性，但后者几乎难以被直接观测；其二是关于功能性活动的有效识别，作为福利评价的必要前提，受限于缺乏明确界定功能性活动的内涵，导致无法形成一个功能性活动清单。

为此，本项目**拟采取如下措施解决上述困难**：一方面，借鉴主流文献中的分析思路（叶静怡和王琼，2014；Wang et al., 2020；翁辰等，2023），重点从功能性活动的视角展开测度；另一方面，在功能性活动集合上，主要根据阿马蒂亚·森的观点（Sen, 2004），着重选取一些突出的功能性活动进行表征。具体依据来自公众选择法则：基于数据、研究者对公众所珍视事物的假设、公众共识、持续进行的目地性参与机制，以及实证数据显示的公众所珍视事物（Alkire, 2007）。

结合突出的功能性活动准则和公众选择法则，并且参考权威文献中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群体福利测度的常见做法（Sehnbruch et al., 2020；王武林等，2021；Suppa, 2021；Amarante and Colacce, 2022；欧阳鑫和张应良，2023），本项目根据生育政策调整对子代和父代影响的侧重点不同，拟具体围绕**物质福利、发展空间、主观福利、身体健康以及心理健康**等5个方面分类构建福利测度综合指标体系，从而全面地揭示出子代和父代的福利特征事实。表1报告了综合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所具体涵盖的二级和三级指标。

在综合福利指数的测度方面，本项目主要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和主成份分析法。基本思路概述如下：**首先，借助隶属函数计算出隶属度**，据此反映个体福利水平的高低。一般而言，每类揭示个体福利状况的子指标与功能性活动都有对应的一个隶属度。隶属度越高表明个体福利状况越好；当隶属度为0时，则意味着该个体当前的福利水平处于最低位置；隶属度为1时意味着子代和父代当



下的福利水平恰好处于最佳状态。借鉴Wang et al. (2020)的做法,本项目主要采取基于样本分布的隶属函数:

$$u(x^n) = \begin{cases} 0 & n=1 \\ u(x^{n-1}) + \frac{F(x^n) - F(x^{n-1})}{1 - F(x)} & n > 1 \end{cases} \quad (1)$$

其中, x 代表个体福利水平, n 表示个体在全部样本分布中的所处位置(若 n 越大, x 越大, 则表示福利水平较高); $U(x^n)$ 表示排序为 n 的个体 x 的隶属度; $F(x^n)$ 表示排序为 n 的个体 x 的累积概率分布。就函数形式而言, x 最小的个体(即 $n=1$)在该指标上的隶属度通常为 0, 象征着福利状况最差。

其次是确定加总形式。在可行能力框架下围绕功能性活动测量个体福利现状,通常会涉及到多个不同维度。简言之,由多个子指标构成的各种功能性活动,都会被视为福利的一个重要维度。整体来说,从选择各个子指标到确定每种功能性活动的内容,再到计算综合福利指数,几乎都会涉及到怎样合理的选取加总形式。梳理现有文献,主要存在**两种比较常见的加总形式**:其一为模糊集理论的交集和并集运算,其二是简单算术平均和加权平均方法。^①因此,本项目主要以模糊集理论为基础,从交集和并集运算形式中重点选取两种加总形式,并依托简单算术平均和加权平均方式作为补充。具体来看:

①标准交集运算。集合 A 与 B 的标准交集运算公式如下所示:

$$u_{A \cap B} = \min(u_A, u_B) \quad (2)$$

鉴于标准交集运算的缺点在各个维度之间不具有补偿作用,且只考虑了最差的维度。因此,当某一维度的福利水平处于较低位置时,很可能造成其他维度再好也没有明显价值。

②弱交集运算。与标准交集运算类似,集合 A 与 B 的弱交集运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u_{A \cdot B} = \min(u_A \cdot u_B) \quad (3)$$

弱交集运算实际上就是计算各个维度上功能性活动之间的乘积,它强调在每一维度水平最低时同期发生的情况(Roche, 2008)。可见,这种方法较好地刻画了某一个维度较差和多个维度都较差时产生的异质性影响。

^① 通常来说,如果认为各个指标对福利的影响一致或难以区分重要性时,可以采用算术平均或加权平均方法确认权重。





③简单算术平均。相较于标准交集运算，该加总形式主要考虑了各个维度之间可能存在补偿作用，例如福利水平较高的维度能够补偿水平较低的维度。具体表达式为：

$$U(u_A, u_B, \dots, u_Z) = [(\sum_{j=A}^Z u(x_j)) \cdot \frac{1}{Z}] \quad (4)$$

④加权算术平均。该加总形式实际上假设各个子指标或子维度对于子代和父代的重要性会有所不同。相应的表达式设定为：

$$U(u_A, u_B, \dots, u_Z) = \frac{\sum_{j=A}^Z w_j u(x_j)}{\sum_{j=A}^Z w_j} \quad (5)$$

本项目主要借鉴叶静怡和王琼（2014）、翁辰等（2023）等学者的做法，采取 Wang et al.（2020）提出的式（6）计算指标权重：

$$w_j = -\ln\left(\frac{1}{n} \sum_i u_{i,j}\right) \quad (6)$$

从上式来看，该方法与式（1）中的隶属函数形成了较好呼应。优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利用家户数据计算各个维度的权重过程中，这种做法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其二是此类权重设定形式可以有效地确保那些即便是隶属度较差的维度也能占据相对较高的权重。

关于**主成份分析法**，这是一种从众多变量中将某些具有相同成分的变量合理提取出来的现代统计应用技术，其能够很好地揭示出可观测变量与各类隐性变量之间蕴含的对应关系。本项目使用该方法识别的隐性变量即为各种功能性活动，而主成份分析结果反映了各个子指标（可观测变量）在不同功能性活动中展现出的相对重要性。具体地，根据三级指标的特征值和碎石图，首先保留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份，随后采用方差极大化的正交旋转，得到因子载荷矩阵，紧接着使用Kaiser-Meyer-Olkin抽样精确度指标进行判断。

通过将上述四种加总形式计算得到的功能性活动的隶属度与主成份分析法得到的各个主成份结果进行比较，便能够选取相关系数最高的方法作为主要加总形式。据此，测算出各个二级指标的得分，即子代和父代在各类功能性活动上的福利水平。类似地，两代人的综合福利指数也能进一步获取。同现有学者目前普遍只采用一种加总形式的做法相比，上述一系列相对严谨规范的操作流



程不仅会使得加总形式的选择更加客观合理，而且与主成份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后，也能确保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到的福利评价结果更加稳健可信。

3.3.2 模块二实施方案

本部分的核心目标是从代际视角下分类考察生育政策调整对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随后根据政策响应与个体特征的不同展开异质性分析。

(1) 基准模型设定

利用模块一中得到的子代和父代综合福利指数，本部分将通过科学严谨的实证设计来具体识别“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对两代人福利水平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Welfare_{i,c,t} = \alpha_0 + \alpha_1 Sechild_{i,c,t} + \alpha_2 X_{i,c,t} + \alpha_3 Z_{c,t} + \alpha_4 \sigma_i + \alpha_5 \omega_t + \mu_{i,c,t} \quad (7)$$

其中， i, c, t 分别表示个体、城市和调查年份。被解释变量 $Welfare$ 表示子代或父代的福利水平，不仅包括综合福利状况，还涉及物质福利、发展空间、主观福利、身体健康以及心理健康等5个子指标。核心解释变量 $Sechild$ 表示在2014年或2016年及以后是否拥有第二个孩子（孙辈）。 X 是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的集合， Z 表示城市特征变量。 σ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固有因素。 ω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μ 是随机扰动项。考虑到同一家庭内不同个体随机扰动项之间的相关性，于是也将标准误聚类到家庭层面。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系数 α_1 由于能直观反映出拥有第二个孩子对成年子女或老年父母福利的影响程度，所以其方向、大小和统计显著性都是本部分最为关注的内容。

为了避免**破坏性控制变量**（Bad controls）造成的估计偏误（Angrist and Pischke, 2009），本部分主要从**前定变量**的角度选取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具体地，在个体和家庭特征方面，涵盖受访者年龄、受教育程度、出生时的户籍状况、兄弟姐妹数量、一孩年龄和性别；关于城市特征，则主要控制了人均GDP、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人口性别比等。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衡量方式。

(2) 内生性问题处理

出于尽可能准确识别生育政策调整对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的因果效应，往往需要进一步考虑模型中是否会因为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而引发有偏估计。在式（7）中，本项目认为可能存在内生性担忧的地方至少包括：**其一是遗漏变量**。尽管式（7）已经控制了一些前定变量、个体与调查时间的固定效应，但难免仍



旧会遗漏掉个性特征和宗族文化规范等不可观测特征，这些变量将同时影响到二孩生育决策、子代和父代的福利水平。**其二是自我选择偏误**。二孩生育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人为选择，所以极易容易面临选择偏差问题带来的挑战。换言之，个体通常是在综合考虑童年经历、生育偏好、家庭经济状况等多种复杂因素后才会做出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决定。**其三是样本选择偏差**。由于受政策影响的个体在分析样本中很难确保完全随机分布，本项目认为这或许会造成其难以恰当地揭示整体情形。

为了妥善解决遗漏变量和选择性偏误问题，一种常见的应对策略便是采取**工具变量（IV）方法**。在探究放松生育管控对成年女性就业决策的影响过程中，Wu（2022）使用“拥有二孩生育资格与资格具备时间的交乘项”来刻画生育数量的外生变化；彭争呈等（2023）选取“是否拥有二孩生育资格”充当生育二孩的IV。本项目将借鉴上述学者的做法，利用**是否属于“单独二孩”或“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作为二孩生育决策的IV，从而较好地捕捉孩子数量的外生变化。进一步参照汪伟等（2020）、葛润和施新政（2023）、杜永潇和董浩



（2024）以及Chen and Tian（2025）等文献的操作步骤，本项目拟根据表3中的分类标准，对目标人群与非目标人群进行明确界定。

理论上，评判一个IV是否合适通常需要满足三项基本条件。首先，政策目标人群与“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个体的二孩生育行为高度关联，**遵循相关性假设**。其次，作为一个利用政策外生冲击而生成的变量，政策目标人群也与其他影响二孩生育行为的混杂因素无关，**符合外生性要求**。第三，该指标几乎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通过生育二孩的路径来作用于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因而同样**满足排他性约束**。

在此情形下，本项目将采取**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来获取上述系数 α_1 的一致估计量。IV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估计方程可以分别设定为：

$$Sechild_{i,c,t} = \beta_0 + \beta_1 Eligible_{i,c,t} + \beta_2 X_{i,c,t} + \beta_3 Z_{c,t} + \beta_4 \sigma_i + \beta_5 \omega_t + \mu_{i,c,t} \quad (8)$$

$$Welfare_{i,c,t} = \lambda_0 + \lambda_1 \widehat{Sechild}_{i,c,t} + \lambda_2 X_{i,c,t} + \lambda_3 Z_{c,t} + \lambda_4 \sigma_i + \lambda_5 \omega_t + \mu_{i,c,t} \quad (9)$$

在式（8）中，*Eligible*表示是否为政策目标人群。从式（9）来看， λ_1 是此处最受关注的待估参数，若结果显著为正，那么意味着生育政策调整能够显著提升子代或父代的福利水平。其余变量的含义同式（7）保持一致。

进一步考虑到IV估计结果反映的只是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ATE），并非生育政策对目标人群的平均处理效应（ITT）。通常来说，与前者相比，后者由于强调了个体可能接受的干预，而非实际接受的，所以揭示出的结果更具有可信度。参考Danzer（2013）、Cheng et al.（2018）以及Berniell et al.（2020）等学者的做法，本项目也将包含ITT理念的双重差分（DID）方法引入实证分析框架。相应的模型设定如下：

$$Welfare_{i,c,t} = \theta_0 + \theta_1 Treat_{i,c} \times Post_t + \theta_2 X_{i,c,t} + \theta_3 Z_{c,t} + \theta_4 \sigma_i + \theta_5 \omega_t + \mu_{i,c,t} \quad (10)$$

其中，*Treat*代表政策目标人群的虚拟变量，那些属于目标人群的个体被划入实



验组，赋值为1，否则为对照组，赋值为0，详细定义如表3所示。*Post*表示“单独二孩”或“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时间，将实施之前的年份统一赋值为0，之后的年份则相应赋值为1。其余变量的含义依旧同式（7）一致。

最后，为了削弱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干扰，本项目还将引入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来满足稳健性检验的需要。简言之，PSM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对照组中寻找到与实验组比较相似的个体，从而促使此类个体的可观测特征能够与实验组中的个体尽可能具有可比性。一旦个体福利水平完全由可观测的协变量决定时，那么以倾向值为条件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便能恰好得到平均处理效应，即受到政策干预后个体所产生的变化。

（3）作用机制检验

$$Mediator_{i,c,t} = \delta_0 + \delta_1 Sechild_{i,c,t} + \delta_2 X_{i,c,t} + \delta_3 Z_{c,t} + \delta_4 \sigma_i + \delta_5 \omega_t + \mu_{i,c,t} \quad (11)$$

在式（11）中，*Mediator*表示机制变量，详细的测量指标如表4所示。其余变量的含义仍与式（7）一致。值得强调的是，本部分在刻画作用机制过程中将会选用多个代理指标，此举不仅有助于减少变量的潜在测量误差，还能够比较全面地检验作用机制的成立情况。当然，针对式（11）包含的内生解释变量 *Sechild*，本部分同样会借助IV或DID方法进行估计。在上述机制变量对子代或父代福利水平的影响已经得到部分文献佐证的基础上（Ma, 2021；余靖雯等，2023；贺光烨和王安迪，2024；Eibich and Zai, 2024；Glaser and Di Gessa, 2025），项目组认为进一步从实证层面考察生育政策调整对这些机制变量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证实两类二孩生育政策究竟会通过哪一条作用渠道来影响子代或父代的福利水平。

（4）异质性分析

项目组将围绕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考察潜在的异质性效应。一是政策响应特征，主要根据放松生育管控后目标家庭实际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行为差异，



捕捉子代或父代的福利水平变化。出于缓解内生性偏误的考虑，具体拟在DID框架内采用分组估计的形式展开分析。具体地，对于“单独二孩”政策，项目组将政策实施后有生育二孩的单独样本赋值为1，其他为0；对于“全面二孩”政策，则相应地把政策实施后有生育二孩的非独样本赋值为1，其他为0。根据上述操作化后得到的结果来看，其能够较好地揭示出个体实际拥有第二个孩子后，生育政策调整所产生的福利效应。

二是个体特征。本部分旨在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调整是否会对相对弱势人群的福利水平产生影响。同样依托DID框架，继续利用分组估计的形式进行检验。当完成对子代和父代样本的单独划分后，接下来拟聚焦于年龄、收入、居住安排和户籍四个维度。项目组将下述四类样本定义为相对弱势人群：高龄组（年



龄在样本中位数以上）、低收入组（收入水平处于中位数以下）、未与子代或父代同住、持有农村户籍。结合这一系列估计结果，本项目可以通过识别放松生育管控对相对弱势人群福利水平的具体影响，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3.3.3 模块三实施方案

本部分的分析重心是评估现有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对子代和父代的福利增进效应，继而为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打造高质量养老保障体系奠定理论基础。根据直接效应的分析框架，首先将围绕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能否直接提升两代人的福利水平展开实证检验。其次，结合调节效应的分析框架，拟通过引入交互项的形式来系统剖析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能否在生育政策调整影响个体福利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详细的操作步骤概述如下：

立足于子代和父代两类样本，项目组将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对两代人福利水平的影响。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Welfare_{i,j,t} = \varphi_0 + \varphi_1 Childcare_{j,t} + \varphi_2 X_{i,j,t} + \varphi_3 Z_{j,t} + \varphi_4 \sigma_i + \varphi_5 \omega_t + \mu_{i,c,t} \quad (12)$$

在式（12）中，下标 j 代表居住地城市、社区/村庄、家庭， i,t 的含义与上述模型一致，均用来表示受访者个人和接受调查的时间。 $Childcare$ 代表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变量的集合，具体的指标与度量方式如表5所示。参数 φ_1 直观地揭示了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对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的影响程度。

同样将子代和父代样本进行单独拆分后，利用交互项的形式分类探究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的调节效应。简言之，通过对比没有享受两类外部支持的普通子代和父代，评估受益于托育服务和社会保障能否对放松生育管控下两代人的福利水平产生更加显著的作用效果。模型设定如下：

$$Welfare_{i,j,t} = \gamma_0 + \gamma_1 Childcare_{j,t} + \gamma_2 Sechild_{i,j,t} + \gamma_3 Childcare_{j,t} \times Sechild_{i,j,t} + \gamma_4 X_{i,j,t} + \gamma_5 Z_{j,t} + \gamma_6 \sigma_i + \gamma_7 \omega_t + \mu_{i,c,t} \quad (13)$$

其中，交互项系数 γ_3 表示托育服务或社会保障的调节效应。若结果显著为正，意味着托育服务或社会保障很有可能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换句话说，即随着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后，可能有助于改善放松生育管控对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的影响。此外，通过对式（13）展开估计，还可以进一步反映出现阶段在哪种类型的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上持续发力将会取得更大收益，这一结



果有望为各地在推动两代人福利水平提升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制定公共政策和动员社会力量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指导。

3.3.4 模块四实施方案

面对一老一小照护需求叠加的压力不断攀升，本部分将秉承转“危”为“机”和“防患于未然”的政策矫正理念，旨在通过以下两方面的工作探索出可推广的保障模式及政策优化方案。第一，准确遴选出子代生育支持和父代养老保障的典型案例，并尽可能梳理归纳好一些优秀做法和实践经验，从而为多案例比较提供丰富素材。第二，根据案例分析结论与相关访谈资料，遵循公共政策和现实需求导向的原则，重点围绕多层次保障体系和多维度保障类型两个方面出

② 尽管婴幼儿人数在现有人口普查数据或统计年鉴（公报）中难以找到数据进行直接反映，但可以巧妙地根据小学阶段新生的入学人数推算得出。例如，2016 年婴幼儿人数即为 2020-2022 年就读小学一年级的人数。



发，为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和推动社会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撑。

在案例来源地方面，项目组将根据**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名单**和**全国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试点地区名单**，着重选取发生在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湖北省武汉市和天门市、以及四川省成都市和泸州市等三省六市的典型案例展开详细分析。目前，粤鄂两省在生育支持和养老保障方面的工作成绩正处于全国前列。具体来看，作为全省唯一一个入选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的城市，**广州市**不仅成立了首家“公建民营”型街道普惠托育园，还于2024年10月正式启用首家“政医企”合作共建的天河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同时也将“儿童早期发展小组活动”定植在街道和社区，积极探索“医-教-育”共培共建模式。**武汉市**1101家托育服务机构中，目前已涌现出15家省级示范托育机构和28家市级示范托育机构，这标志着优质托育服务资源将逐渐惠及千家万户。**天门市**精准定位“生育梗阻点”，努力探寻“生育密码”。例如，当地除了对生育二孩和三孩的家庭分别发放9.63万元、16.51万元现金补助外，还致力于从备孕、怀孕、分娩、托育、职称评聘、职级晋升等多个环节入手系统解决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成都市**全面提升生育医疗待遇，对于医保参保对象因生育或终止妊娠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不再设置起付线，允许在生育医疗费限额内据实报销。

针对少子化时代引发的老年照料护理困境等，粤鄂川三地也积极构建“一老一小”健康服务体系，通过引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打造医养联合体等多种举措，旨在实现对老年人群全面的健康管理。同时，“党工+社工+义工”的联动模式也初具雏形，即动员社会力量合作供给多层次、多样化健康养老服务。例如，**广州市**倡导“初老服务老老”理念，探索完善“大城市大养老”服务模式，目前其设立的时间银行平台上在册“初老”志愿者人数已超2.3万人，累计发布助老志愿服务活动5038个，服务长者人群多达83万人。**深圳市**汇集社区民政专干、双百社工、网格员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加快建设“老有颐养”民生幸福标杆城市，如今已基本形成“1+N+X”多层次养老服务政策体系。**武汉市武昌区**不仅面向为老服务企业提供多种支持，而且帮助特殊困难老人优先购买服务，包括对低保、低收入、重点优抚、计生特扶等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补贴，向60岁以上老人推行助餐补贴，为90岁以上老人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成都市青羊区探索形成基层医养结合131服务模式，通过涵盖1个医养服务机构，融合3种医养模式（居家医养、社区医养、机构医养），并由1支家庭医生团队提供支持，较好地实现了机构、社区和居家养老的无缝衔接。**泸州市龙马潭区**聚焦养老服务，着力提升老年群体幸福指数，目前全区范围内已建成街镇养老服务综合体（日间照料中心）61个、物业+养老服务站6个、老年人互助睦邻点6个、老年助餐服务设施9个。

据此，本项目拟选取上述城市的部分卫生健康委员会、总工会和民政局等政府部门，部分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基层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以及相关用人单位和受益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完成**多案例比较和访谈资料分析**后，继而针对现行的子代生育支持和父代养老保障方案、详细做法及经验教训展开探讨。具体地：①在生育政策不断放松的制度环境下，结合相关资料，系统梳理上述三省六市关于两代人福利保障的政策导向，明确了解当地政府在少子化、老龄化时代应对一老一小照护需求叠加挑战、完善基本养老和育幼服务体系上的总体思路与基本举措。②直接访谈基层社区专干、托育服务机构和养老服务站点负责人，关注其日常工作内容与育幼助老服务的相关细节，并大体上掌握社区内不同类型家庭中子代和父代的重点诉求。③鉴于用人单位是生育支持政策落地实施环节的重要主体，项目组也将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了解企业层面对于落实生育支持政策的看法、企业生育成本负担、具体推进阻力与工作落实情况等。④根据卫健和民政等单位提供的信息，在相关街道、社区负责人的支持与配合下，项目组还计划对辖区范围内的成年子女和老年群体初步摸排后开始走访。此过程主要采纳**质性分析方法**，即按照访谈提纲，依托深度访谈的形式有序进行。其中，项目组将根据子代和父代的具体情况分别设计不同访谈提纲，涵盖受访者基本信息、家庭背景、生活状况、托育服务、社会保障以及身心健康等多方面内容。值得说明的是，考虑到调研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高龄、伤残、孤寡和失能等**特殊家庭老年人**，所以在开展面对面访谈之余，也灵活采取家人/护工代答或电话沟通等多样化形式。

结合案例比较与调研访谈中的发现，本项目主要从两方面对现存的子代生育支持和父代养老保障模式进行归纳总结。首先，就**多层次保障体系**而言，拟具体围绕**普惠供给与多样化服务**两个方面总结出生育政策不断放松的制度背景下提升两代人福利水平的经验举措。在生育支持上，广州市从化区正式揭牌启



用妇幼保健院普惠托育园，打造医育融合一站式服务平台。**黄浦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支撑，集托育专业人才培养、托育产品研发等六位功能为一体，密切围绕婴幼儿、家庭、托育园、医疗机构等全方位构建托育服务链。**深圳市宝安区**2024年新增托位1.7万个，位居全市第一；同时，9家公立医院已全部建成托育服务点，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实现公立医院办托辖区全覆盖目标。**武汉市汉阳区**作为全市最早发展政府普惠托育服务的市辖区，目前已有11家独立托育机构和67家收托幼儿园维持正常运营。**从养老保障来看**，以**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街道打造的养老综合体为例，其针对少子化引致的照料护理、情感交流困境，不仅在家门口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了就餐、托养、康复理疗和文娱娱乐等一站式服务，还是一家没有围墙的养老院，目前共提供242个家庭养老床位，切实帮助那些行动不便、需要居家养老的长者在家就能享受适老化改造、智能化设备和专业化照护的“三入户”服务。**四川省泸州市**在城区范围内依托养老机构、街道、社区的养老服务综合体和小区“物业+养老”服务站，构建“15分钟都市养老服务圈”；农村地区则重点构建了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对于上述具有地方特色且行之有效的福利保障措施**，本项目认为深度挖掘其中的实践经验，可以为其他省市更好的解决“一老一小”民生问题带来有益启发。

从多维度保障类型来看，面对现阶段成年子女不敢生、养不起的顾虑和不能生的困境，以及老年父母涌现出的个性化、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各地也积极立足实际，不断完善生育支持和养老保障政策体系。具体**以生育支持政策为例**，**广州市**正式将“人工授精”、“精子优选处理”等8项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切实减轻了不孕不育患者的经济压力。**深圳市**拟按照差异化递进式的方案对市民发放育儿补贴，二孩累计可领1.1万元，三孩累计可领1.9万元。**武汉市**对多子女家庭购房提高支持力度，在新城区购房不仅可以获取6-12万元奖补，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也能上浮20%。**孝感市**推出产假延长措施，针对符合政策生育二孩和三孩的女性，带薪产假时间将分别延长至7个月、8个月。**就养老保障体系来看**，**成都市**作为全国首批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之一，目前正在加快完善失能评估标准体系，并与省内9个城市密切衔接，探索异地待遇保障实现方式，尽可能减轻失能老人的家庭经济负担，提高生活质量。**襄阳市**针对银发族就医问题，规划2-3年时间内确保全市10家左右的医养结合机构拥有100张以上床位，同时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家庭医生签约的形式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巡诊、家庭病床等服务。



综上所述，本部分将重点利用在三省六市收集的典型案例与访谈资料，围绕**多层次保障体系**和**多维度保障类型**两方面总结提炼优秀做法与成功经验，继而立足于生育政策不断放松的制度环境，以公共政策和现实需求导向为重要引领，充分发挥公共政策与社会力量在个体福利保障中的核心作用，探索出**可推广的保障模式及政策优化方案**，最终为少子化、老龄化时代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和推动社会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3.4 可行性分析

本研究方案环环相扣、逻辑清晰。**首先**结合放松生育管控下家庭资源分配的新变化导致一老一小照护需求叠加压力增大的现实背景，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后凝练出研究主题：代际差异视角下生育政策调整的福利效应及保障策略研究。**其次**，基于可行能力框架，分类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子代和父代的福利水平展开测度，并围绕横向与纵向维度、政策响应与个体特征等方面刻画不同人群的福利表现及动态演变趋势。**第三**，厘清放松生育管控影响两代人福利的作用逻辑并提出理论假说，设计科学严谨的实证方案，采用 CFPS 与 CHFS 等微观数据检验生育政策调整对子代和父代福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以生育政策调整下提升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的干预策略为基础，依托典型案例和访谈资料分析，从多层次保障体系与多维度保障类型两方面探索出推动中国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和养老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集成方案。

项目组长期从事“生育政策与养老保障”问题研究，目前已积累大量相关的数据资料，如 **CFPS2010-2022 年数据**、**CHFS2011-2023 年数据**、**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 **2019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等。这些基础数据将为本项目系统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影响目标人群及其老年父母福利的因果效应与作用机制，以及探索子代生育支持和父代养老保障体系完善方案等提供便利。与此同时，出于确保实证分析结论严谨可靠的考虑，本项目还计划依托申请人所在学术团队的社会资源，围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中央部委发布的**托育和养老服务试点地区名单**重点选取广东、湖北和四川的 6 个城市开展实地调研活动，以便掌握上述地区在少子化和老龄化时代如何有效应对一老一小照护需求叠加挑战、完善基本养老和育幼服务体系的总体思路与基本举措，以及区域内部成年子女和老年群体近年来的福利表现及动态变化等。



项目申请人系统学习过现代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基础课程，熟练掌握动态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模型、双重差分与模糊断点回归模型等**前沿因果识别方法**；同时，也具备清洗大型家户调查数据的能力和微观计量方面的研究经验，能够灵活使用 **Stata、Matlab 与 R 语言** 等多个专业软件开展数据处理与实证分析。此外，申请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也参与过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保障学科团队开展的实地调研活动，并负责撰写相关研究报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项目调研经验。因此，申请人具备开展项目研究的能力，且基本不存在

近年来，项目申请人一直扎根于生育政策与养老保障等研究领域，尤其关注生育政策及其调整的长期后果。目前先后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Applied Economics*、*Finance Research Letters*、*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和《农业经济问题》、《当代财经》、《人口与经济》、《中国经济问题》、《社会保障研究》、《人口与发展》等本领域 SSCI/CSSCI 发表高水平论文 20 余篇。同时，申请人主持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入选美团研究院研究新锐助力计划；以核心成员身份参与过 5 项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 项）、后期资助项目，以及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并且积累了与本研究内容密切相连的调研经验。可见，申请人前期已打下良好的研究基础，本项目是对以往研究的延续和拓展。

4. 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5. 年度研究计划及预期研究结果（包括拟组织的重要学术交流



活动、国际合作与交流计划等)。

5.1 年度研究计划

本项目研究周期预计为 3 年，计划于 2028 年底完成。每个阶段的工作内容和时间安排如表 6 所示。

表 6 各阶段研究内容安排

研究任务		2026 年各季度				2027 年各季度				2028 年各季度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完善研究思路、分析框架设计												
2	文献资料搜集与梳理												
3	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												
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5	实证分析与论文写作												
6	会议交流与论文投稿												
7	论文修改、研究报告撰写与完善												

5.2 预期研究成果

(1) 期刊论文：在本领域高水平 SSCI 和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其中已形成部分论文计划如下：



（二）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

1. 研究基础（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

项目申请人近年来一直深耕于养老保障、生育政策和农民工就业创业等主题，研究内容具有较强的连贯性与系统性。目前相继在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Applied Economics*、*Finance Research Letters*、*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以及《农业经济问题》、《当代财经》、《人口与经济》、《中国经济问题》、《社会保障研究》、《人口与发展》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20余篇学术论文。作为团队核心成员（首席专家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参与撰写的研究报告“长寿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对策研究”成功入选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聚焦到老年福利上，现阶段与之直接相关的三篇论文已经分别发表在国际高水平期刊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SSCI, JCR1区）和 *Applied Economics*（SSCI, JCR2区）、国内权威期刊《农业经济问题》（国家自科基金委管理学部A类期刊），申请人均担任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当前的研究重点是通过揭示生育政策调整对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的具体影响及潜在机制，并评估托育服务与社会保障对子代和父代福利水平的提升效果，继而结合典型案例与访谈资料，探讨如何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及老年福利保障方案。本项目属于以往研究的延续与拓展，前期积累的专业知识、发表的学术论文能够有力支撑项目的顺利推进和高质量完成。

项目方面，申请人先后主持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人口负增长时代依托志愿服务增进低龄老人福利的新路径研究”、上海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人口老龄化、公共教育支出与中国居民代际阶层流动性：机理和实证”，入选美团研究院研究新锐助力计划。以核心成员身份负责多个与本项目相关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具体涵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应对策略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能力剥夺的视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长寿风险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对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生育与老年人福利问题研究”等。同时，还参与了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保障学科团队“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问题”项目组开展的实地调研活动，并负责撰写相关研究报告，在此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项目调研经验，这也为本项目的有序推进奠定扎实基础。

此外，围绕本项目的研究内容来看，申请人现阶段已经同步开展了一些预研工作。具体地，初步完成的任务主要包括：获取CFPS、CHFS等与本项目密切相关的大型微观数据库的使用权限；详细清洗了与二孩生育政策、子代和父代福利相关的变量和指标；同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民政局等部门进行洽谈对接；完成一些针对卫健和民政部门、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与基层社区养老服务站点负责人的访谈提纲设计。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申请人目前还经常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境内外知名高校的学者保持沟通，恳请他们对本研究方案给予积极指导并寻求科研论文上的合作。

附：申请人近期的主要研究成果

- [1] 胡浩钰，黄护国，冯大威. 志愿服务参与能增强老年人获得感吗？(工作论文)
- [2] **Haoyu Hu**; Huguo Huang; Dawei Feng. Volunteering and older adults' cognition in urban China (Working paper)
- [3] **Haoyu Hu**; Huguo Huang; Dawei Feng. Robots and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migrant workers (Working paper)
- [4] **Haoyu Hu**; Chunkai Zhao; Huguo Huang; Dawei Feng. Impact of city house rent on second-child fertility intention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migrant population (**R & R by Housing Studies**)
- [5] Yuanyuan Li; Yingshang Tang; Dawei Feng; **Haoyu Hu**. To inhibit or to promote: Industrial robots and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R & R by China & World Economy, Corresponding author**)
- [6] **Haoyu Hu**; Dawei Feng. Does self-employment mitigate the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R & R by Natur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 [7] **Haoyu Hu**; Wei Wang; Ge Xin; Fangjin Ye Impact of city size on self-employ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ese migrant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24, 95: 101802.
- [8] **Haoyu Hu**; Wei Wang; Ge Xin. Enrollment in public pension program and household land transfer behavior: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2023, 55(30): 3443-3457.
- [9] **Haoyu Hu**; Wei Wang; Fangjin Ye. Tracking the role of self-employment on perceptions of citizenship: Evidence from 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22, 28(8): e2576.
- [10] **Haoyu Hu**; Wei Wang; Dawei Feng; Hualei Yang; Zhongkun Zhu. Number of children and monetary transfers to elderly parents in rural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2, 159(2): 593-615.
- [11] 杨华磊, 胡浩钰. 生育目标不一致性——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人口与经济》, 2019年第5期
- [12] 杨华磊, 胡浩钰, 沈政. 目标不一致、正外部性与生育补贴,《中国经济问题》, 2019年第4期
- [13] 杨华磊, 胡浩钰, 张文超, 沈政. 教育支出规模与方式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人口与发展》, 2020年第2期
- [14] 黄宏伟, 胡浩钰. “新农保”养老金制度与农村家庭生存型消费效应——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农业经济问题》, 2018年第5期
- [15] 黄宏伟, 胡浩钰. 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当代财经》, 2019年第12期
- [16] 黄宏伟, 胡浩钰. 新农保对农村居民自我养老保障的替代效应——基于家庭土地经营面积变化视角的分析,《社会保障研究》, 2019年第6期

2. 工作条件（包括已具备的实验条件，尚缺少的实验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包括利用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和部门重点实验室等研究基地的计划与落实情况）；

◆ **学校与学科平台。**本项目的依托单位华南农业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先后入选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建设高校，国家“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高校、国家“111计划”等重要名单。申请人所在的经济管理学院不仅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和**广东省攀峰重点学科**，还分别设立了3个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3个广东省重点实



验室。截至目前，它们在向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重大决策咨询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申请人作为其中的研究人员，正在同多个学术团队保持密切交流与合作，这为本项目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的重大需求提供宝贵机会。

◆ **硬件条件。**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总面积33700平方米，馆藏图书非常丰富，各类数据库基本超过200个，尤其拥有中英文原版的经济学、社会学书刊资料，以及已经在校园局域网上推出的国内外权威期刊电子资源。其中，中文数据库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中国知网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硕博论文网、万方知识服务系统等；外文期刊数据库主要包括Elsevier、Springer、Taylor & Francis、Wiley和JSTOR等。借助上述期刊数据库，项目组能够获取大量与本研究相关的中英文文献资料。此外，经济管理学院还提供专门的办公室、资料室和数据库终端，配备高性能计算机及辅助设备，再次为本项目的资料搜集、数据分析等提供必要的学术和技术支撑。

◆ **师资队伍。**历经几十年发展，目前学院内部的师资力量比较雄厚。除了拥有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还形成了一批从事养老保障和家庭经济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队伍。这支科研骨干力量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工具以及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并且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科研经历。申请人时间、精力充沛，依托学院内塑造的良好学术交流氛围，这将有助于确保本项目的高质量完成。

◆ **其他条件。**申请人所在学院还格外重视同国内外学术机构的交流工作。一方面与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及南京农业大学等业内知名高校常年保持交流合作，积极引进优秀师资力量；另一方面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建立密切联系，聘请多位国内外享誉盛名的农林经济学者担任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此举同样给本项目后续开展国内和国际合作研究带来很大帮助。

3. 正在承担的与本项目相关的科研项目情况（申请人正在承担的与本项目相关的科研项目情况，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和国家其他科技计划项目，要注明项目的资助机构、项目类别、批准号、项目名称、获资助金额、起止年月、与本项目的关系及负责的内容等）；

无



4.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对申请人负责的前一个已资助期满的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名称及批准号）完成情况、后续研究进展及与本申请项目的关系加以详细说明。另附该项目的研究工作总结摘要（限 500 字）和相关成果详细目录）。

无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 申请人同年申请不同类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列明同年申请的其他项目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信息，并说明与本项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已收到自然科学基金委不予受理或不予资助决定的，无需列出）。

无

2.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人是否存在同年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情况；如存在上述情况，列明所涉及人员的姓名，申请或参与申请的其他项目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单位名称、上述人员在该项目中是申请人还是参与者，并说明单位不一致原因。

无

3.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人是否存在与正在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情况；如存在上述情况，列明所涉及人员的姓名，正在承担项目的批准号、项目类型、项目名称、单位名称、起止年月，并说明单位不一致原因。

无

4. 同年以不同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申请或参与申请科学基金项目情况（应详细说明原因）。



无

5. 其他。

无

NSFC 2025



胡浩钰 （ BRID: 00377.00.66350 ） 简历

2025版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讲师

教育经历：

博士后工作经历：

无

科研与学术工作经历（博士后工作经历除外）：

曾使用其他证件信息：

无

近五年主持或参加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

无

近五年主持或参加的其他科研项目/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除外）：

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情况（填写代表性论文时应根据其发表时的真实情况如实规范列出所有作者署名，并对本人署名情况进行标注，包括：①作者署名按姓氏排序；②唯一第一作者；③共同第一作者；④唯一通讯作者；⑤共同通讯作者；⑥其他情况）：

一、代表性论著（请在“申请书详情”界面，点开“人员信息”-“代表性成果”卡片查看对应的全文）：

(1) Haoyu, Hu; Wei Wang; Ge Xin; Fangjin, Ye ; Impact of city size on self-employ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ese migrant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24, 95: 101802 （期刊论文）（本人标注：唯一第一作者）

(2) Haoyu Hu; Wei Wang; Ge Xin ; Enrollment in public pension program and household land transfer behaviour: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2023, 55(30): 3443-



3457 (期刊论文) (本人标注: 唯一第一作者)

(3) Haoyu Hu; Wei Wang; Fangjin Ye ; Tracking the role of self-employment on perceptions of citizenship: Evidence from 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22, 28(8): e2576 (期刊论文) (本人标注: 唯一第一作者)

(4) Haoyu Hu; Wei Wang; Dawei Feng; Hualei Yang; Zhongkun Zhu ; Number of children and monetary transfers to elderly parents in rural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2, 159(2): 593-615 (期刊论文) (本人标注: 唯一第一作者)

(5) 黄宏伟; 胡浩钰 ; “新农保”养老金制度与农村家庭生存型消费效应——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农业经济问题*, 2018, 461(5): 18-26 (期刊论文) (本人标注: 唯一通讯作者)

二、论著之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

无

NSFC 2025



附件信息

序号	附件名称	备注	附件类型
1	Impact of city size on self-employment behavior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SSCI)	代表性论著
2	Enrollment in public pension program and household	Applied Economics (SSCI)	代表性论著
3	Tracking the role of self - employment on perceptio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SSCI)	代表性论著
4	Number of children and monetary transfers to elder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SSCI)	代表性论著
5	“新农保”养老金制度与农村家庭生存型消费效应	农业经济问题 (CSSCI, 国家自科基金委管理学部A类期刊)	代表性论著

NSFC 2025



项目名称： 代际差异视角下生育政策调整的福利效应及保障策略研究
资助类型：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代码： G0410. 社会治理与社会保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和参与者承诺书

为了维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公平、公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本人在此郑重承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及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科研诚信建设有关规定和要求；申请材料信息真实准确，不含任何涉密信息或敏感信息，不含任何违反法律法规或违反科研伦理规范的内容；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评审和执行全过程中，恪守职业规范和科学道德，遵守评审规则和工作纪律，杜绝以下行为：

- （一）抄袭、剽窃他人申请书、论文等科研成果或者伪造、篡改研究数据、研究结论；
- （二）购买、代写申请书；购买、代写、代投论文，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违规购买实验数据；
- （三）违反成果发表规范、署名规范、引用规范，擅自标注或虚假标注科技计划等资助；
- （四）项目计划书中故意篡改降低项目申请书中相应指标；
- （五）以任何形式打听或散布尚未公布的评审专家名单及其他评审过程中的保密信息；
- （六）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联系有关专家进行请托、游说、“打招呼”，违规到评审会议驻地窥探、游说、询问等干扰评审或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行为；
- （七）向工作人员、评审专家等提供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电子红包，或提供宴请、旅游、娱乐健身等任何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活动；
- （八）违反财经纪律和相关管理规定的行为；
- （九）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背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活动；
- （十）其他弄虚作假行为。

如违背上述承诺，本人愿接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相关部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撤销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追回项目资助经费，向社会通报违规情况，取消一定期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以及接受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等。

申请人签字：



项目名称： 代际差异视角下生育政策调整的福利效应及保障策略研究

资助类型：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代码： G0410. 社会治理与社会保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单位承诺书

为了维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公平、公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我单位就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工作做出以下承诺。**

一、认真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等文件精神。

严格遵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进一步压实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任务承担单位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主体责任的通知》要求，建立和完善科研诚信教育、管理监督制度。

二、切实贯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基金工作管理办法》，认真履行管理主体责任，加强和规范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认真组织项目申请工作，注重提高项目申请质量，避免通过“全民动员”、设置硬性指标、实施与是否申请项目挂钩的奖惩措施等方式盲目追求项目申请数量。

三、严格按照《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有关申请的通知通告和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认真审核所有申请材料，确保本单位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确保在申请材料中不出现任何违反法律法规、违反科研伦理的内容；确保申请材料中没有任何涉密信息或敏感信息；确保申请人符合相应项目的申请资格；确保依托单位、合作研究单位、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不在限制申报、承担或参与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的期限内。

四、在项目申请和评审活动全过程中，遵守有关评审规则和工作纪律，杜绝以下行为：

（一）以任何形式探听未公开的项目评审信息、评审专家信息及其他评审过程中的保密信息，干扰评审专家的评审工作；

（二）组织、协助或纵容申请人或参与者向评审工作人员、评审专家等提供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电子红包等；宴请评审工作人员、评审专家，或向评审工作人员、评审专家提供任何可能影响科学基金评审公正性的活动；

（三）支持申请人采取任何不正当手段获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

（四）支持申请人或参与者虚假申报项目，甚至骗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五）支持申请人或参与者采取“打招呼”“围会”等方式影响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的公正性；

（六）拖延、包庇、阻碍、干扰请托案件等不端行为调查；

（七）其他违反财经纪律和相关管理规定的行为。

五、不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背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活动。

如违背上述承诺，本单位愿接受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相关部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停拨或核减经费、追回项目已拨经费、取消本单位一定期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以及主要责任人接受相应党纪政务处分等。

依托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

粤社科规专通〔2024〕7号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4 年度 青年项目立项通知书

胡浩钰同志：

经专家评审及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审批，您申报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4** 年度青年项目《人口负增长时代依托志愿服务增进低龄老人福利的新路径研究》获准立项，批准号：**GD24YSH01**，资助经费 **2.0** 万元，第一次拨款 **1.4** 万元，预留经费 **0.6** 万元。请尽快登录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平台认真填报预算，个人填报时间为 **2 月 27 日-3 月 15 日 12 点**，单位审核时间为 **2 月 27 日-3 月 15 日 17 点**。逾时未填报立项预算视

室

邮编：510635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

2024年2月27日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

您现在可以上传课题申请书

修改申请书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申 请 书

学 科 分 类：	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含民族学、 宗教学）
项 目 名 称：	人口负增长时代依托志愿服务增进低龄老人福利的新路径研究
项 目 分 类：	青年项目
项 目 负 责 人：	胡浩钰
负责人所在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填 表 日 期：	2023 年 8 月 27 日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
2023 年 8 月修订

申请者的承诺：

本人承诺对《申请书》所填各项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课题组成员、合作单位均已征得对方同意。若填报失实或违反有关规定，申请单位和课题负责人承担全部责任。如获准立项，本人承诺以本《申请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的有关规定，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预期研究成果。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和资料。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 表 注 意 事 项

一、本申请书请如实填写并打印。

二、本申请书部分栏目填写说明：

1、学科分类：按一级学科填写。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共设二十四个一级学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理论经济、应用经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含民族学、宗教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语言学、外国语言学、新闻学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及文献学、体育学、管理学、港澳台·特区问题研究、华侨华人国际问题研究、艺术学、教育学、心理学。

2、研究类型：指本项目研究属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综合研究。

3、主要参加者：必须真正参加本项目研究工作，不含项目负责人，不包括科研、财务管理人员。

4、预期成果形式：专著、研究报告、论文等。成果形式最多填写两项。

三、本申请书用 A3 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成册，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统一报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

申请书填写步骤：

1、项目基本信息、申请人基本信息、项目组成员信息通过下面相应按钮填报、修改。

a) 项目基本信息：

[\[点击此处修改\]](#)

b) 申请人基本信息：

[\[点击此处修改\]](#)

c) 项目组成员信息：

[\[点击此处修改\]](#)

d) 正在主持项目信息：

[\[点击此处填报\]](#)

e) 相关研究成果信息：

[\[点击此处修改\]](#)

2、课题设计论证正文内容直接在表格中填写（注：请严格遵循给定格式填报内容，不得删减或改动）。

f) 课题设计论证正文：

[\[点击此处填报\]](#)

3、点击“检查填报内容并保护文档”按钮，以检查填报内容是否符合要求并对本申请书进行保护。为了防止申请书被他人篡改，可以在保护过程中设置密码，但请牢记以便在修改申请书时使用。检查完成后，才可以在申报网站上传申请书，否则不能上传。

4、打印、上传申请书（注：请确保打印的纸质申请书版本号与申报系统中上传的电子版申请书版本号保持一致）。

一、项目负责人、主要参加者情况：

项目名称		人口负增长时代依托志愿服务增进低龄老人福利的新路径研究			项目类别		青年项目	
学科分类		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含民族学、宗教学）			研究类型		应用研究	
姓名	胡浩钰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证件号码								
职称		讲师		最后学历		研究生		
				最后学位		博士		
研究专长		养老保障、老龄社会治理						
工作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		手机号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				邮政编码		510642
主要参加者	姓名	职称	研究专长	学位	学历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本人签字
		教授	养老金经济学	博士	研究生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养老金经济学	博士	研究生		华南农业大学	
		副教授	人口与社会保障	博士	研究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助理研究员	人口经济学	博士	研究生		江西财经大学	
		讲师	人口经济学	博士	研究生		华南农业大学	
		助理研究员	老龄社会治理	博士	研究生		湖南大学	
		研究实习员	志愿服务	硕士	研究生		广东省中山市南区街道办事处	
预期成果形式 1		研究报告		字数（万字）		3		
预期成果形式 2				字数（万字）				

申请经费（万元）	2	计划完成日期	2025-9-30
----------	---	--------	-----------

二、课题设计论证：

内容提示：1、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选题意义和价值；2、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基本思路和方法；3、本研究的预期成果，包括成果名称、成果形式、成果字数、完成时间、社会效益等；4、项目负责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限填 5 项）；5. 主要参考文献（限填 10 项）。本论证限 5000 字，可加页，请严格执行字数要求。

项目名称：人口负增长时代依托志愿服务增进低龄老人福利的新路径研究

预期成果形式：研究报告

1 [选题依据]

从 2022 年底开始，中国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这意味着挖掘人口红利的重点将从此前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优势，逐步转向以人口质量提升为基础的人力资本红利。低龄老人作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开拓的关键主体，普遍具备重新融入社会的热情、能力和健康条件，积极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也多次强调发挥其人力资本优势，鼓励其以社会参与的形式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目标。然而，聚焦到志愿服务活动方面，目前关于低龄老人的参与动机是什么、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如何、政府需要扮演好怎样的角色等，皆为理论与实务界亟待回应的核心问题。

1.1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1.1.1 中老年福利测度与评价

虽然目前对中老年福利的测度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但其内涵已由效用延伸至偏好、幸福与能力方面（Grewal et al., 2006）。现有研究证实，利用 Sen 的可行能力理论展开分析比较严谨（Anand et al., 2015；Naidoo, 2019；Parey, 2021；解垚, 2015；李旻等, 2020；王武林等, 2021）。具体地，学者们基于该方法，主要从身体健康、心理状态、社会经济条件和生活质量感知上选取合适指标测度中老年福利（Amarante and Colacce, 2022；欧阳鑫和张应良, 2023）。结果表明在中国，尽管中老年人的福利水平整体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张苏和王婕, 2015；周云波等, 2022），但相对剥夺现象依旧存在（韩华为等, 2017；焦娜和郭其友, 2021）。

1.1.2 志愿服务和中老年福利

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是否作为一种负担，进而损害其自身福利，学术界对此尚且存在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志愿服务有助于老年人改善健康状况（Pettigrew et al., 2020; Chang et al., 2022; 高翔和温兴祥, 2019; 倪晨旭等, 2023）、树立积极的老化态度（Liu et al., 2020）、提高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Matthews and Nazroo, 2021; Jongenelis et al., 2022），以及减少抑郁和死亡风险（O'Reilly et al., 2017; Cheng et al., 2021）。少数研究则表明志愿服务参与对中老年福利的正面影响并非始终成立，其还具体取决于投入时长、频率和项目类型等（Windsor et al., 2008; Musick et al., 1999）。此外，鉴于个体间存在异质性特征，不同人群的福利水平受到志愿服务参与的作用程度同样有所差别（苗青和张玉, 2017; Huang, 2019; van Tienoven et al., 2022）。

1.1.3 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保障策略研究

在人口红利渐行消失之际，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本，始终离不开“老有所养”的物质保障。学术界目前主要从外部环境，尤其是制度规范上探讨了老年人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保障策略。例如，Liu et al. (2022) 发现社区资源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Huang and Zhang (2021)、Nguyen (2021)、Bando et al. (2022) 分别揭示了中国、越南与拉丁美洲国家养老金制度的重要性。然而，聚焦到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方面，张文超等（2021）和 Ge and Jin (2023) 则相继证实个体金融资产或养老金，以及当地经济环境等暂且无法充当有效的保障策略。

1.1.4 研究评述

1.2 选题价值

2 [研究内容]

2.1 框架思路

本课题包括4个部分，结合人口负增长的现实背景，以参与志愿服务为切入点，按照“典型事实刻画—福利增进效应建模与实证—激励-保障机制有效性检验—政策方案优化”的分析逻辑展开，详情如图1所示。

①梳理老年福利、志愿服务参与的研究进展，厘清两者的**概念内涵**。②结合中老年志愿者数量近年来日益增加的现实背景，拟利用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等大型微观数据集构造多期面板，在**可行能力理论**指引下，围绕低龄老人的生活条件、亲子关系、身心健康与认知功能等**建构多维福利评价体系**，并相应地刻画出**志愿服务参与特征**，同时围绕不同组群、不同年度展开**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

①基于低龄老人福利状况呈现稳中向好的特征事实，厘清志愿服务影响该群体福利的各类因素后，继而围绕**志愿服务参与和低龄老人福利水平的关系建模**，强化实证分析的理论支撑。②设计严谨的实证方案，利用OLS模型**初步估计出志愿服务参与对低龄老人福利水平**

的增进效应，随后分别运用粗糙精确匹配法（CEM）、逆概率加权法（IPWRA）、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工具变量-面板固定效应模型（FE-IV）、条件混合过程法（CMP）以及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D）等缓解内生性偏误，增强估计结果的准确性。③依托角色理论和活跃理论等，构建“志愿服务参与—个人获得与社会互动—低龄老人福利”的传导路径。具体拟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别选取多维福利指数、志愿服务参与作为核心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以个人获得和社会互动充当多重中介变量，论证志愿服务参与能否通过丰富角色、提升技能以及增加社会资本等渠道实现老年福利增进目标。

为了夯实低龄老人福利增进效应的作用路径，以及满足全面推进老年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的需要，拟分别从政府、社区/社工组织和老年志愿者三方入手，完善现行的激励-保障机制。①主要结合老年人的参与意愿和参与机会确定度量指标，包括老年人对现有志愿服务项目是否感兴趣、参与过程中有无成就感等收获，以及社区有无搭建志愿者服务平台、社工机构有无定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②区分项目类型、参与者年龄和能力等引致的潜在差异，拟具体按照性别、年龄和学历分组。③构造交互项的形式展开实证分析，全方位、多角度论证激励-保障机制运行的有效性。

本部分致力于改善政策方案的落地效果。①收集推动老年志愿者参与基层治理活动的实践案例，总结归纳该群体的参与动机、路径、成效及面临的困境。②重点以日本东京和中国广州为例，梳理动员老年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的政策推行经验。③重视低龄老人的异质性及其福利增进问题的特殊性，改进原有政策框架。④鉴于低龄老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稳步提升，应继续立足福利增进的制约因素与优化条件，设计合理的依托老年志愿服务加快老龄社会建设的政策组合方案。例如坚持党建引领，推动退休党员成为老年志愿服务队伍的先锋与中坚力量；创新基层助老服务机制，加快培育“时间银行”、“初老服务老老”等多样化模式。

2.2 重点和难点

2.3 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3 [预期成果]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完成时间	预期社会效益
论文	志愿服务参与下老年福利增进效应研究——一个前沿综述	CSSCI 发表	①通过发表系列论文,推动志愿服务增进老年福利问题的学术探讨。 ②最终成果可以为地方政府加快老年志愿服务发展、打造老龄社会治理新格局等提供决策依据。
	Does volunteer service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Chinese older people?	SSCI 发表	
	Volunteering and older adults' cognition in urban China	SSCI 发表	
研究报告	依托志愿服务增进老年福利 加快老龄社会建设的路径与政策研究(3万字左右)	提交省哲社办	

4 [前期相关研究成果]

申请人长期深耕于老年福利增进效应和劳动者就业决策等,研究具有较强的连贯性和系统性。目前已主持完成 2 项课题、以主要成员身份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 项(其中 1

项结题材料入选**202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各1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15篇和本课题相关的论文。主要代表作如下所示:

① Enrollment in public pension program and household land transfer behavior: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一作, SSCI

② Number of children and monetary transfers to elderly parents in rural China, 一作, SSCI

③ Tracking the role of self-employment on perceptions of citizenship: Evidence from 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一作, SSCI

④ Relationships between migration and the fiscal sustainability of the pension system in China, 一作, SSCI

⑤ 《“新农保”养老金制度与农村家庭生存型消费效应——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二作, CSSCI

5 [参考文献]

- [1] 李磊, 李连友. 习近平关于老年志愿服务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理论内涵及现实意义[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 68-75.
- [2] 倪晨旭, 郭诗怡, 彭洋洋等. 新时代银龄行动: 志愿服务参与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23 (2): 68-83.
- [3] 欧阳鑫, 张应良.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差距与福利不平等[J]. 农业技术经济, 2023 (2): 78-93.
- [4] 王武林, 冯浩铭, 纪庚.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老年人养老保障水平及供给框架研究[J]. 人口研究, 2021 (5): 79-90.
- [5] 张文超, 吴远洋, 杨华磊. 志愿服务、年龄差异与主观幸福感[J]. 南方经济, 2021 (3): 106-124.
- [6] Amarante, V. and Colacce, M., 2022,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mong Older People in Fiv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59(3): 945-965.
- [7] Anand, P., Gray, A., Liberini, F., Roope, L., Smith, R. and Thomas, R., 2015, Wellbeing Over 50[J].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6: 68-78.
- [8] Bando, R., Galiani, S. and Gertler, P., 2022, Another Brick on the Wall: On the Effects of Non-Contributory Pensions on Material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5: 16-26.
- [9] Huang, W. and Zhang, C., 2021, The Power of Social Pensions: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 13(2): 179-205.
- [10] Liu, Y., Duan, Y. and Xu, L., 2020, Volunteer Service an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Aging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Health[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65: 113535.

注：1、本栏不能直接或间接透露课题组背景信息。2、“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只填写成果名称、成果形式、成果数量、独著或合著等信息，不能填写成果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发表或出版时间等。3、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承担或完成的项目不写入前期成果。4、项目负责人的相关著作不列入参考文献。

三、项目负责人正在主持的其他项目：

项目名称	批准单位	项目类别	批准时间	是否省部级或以上项目

四、项目负责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限填 5 项，与课题设计论证一致）：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作者署名	发表/出版/采纳单位	发表/出版/采纳时间
论文	Enrollment in public pension program and household land transfer behavior: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第一作者	Applied Economics	2023-6-27
论文	Number of children and monetary transfers to elderly parents in rural China	第一作者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2-1-15
论文	Tracking the role of self-employment on perceptions of citizenship: Evidence from 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第一作者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22-11-30
论文	Relationships between migration and the fiscal sustainability of the pension system in China	第一作者	PLOS ONE	2021-4-18
论文	“新农保”养老金制度与农村家庭生存型消费效应——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第二作者	农业经济问题	2018-5-23

五、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

内容提示：申请书填写内容是否属实；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是否适合承担本项目研究；能否提供项目完成所需时间、条件；是否同意承担本项目管理 and 信誉保证。

申请书填写内容属实；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适合承担本项目研究；能提供项目完成所需时间、条件；同意承担本项目管理 and 信誉保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四

—
□
×

项目信息

批准号:

25BKC.335

项目分类:

年度项目

原田始:

数智化背景下人工智能破解就业“内卷”化治理机理与政策创新研究

所属省市:

江西省

责任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

民人：

冯大成

项目子类:

一般项目

项目状态:

任研

一级子科:

科学技术与社会

课题组成员信息

成员顺序	姓名	证件类型	职称	所在单位	学位	研究方向	分工情况
1	胡青旺	身份证	副高级(副教授、副研究员等)	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	劳动经济学	
2	刘桂娟	身份证	副高级(副教授、副研究员等)	广州市社会科学学院	博士	劳动经济学	
3	冯昊	身份证	正高级(教授、研究员等)	广州市社会科学学院	硕士	发展经济学	
4	范萌	身份证	中级(讲师、助理研究员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博士	产业经济学	
6	王晋军	身份证	无	深圳大学	硕士	发展经济学	
7	常品明	身份证	无	江西财经大学	学士	劳动经济学	
8	陈磊	身份证	无	江西财经大学	学士	劳动经济学	

没有更多可展示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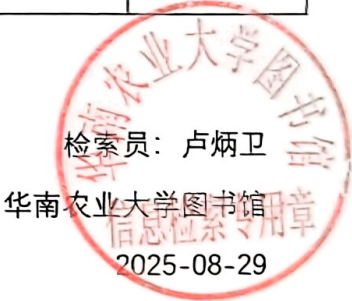
检索证明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论文材料，委托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胡浩钰(学科类型:人文社科) 1 篇论文收录情况如下表。

序号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及发表的年月卷期/页码等	作者排名	论文等级	作者文中单位	收录情况	影响因子	中科院大类分区
1	Impact of city size on self-employ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ese migrant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出版年: 2024 出版日期: DEC 卷期: 95 页码: - 文献号: 101802 文献类型: Article	第一作者	A 类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SSCI	IF2-year=3.4 IF5-year=3.5 (2024)	经济学 2 区 Top 期刊: 否 OA 期刊: 否 (2025)

说明: 论文等级和中科院大类分区按《华南农业大学学术论文评价方案(试行)》划分。

报告免责声明: 如未盖章, 报告无效





Impact of city size on self-employ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ese migrants

Haoyu Hu^a, Wei Wang^b, Ge Xin^{b,*}, Fangjin Ye^b

^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Policy and Reform Innovation Laboratory,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483, Wushan Street,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b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777 Guoding Road, Shanghai, China

ARTICLE INFO

Keywords:

City size
Self-employment
Rural-to-urban migrant
Urban-to-urban migrant
China

ABSTRACT

Self-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migrants to gain a foothold in cities and improve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welfar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size and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behavior using data from the 2011–2018 CMDS and macro-statistical sources. We find that in the Chinese context, larger cities correlate with an increased likelihood of migrants engaging in self-employment. These results persist under various methodological checks, including alternative estimation methods, sample screening techniques, and addressing concerns about endogeneity. Market potential and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emerge as importan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larger cities encourage migrants' decisions to pursue self-employment. Moreover, the positive impact of larger cities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and own-account workers compared to urban-to-urban migrants and employers. This paper provides insights in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migrant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large cities in China.

1. Introduction

There are extensive works on the effects of city size on human activities spanning disciplines such as geography,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At the macro level, several scholars have pointed out that city expansion promotes not only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Shen et al., 2019; Wang, 2021) but also urban employment demand (Huang et al., 2021)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Kim et al., 2014). At the micro level, existing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potentially positive effects of city size on urban resident/migrants' preference for larger cities (Xing & Zhang, 2017), wage premium (Pan et al., 2019), permanent settlement intention (Liu & Wang, 2020), and life satisfaction (Chen et al., 2015; Zelinsky et al., 2021; Carlsen & Leknes, 2022). By contrast, it is found that rapidly expanding cities also generate negative influences, such as an increase in commuting costs (Nie & Sousa-Poza, 2018) and deepening inequality (Chen et al., 2018). Thus far, however, minimal work has been done to discuss the role of larger cities in Chinese migrants' self-employed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 in China have implemented policies to encourag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for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Liu et al., 2021). Self-employment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simplest forms of entrepreneurship (Blanchflower & Oswald, 1998; Glaeser et al., 2010; Huang et al., 2020) to tackle unemployment (Carree et al., 2015), and maintain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stability (Stephens et al., 2013; Frankish et al., 2014). Studies such as Boeri et al. (2020) propose that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xin.ge@sufe.edu.cn (G. Xin).

self-employment is on the rise globally, and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also showed that the annual average rate of self-employment in China exceeded 10 %, during the two decades from 1989 to 2009.

Literature on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self-employment behaviors is abundant, but it is usually reflected in three dimensions: individual, family,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Specifically, Ciprikis et al. (2023) conclude that age and marital status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self-employment, while Gomeza et al. (2024) and Yang et al. (2023) points out tha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being an only child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mployment. The empirical findings of Lukes et al. (2019) demonstrate that independence and creativity exert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elf-employment among European young ad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level factors, prior studies hav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housing wealth and the number of siblings in the decision to become self-employed (Schmalz et al., 2017; Li & Wu, 2018). Using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China, Li and Goetz (2019) confirm that having at least one parent who was self-employed prior to the socialist transition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their child being a self-employed individual following the economic reform. Huang and Xin (2022) and Hu et al. (2023) uncover a positive nexus between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pursuit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among rural-based entrepreneurs in eastern regions. Finally, existing works mainly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self-employment, such as credit accessibility (Ma et al., 2019), skill diversity (Zhang, 2020), cultural norms and cultural origin (Zhang, 2020; Jonsson & Ouyang, 2023).

In China, the influx of domestic migrants into the cities has increased over time, rising from 6.57 million in 1982 to 221 million in 2010, and further to 376 million at the end of 2020, accounting for 0.7 %, 16.5 %, and 26.6 %, respectively,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population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21). Most migrants tend to have lower levels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and face much greater socio-economic challenges than other social groups, due to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hukou* system and prejudices that may result from their low position in the social hierarchy (Li & Rose, 2017; Du et al., 2018; Zhou & Guo, 2020; Xin and Huang, 2024). As the main occupational choice of urban migrants (Zhu et al., 2023), several scholars have demonstrated the fact that self-employment can b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enhancing settlement intentions and perceptions of citizenship (Cao et al., 2015; Ning & Qi, 2017; Hu et al., 2022). Moreover, Zou and Deng (2023) pointed out that the main role of migrants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one of the potential pathways to promote employment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Nevertheless, for a migrant, her or his intention to pursue self-employment in larger cities should be viewed as a rational choice based on the trade-off between benefits and cos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size and the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behaviors. Specifically, leveraging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 dataset from 2011 to 2018 covering 28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we affirm that large citie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fostering self-employment among the Chinese migrants. And we also show significant heterogeneous effects across different migrants' origins and types of self-employment. For instance, the rural-to-urban migrants and the own-account workers –accounting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overall sample – impact disproportionately more from the expansion of cities. Moreover, we discuss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size of city affects the self-employment choice of migrant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ities undergoing rapid expansion generate greater market potential and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consequently offering new avenues for self-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is article's contributions are fourfold. First, although various scholars have revealed the benefits/consequences of city expansion,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self-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ccupation choice. Theoretically, large cities are both rich in salaried jobs due to their denser distribution of related industries and tend to generate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ereby leading to uncertainty about the effect of city size on self-employment behavior.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wo relevant studies that have attempted to investigate the link between city size and residents' self-employment decisions are based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y focused on ordinary people or university students, rather than migrants. The present study is among the first efforts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ity size and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behaviors in China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own-account migrants and employer-type migrants, which adds to an underexplored area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 decisions. Second, we propose a mechanism-bas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demonstrate the plausibl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 city size may affect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To be specific, our results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facilitated by city expansion in promoting self-employment. Third, our paper explicitly consider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existing in migrants' origins and types of self-employment, which confirm that individuals featuring rural *hukou* or employers without employees may impact more when they are poured into a larger city, providing insights for urban policy design in larger cities. Finally, it is also a timely reference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here city expansion and self-employment are both heated issues for central and local policy-making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urging cross-regional migration in China.

The remainder of the article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In the next section we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erives our main hypothesis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third section introduces the data, measurements and methodology. The fourth section analyses the main empirical results, followed by further discussion in the fifth section. The sixth section concludes.

2.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literature that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city size and individuals' self-employment mainly focuses on tha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Using the dataset on Italian university graduates, Di Addario and Vuri (2010) find that although the returns of self-employment increase with urban population density,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self-employed falls by 2–3 % in regions with the highest population density.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an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led to intens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an increase in land prices, which could create barriers to young university graduates' engagement in self-employment activities. On the contrary, based on Japanese county-level data, Sato et al. (2012) report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individual decisions to pursue self-employment, especially in areas with very high or very low population densities. Despite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urban size and self-employment, there remains insufficient evidence on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choices caused by city size. We aim to further bridge this strand of literature and reveal whether and how city size affects migrants' decisions about self-employment in China, where high economic growth rate has been sustained for over 40 years, with the soaring number of migrants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Thus, we propose the first hypothesis as follows:

Hypothesis 1: The choice of self-employment of migrant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ity size.

Following this investigation, we need to explain how a larger city could impact a migrant's choice of self-employment by considering their expected benefit gain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a self-employment activity. As existing literature discusses, city size would affect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through two major mechanisms: market demand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Regarding the demand effect, it is suggested that when the urban population size increases, the market demand is usually larger (da Mata et al., 2007; Pokharel et al., 2021), therefore large urban size can not only encourage self-employed people to expand their business scale but also adequately stimulate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self-employment activities among the potential self-employed. Referring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nson, 2005; Qiu et al., 2021; Luo et al., 2023), we introduced the market potential indicator in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to measure the size of the market demand effect. The market potential function was first proposed by Harris (1954), who argued that the potential deman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produced in a location is equal to the proximity of that location to the consumer market. We consider market potential (MP) to be composed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market potential, which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MP_{c,t} = \sum_{j \neq c} \frac{Y_{j,t}}{D_{c,j}} + \frac{Y_{c,t}}{D_{c,c}} \quad (1)$$

where $D_{c,c} = \frac{2}{3} \sqrt{\frac{area_c}{\pi}}$, subscripts c and j represents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t indicates the year. $Y_{j,t}$ indicates the income level of city j in year t , which intuitively reflects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city, and in the practical calculation process we refer to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100 million yuan) from the *China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D_{c,j}$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city c and city j in year t , where in practice we use the straight-line distance (kilometers) between the two cities. Furthermore, the variable *area* is determined by city's administrative land area (square kilometers).

Market potential (demand) is likely to increase as cities expand, offer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self-employment. Broadly speaking, consumer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new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ephens et al., 2013). The higher the products (market) demand is, the more self-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higher self-employment returns there may be (Hanson, 2005; Zheng & Du, 2020; Zhang, 2020). For example, mega-cities with large populations, like Beijing or Shanghai, have a strong economic base and cost-effective high-speed railways connecting them with surrounding cities, which makes it easier for consumers in other regions to enter local markets to purchase goods and services, and thus raises the market demand for products. The increase in market demand and the high returns of self-employment can motivate migrants to be self-employed and expand their production scale to obtain economic benefits from the expansion of market demand (Zheng & Du, 2020). Therefore, in view of the above argument we propose the second hypothesis:

Hypothesis 2: The larger cities can better encourage migrants to engage in self-employment by exploiting market potential.

Another factor, agglomeration effects of the large cities, is also important in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decisions. Input sharing, labor market pooling,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in large cities can create a significant agglomeration effect (Marshall, 1920; Rosenthal & Strange, 2008; Redding, 2013; Huang et al., 2021). For instance, the proximity of companie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facilitates not only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but also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Jacobs, 1969; Quigley, 1998; Zheng & Zhao, 2017), which would be attractive to potential self-employed migrants by generating some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for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y,¹ we follow the standard practice in the mainstream works and define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as a proxy (Lu et al., 2013; Wang et al., 2020; Hoang & Schiller, 2023; Keeler & Stephens, 2023).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refers to the agglomeration of multiple different industries. This concept reveals the external effects that occur between industries and emphasizes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industries that bring vitality to the city and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Ma et al., 2023). Here we use 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to verify it. The specific calculation formula of diversification was set as follows:

$$Diversification_j = 1 - \sum_i \left(\frac{E_{ij}}{E_j} \right)^2 \quad (2)$$

where the subscripts j and i indicates the city and industry, respectively. E_{ij} is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n the industry i of city j ; and E_j indicates the total number of employees in all industries in the city j . The value of these indicators is between 0 and 1. If there is a concentration of employment in only two industries in a given region, the level of diversity reaches the minimum value of 0. On contrary, the larger the value,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diversification there is in the city j .

Specifically, aggregation facilitates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regarding self-employment, which makes it easier for potential self-employed migrants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existing self-employed people, and reduces the information cost and uncertainties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self-employed (Acs & Sanders, 2013). Moreover,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aggregation, the

¹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specialization externalities and diversification externalities.

denser the network distribution of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asily available financial consulting and services can help self-employed migrants ease their credit constraints and reduce financing costs (Ma et al., 2019).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can also reduce the costs of raw materials and increase the labor supply, which allows self-employed individuals to engage in production at lower costs (Di Addario & Vuri, 2010). Accordingly, we draw the third hypothesis:

Hypothesis 3: The larger cities can better encourage migrants to engage in self-employment due to the advantag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3. Data and measurements

3.1. Data

The micro- and macro-level data for this research comes from two datasets: the CMDS 2011–2018 and *China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s*.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China and coordinated by the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CMDS covers 30 Chinese mainland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t adopts a multistage stratified sampling strategy and a probability-proportional-to-size sampling method to survey migrants aged 15 and above who have lived in their current location for more than one month and are not registered in the city. The dataset contains information including migrant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employment status, income and expenditure.

We further screen the migration samples in two ways. First, we focus on municipal districts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cluding four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exclude counties and county-level cities.²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 "What kind of employment status do you currently belong to", we only keep respondents who reported the "employed" status, and remove those who reported their status as "unemployed", "housework" or "retired". This screening process generated a final sample of 990,951 observations from 284 prefecture-level or above cities in China.³ Based on *hukou* classifications, our sample primarily contains rural-to-urban migrants (85.1 %, $n = 843,185$); urban-to-urban migrants account for the remaining 14.9 % ($n = 147,766$).

3.2. Variable definition

In the CMDS 2011–2018 questionnaire, the respondents' options for reporting their employment status include "employee", "employer", "own-account worker", and "others". Following the standard practice of mainstream literature (Hu et al., 2022; Feng & Ren, 2023; Omar et al., 2023; Zhang et al., 2024), we therefore consider respondents with a status of "employer" or "own-account worker" as self-employed migrants.⁴ We construct three dichotomous variables – self-employed individual, own-account worker, and employer. Fig. 1 illustrates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migrants engaging in self-employment activities. It shows that the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ratio of 39.8 % far exceeds that of local residents (13.1 %). The proportions of self-employed migrants with and without employees in the full sample are 8.1 % and 31.7 %, respectively. But those proportions vary significantly between urban-to-urban and rural-to-urban migrants. Of the 30.3 % urban-to-urban self-employed migrants, 9.6 % choose to be an employer, compared to 7.8 % of the 41.5 % rural-to-urban self-employed migrants.

As of 2020, there were 293 prefecture-level or above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22). Following previous studies, we employ urban population size as a proxy for city size (Au & Henderson, 2006; Kim et al., 2014; De La Roca & Puga, 2017; Chen et al., 2018). We use the number of permanent residents in the urban district to measure the urban population size. To ensure the robustness of our empirical results, we follow Shen et al. (2019) and utilize an additional indicator to capture city size: the amount of non-farm employment. As shown in Fig. 2, the top 10 cities classified by permanent population size in 2015 were Shanghai, Beijing, Chongqing, Tianjin, Guangzhou, Shenzhen, Chengdu, Dongguan, Nanjing, and Wuhan. Fig. 3 displays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migrants from 2011 to 2018, and illustrates the large concentration of migrants in Shanghai, Beijing, Tianjin and Chongqing.

In addition, we account for potential confounding factors at the individual and city levels. Self-employment usually involves more uncertainty and risk than paid employment (Kambayashi & Kato, 2017). Age and education can better reflect migrants' social experience and human capital, and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determine whether migrants can obtain stable and satisfactory jobs. Following the mainstream work on self-employment (Liu et al., 2019; Zhang, 2020; Hu et al., 2022), we also control for other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such as gender, marital status, years of residence and urban *hukou* status. For our city-level control variables, we follow Ghani et al. (2013), Yin et al. (2019) and Pan and Yang (2019) to include macro-level statistical indicators – levels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nemployment rate. The data for those indicators comes from various years of the *China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Table 1 displays th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each variable.

3.3. Model specification

We follow previous literature and employ a Probit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city size on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activity

²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imarily employs permanent residents of municipal districts as the statistical basis for defining city size, we have implemented the aforementioned sampling steps.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gov.cn/xinwen/2014-11/20/content_2781156.htm.

³ We have provided a list of all cities in the appendix (see Table A1).

⁴ Own-account workers are self-employed without paid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are self-employed with at least one employ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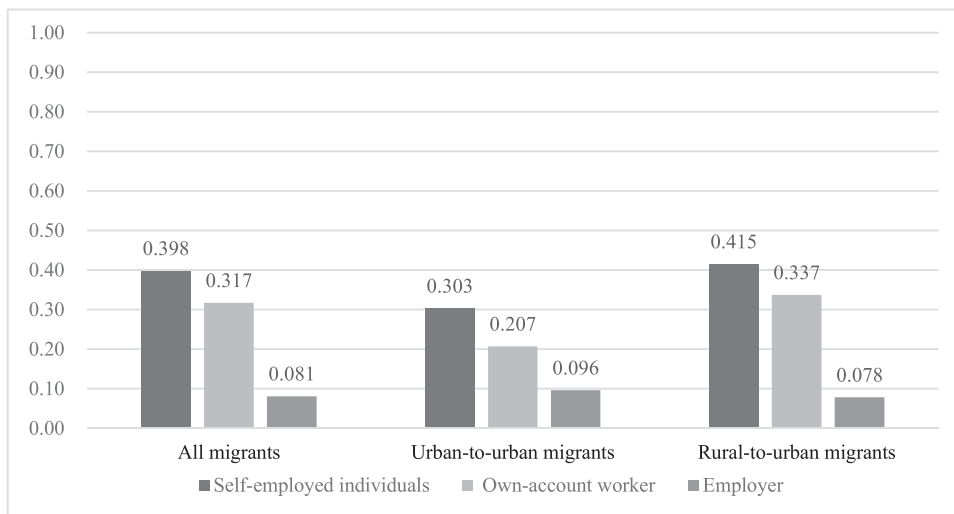


Fig. 1. Ratio of Self-Employed, Own-Account Workers and Employers Among Migrants. Sourc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2011–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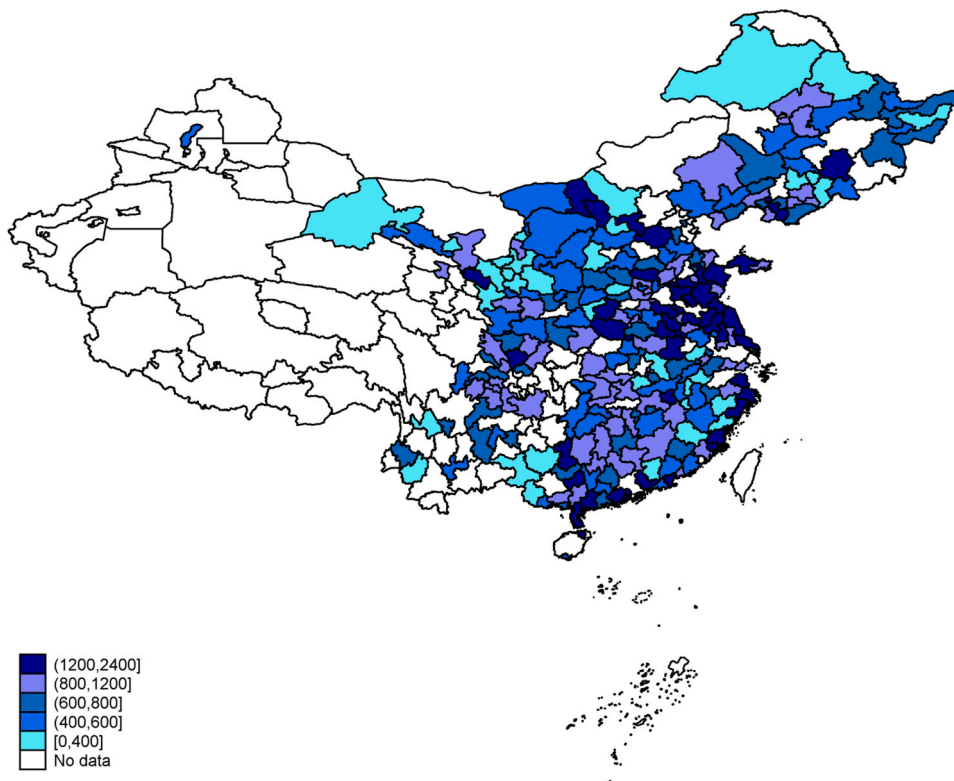


Fig. 2. Urban Population Size in 2015. Source: The 2016 China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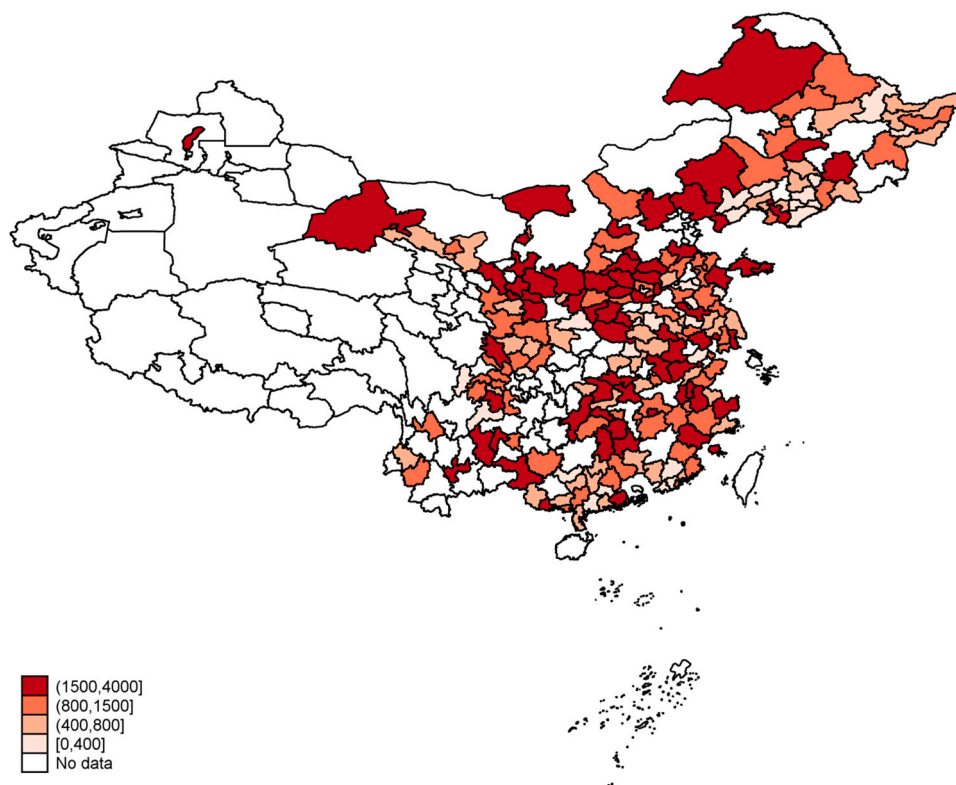


Fig. 3.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igrants in 2011–2018. Sourc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2011–2018.

Table 1

Summary Statistics for Main Variables.

Variables	Description	Obs.	Mean	Std. dev
Self-employed	Yes= 1; other= 0	990,951	0.398	0.489
Own-account worker	Yes= 1; other= 0	990,951	0.318	0.466
Employer	Yes= 1; other= 0	990,951	0.081	0.272
Urban population size	Number of permanent residents in municipal districts (million)	990,951	5.603	6.610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ize	Number employed in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million)	990,951	1.542	2.134
Age	Age of interviewee (year)	990,951	34.630	9.292
Gender	Male= 1; female= 0	990,951	0.588	0.492
Married	Married= 1; unmarried= 0	990,951	0.727	0.446
Hukou status	Rural= 1; urban= 0	990,951	0.851	0.356
Educational attainment	Years of schooling (year)	990,951	10.100	2.970
Years of residence	The year when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minus the year of the current inflow into the city (year)	990,951	4.989	5.102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Log (per capita GDP)	990,951	11.060	0.573
Industrial structure	Share of tertiary industry in GDP	990,951	0.472	0.127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Share of year-end financial institution loan balance in GDP	990,951	1.433	0.743
Unemployment rate	Urban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990,951	2.343	1.602

(e.g., Li & Goetz, 2019; Xiang et al., 2021; Zhu et al., 2022; Hu et al., 2023; Zhou & Liu, 2024). As a robustness check, we also utilize both the Logit model and the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LPM) to estimate the likelihood of engaging in self-employment.⁵ We use Eq. (3) as a baseline model to test our hypothesis. Specifically, we regress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on city size while controlling for a

⁵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LPM technique offers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 of straightforward computation of marginal effects. Nonetheless, the model has two key limitations: first, its fit to the data is suboptimal; second, the predicted probabilities for individual observations may fall below 0 or exceed 1 (Xiang et al., 2021; Rajkhowa & Qaim, 2022). Furthermore, similar to the Probit model, the Logit model is essentially a non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and is known for its effective fit.

serie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city-level variables. We lag the independent and control variables by one year to alleviate potential reverse causality concerns.

$$\text{Prob}(Y_{i,j,t}) = \beta_0 + \beta_1 \text{City Size}_{j,t-1} + \beta_2 X_{i,j,t} + \beta_3 Z_{j,t-1} + \eta_p + \omeg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3)$$

where $Y_{i,j,t}$ is the outcome variable that represents the employment type of migrant i in city j in year t . It is coded as 1 for respondents who are self-employed in the year of survey, and 0 otherwise.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ext{City Size}_{j,t-1}$ denotes the size of city j at year $t - 1$. $X_{i,j,t}$ are individual-level variables of migrant i in city j in year t . $Z_{j,t-1}$ are variables of city j in year $t - 1$. η_p denotes city fixed effects, which helps account for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that does not change over time in the same city (e.g., certain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ω_t denotes year fixed effects that take into account time trends or time-specific shocks. $\varepsilon_{i,j,t}$ is the error term. β_1 is the core coefficient of interest that reflect the impact of city size on the likelihood of being a self-employed migrant, and according to our Hypothesis 1, we expect β_1 to be positive. Additionally, acknowledging the binary nature of self-employment behaviors, we also apply the Logit model and the LPM technique in our robustness checks for estimation.

In light of the potential endogeneity concern between city size and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behavior, we aimed to achieve unbiased estimation results by selecting suitabl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IVs). Subsequently, we employed the two-stage least squares (2SLS) method for estimation. To be more specific, the first-stage empirical model for IV regression is formulated as follows:

$$\text{City Size}_{j,t-1} = \alpha_0 + \alpha_1 \text{Instrument}_j + \alpha_2 X_{i,j,t} + \alpha_3 Z_{j,t-1} + \varepsilon_{i,j,t} \quad (4)$$

where $\text{City Size}_{j,t-1}$ is the outcome variable. Instrument_j represent the IV, and other controls are defined as in Eq. (3).

Once established that the Instrument_j affects city size, subsequent equations that examine the impact of city size on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decisions, directly use Instrument_j as an IV for city expansion. We utilize the following equation:

$$Y_{i,j,t} = \omega_0 + \omega_1 \overline{\text{City Size}_{j,t-1}} + \omega_2 X_{i,j,t} + \omega_3 Z_{j,t-1} + \eta_p + \omeg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5)$$

Where $\overline{\text{City Size}_{j,t-1}}$ denotes the predicted value obtained from the first-stage regression results, while the definitions of other variables remain consistent with Eq. (3).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o test the role of market potential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size and migrants' choice of self-employment, we follow the practice of mainstream studies (e.g., Alesina & Zhuravskaya, 2011; Cheng & Smyth, 2021; Rajkhowa & Qaim, 2022; Zou & Deng, 2023; Li & Tong, 2023; Zhang et al., 2024), and use the following equations:

$$\text{Citymp}_{j,t} = \gamma_0 + \gamma_1 \text{City Size}_{j,t-1} + \gamma_2 X_{i,j,t} + \gamma_3 Z_{j,t-1} + \eta_p + \omeg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6)$$

$$\text{Self-employed}_{i,j,t} = \partial_0 + \partial_1 \text{City Size}_{j,t-1} + \partial_2 \text{Citymp}_{j,t} + \partial_3 X_{i,j,t} + \partial_4 Z_{j,t-1} + \eta_p + \omeg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7)$$

$$\text{Citydiv}_{j,t} = \theta_0 + \theta_1 \text{City Size}_{j,t-1} + \theta_2 X_{i,j,t} + \theta_3 Z_{j,t-1} + \eta_p + \omeg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8)$$

$$\text{Self-employed}_{i,j,t} = \delta_0 + \delta_1 \text{City Size}_{j,t-1} + \delta_2 \text{Citydiv}_{j,t} + \delta_3 X_{i,j,t} + \delta_4 Z_{j,t-1} + \eta_p + \omeg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9)$$

where $\text{Citymp}_{j,t}$ and $\text{Citydiv}_{j,t}$ are the market potential and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indicators we calculate according to Eqs. (1) and (2) of city j in year t , respectively. It is important to highlight that for any potential mediator acting as a mechanism, it should not only be correlated with city size but also associated with self-employment decisions. Moreover, when regressing self-employment decisions on city size and a set of controls, incorporating the mediator as an additional covariate in the model should lead to a reduction in the coefficient magnitude for city size (Alesina & Zhuravskaya, 2011; Cheng & Smyth, 2021).

4. Empirical results

4.1. Baseline estimates

Table 2 reports the baseline estimates of our empirical analysis. As depicted in Columns (1) – (3), we obtain substantial evidence in favor of our hypothesis. Specifically, in Column (1), where only the individual factors and fixed effects of city and year are controlled, the result reveal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efficient of city size at the 1 % level. Moving on to Column (2), which additionally control for a set of city characteristics, the findings persistently demonstrate a robust effect indicating that larger cities significantly incentivize migrants to engage in self-employment activities. In Column (3), we replace urban population size with non-farm employment size as the measure of city size, and our results remain similar.

In Columns (4) and (5), we group self-employed migrants into urban-to-urban and rural-to-urban migrants and redo our estimations. While the coefficients associated with the urban population size exhibit varying directions, it is noteworthy that only the coefficient for the rural-to-urban migrant group achieve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the 1 % level. The differential results between urban-to-urban and rural-to-urban migrants may due to the fact that migrants engaging in self-employment activities mainly originated from rural areas. Rural-to-urban self-employed migrants account for 85.1 % of the sample in our empirical analysis. Meanwhile, statistics indicate that rural-to-urban migrants (average 9.64 years of schooling) usually have lower levels of education than urban-to-urban migrants (average 12.74 years of schooling). This educational disparity makes the former less competitive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Table 2
Probit Estimates for the Impact of City Size on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Dependent variable: Self-employed migrants				
	All migrants			Urban-to-urban migrants	Rural-to-urban migrants
	(1)	(2)	(3)	(4)	(5)
Pop	0.0006 *** (0.0002)	0.0018 *** (0.0002)		−0.0006 (0.0005)	0.0020 *** (0.0003)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ize			0.0036 *** (0.0006)		
Age	0.0326 *** (0.0004)	0.0329 *** (0.0004)	0.0329 *** (0.0004)	0.0318 *** (0.0010)	0.0332 *** (0.0004)
Age ²	−0.0386 *** (0.0005)	−0.0390 *** (0.0005)	−0.0390 *** (0.0005)	−0.0365 *** (0.0013)	−0.0394 *** (0.0005)
Male	0.0204 *** (0.0009)	0.0203 *** (0.0009)	0.0202 *** (0.0009)	0.0114 *** (0.0022)	0.0208 *** (0.0010)
Married	0.1406 *** (0.0012)	0.1388 *** (0.0012)	0.1387 *** (0.0012)	0.1015 *** (0.0029)	0.1491 *** (0.0013)
Urban hukou	0.0632 *** (0.0014)	0.0645 *** (0.0014)	0.0646 *** (0.0014)		
Educational attainment	−0.0170 *** (0.0002)	−0.0167 *** (0.0002)	−0.0167 *** (0.0002)	−0.0340 *** (0.0004)	−0.0127 *** (0.0002)
Years of residence	0.0097 *** (0.0001)	0.0097 *** (0.0001)	0.0098 *** (0.0001)	0.0056 *** (0.0003)	0.0105 *** (0.0001)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0.0443 *** (0.0012)	−0.0449 *** (0.0013)	−0.0336 *** (0.0030)	−0.0459 *** (0.0013)
Industrial structure		0.1314 *** (0.0092)	0.1412 *** (0.0089)	0.0424 * (0.0218)	0.1463 *** (0.0101)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0.0098 *** (0.0012)	−0.0093 *** (0.0012)	−0.0165 *** (0.0027)	−0.0071 *** (0.0013)
Unemployment rate		0.0015 *** (0.0004)	0.0017 *** (0.0004)	0.0038 *** (0.0010)	0.0009 * (0.0004)
City fixed effects	✓	✓	✓	✓	✓
Year fixed effects	✓	✓	✓	✓	✓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0.002 ***	
Observations	990,951	990,951	990,921	147,766	843,185

Note: Reported results are average marginal effects of Probit models.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by cities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The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is used to test for differences in the coefficients of city size between migrants moving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and those migrating within urban areas.

reduces their chances for obtaining salaried employment. The ratio of self-employment among urban-to-urban migrants is less than 31 %, and almost 42 % for rural-to-urban migrants (see Fig. 1). Furthermore, as indicated by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in Table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efficients of city size for rural-to-urban and urban-to-urban migrants.

Regarding control variables, our results are in line with those of previous studies (Wu et al., 2018; Wei et al., 2019; Zhang, 2020; Xin and Chen, 202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self-employment. Male and married migrants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being self-employed than their female and unmarried counterparts. Also, we find tha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while the years of residenc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behaviors. Finally,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higher unemployment rates can encourage migrants to engage in self-employment activities.

4.2. Robustness checks

We confirm the robustness of our results by three different approaches. Initially, adhering to the methodologies prevalent in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e.g., Xiang et al., 2021; Rajkhowa & Qaim, 2022), we utilize the Logit and LPM models as alternative approach for estimation. Table 3 present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In short, these findings are qualitatively similar to our main Probit estimation results in Table 2.

Second, as Van Praag et al. (2013)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formal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s' income relative to the salaried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clude that the inclusion of high-skilled professionals such as medical doctors and lawyers might exaggerate entrepreneurial returns, in the robustness check, we exclude professionals (e.g., leaders of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firms, skilled professionals, public servants and other office clerks) from our analytical sample and re-estimate our main models (Cheng &

Table 3

Robustness Check I: Logit and LPM Estimates for the Impact of City Size on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Dependent variable: Self-employed migrants					
	All migrants		Urban-to-urban migrants		Rural-to-urban migrants	
	Logit	LPM	Logit	LPM	Logit	LPM
	(1)	(2)	(3)	(4)	(5)	(6)
Pop	0.0087 * ** (0.0013)	0.0017 * ** (0.0003)	−0.0003 (0.0006)	−0.0006 (0.0006)	0.0019 * ** (0.0003)	0.0019 * ** (0.0003)
Other controls	✓	✓	✓	✓	✓	✓
City fixed effects	✓	✓	✓	✓	✓	✓
Year fixed effects	✓	✓	✓	✓	✓	✓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0.007 * **			
Observations	990,951		147,766		843,185	

Note: Reported results are average marginal effects of Logit and LPM models.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by cities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The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is used to test for differences in the coefficients of city size between subgroups.

Smyth, 2021). The Columns (1) - (3) in Table 4 shows that our main findings continue to hold. Similarly, since China has a few extra-large and mega cities,⁶ these cities have unique advantages that enjoy stronger agglomeration effects (Wang, 2021), or permit greater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Huang et al., 2021), and thus generally can be considered as potential outliers that may impact our empirical estimations. We therefore check the robustness of our results by excluding both types of cities from the sample. The results are shown right half of Table 4 (see Columns (4) - (6)).

Last but not the least, some may be concerned about potential endogeneity problems due to omitted variables and reverse causality. There may be unobservable factors such as personal tolerance of risks that affect both migrants' choice of self-employment and the population size in urban areas. Reverse causality is likely to be manifested in two ways. First, migrants who have self-employment intentions may have strong incentives to migrate permanently in order to obtain more self-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return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size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Second, increasing number of self-employed migrants creates more job opportunities, and therefore attracts more individuals (including migrants) to cities, leading to an increase in the urban population. Hence, we utilize an IV method to address the potential endogeneity concerns and check the robustness of our results.

Prior studies have frequently used historical data on urban population size as an instrument for urban population size (e.g., De La Roca & Puga, 2017). Since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urban system followed an approximately parallel-growth pattern from 1949 to 2008 (Wang & Zhu, 2013; Chen et al., 2013), it is reasonable to believe that the historical urban population size can be a plausible predictor of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ize (Xing & Zhang, 2017). After considering the availability and consistency of the statistical data, we chose the urban population size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national census in 1953 and 1964 as the instruments, respectively.⁷ These instruments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urban population size in 2015 with a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758 and 0.736 in our sample,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we argue that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are significantly from the current context, rendering it challenging for them to exert direct impact on the today's outcome. This concurs with the exogeneity criterion of a valid IV. It is crucial to underscore that, akin to any IV, the second condition is an assumption that cannot be empirically validated.

In addition, aligning with the methodology employed by Xu et al. (2022), we have introduced the presence of a railway connection in 1933 for each city as an additional IV.⁸ Theoretically, railway construction is known to significantly foster the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suggesting that cities with railway access by 1933 may now boast larger population sizes. Meanwhile, the establishment and siting of these railways prior to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re heavily impacted by the techn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context of the era. Given the substantial historical and socio-economic shifts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he early presence of railways is also unlikely to exert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self-employment activities of today's migrant population. All in all, we believe these instrument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elevance and exogeneity.

Table 5 reports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V analysis. Columns (1), (4) and (7) uses the All sample, while Columns (2) - (3), (5) - (6) and (8) - (9) divide migrants into two groups – urban-to-urban and rural-to-urban migrants, respectively.⁹ The first-stage estimates

⁶ Extra-large cities are defined as cities with a permanent population of 5–10 million in municipal districts and mega cities have a permanent population of over 10 million in municipal districts, according to the city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State Council, 2014).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we identify 18 extra-large and mega cities (in descending order of population size): Shanghai, Beijing, Chongqing, Tianjin, Guangzhou, Shenzhen, Chengdu, Dongguan, Nanjing, Wuhan, Xi'an, Foshan, Hangzhou, Shenyang, Hohhot, Suzhou, Zhengzhou, and Shantou.

⁷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reviewer, we opted for time-vary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Specifically, inspired by the methodology of Nunn and Qian (2014), our study created interaction terms for the population sizes of each city in 1953 and 1964 with the national average population size of municipal districts from the preceding year (time-related), employing these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for the urban population size.

⁸ To ascertain the railway connectivity status of each sample city in 1933, we primarily referenced the operational maps found in 'The China Railway Overview' and 'The History of Transport in China'. Ou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283 cities within the sample had railways running through them at that time.

⁹ Due to the tremendous change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in the last 70 years, there are significantly fewer valid observations in the IV estimates than that in the baseline estimates.

Table 4

Robustness Check II: Excluding Professionals or Extra-Large and Mega Cities in the Sample.

	Dependent variable: Self-employed migrants					
	Excluding professionals			Excluding extra-large and mega cities		
	All migrants	Urban-to-urban migrants	Rural-to-urban migrants	All migrants	Urban-to-urban migrants	Rural-to-urban migrants
	(1)	(2)	(3)	(4)	(5)	(6)
Pop	0.0016 *** (0.0003)	−0.0006 (0.0007)	0.0018 *** (0.0003)	0.0027 *** (0.0004)	0.0010 (0.0011)	0.0023 *** (0.0005)
Other controls	✓	✓	✓	✓	✓	✓
City fixed effects	✓	✓	✓	✓	✓	✓
Year fixed effects	✓	✓	✓	✓	✓	✓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0.003 ***		0.002 **		
Observations	888,844	109,081	779,763	722,924	96,569	626,355

Note: Reported results are average marginal effects of Probit models.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by cities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The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is used to test for differences in the coefficients of city size between subgroups.

demonstrate that the coefficients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size in 1953 (1964) and railways in the city in 1933 are posi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dicating that the instruments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current urban population size.¹⁰ As shown in Columns (1), (4) and (7), we continue to find support for our hypothesis that urban population siz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migrants' choice of self-employment. Columns (2) and (3), (5) and (6) as well as Columns (8) and (9), present results for migrant subgroups, which broadly align with the findings outlined in Table 2.

5. Further discussion

The above sections concentrate on the overall effect of city size on the likelihood of being self-employed among migrants. Next, we will further discuss the two potenti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ize of cities might affect the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behavior, and the disparities in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elf-employment.

5.1. Mechanism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ection 2, we first argue that larger cities have unique advantages by exploiting market accessibility. To quantify demand effects, our study has constructed a continuous variable referred to as the market potential of a city. Based on the estimation in Eq. (6) and as shown in Column (1) of Table 6,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as the population size of a city increases, the market potential tends to ascend. In Column (2), the coefficient on market potential is both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while the magnitude of the coefficient on city size is low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point estimates in Column (2) of Table 2. Therefore,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higher market potential serves as a mediator in the link between large cities and the decision to pursue self-employment among Chinese migrants. To further verify the market potential mechanism, we have employed an indirect method by integrating an interaction term of city size with the mediator within our model. The findings in Column (3) indicate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ity size on the self-employment activities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tends to decrease in regions with higher market potential.

Moreover, the another potential mechanism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is the level of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In our earlier theoretical analyses, we pointed out that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can result in greater self-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r higher returns. The findings from the mediation analysis are presented in the final three columns of Table 6. In particular, Column (4) suggests a positive effect of urban population size on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Looking at Column (5), we observe that not only is the coefficient for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significantly positive, but also the coefficient for urban population size is lower compared to the point estimates in Table 2. Consistent with the outcomes observed in Column (3), the analysis in Column (6) also indirect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city size on self-employment diminishes in region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er degree of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Overall,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provides an additional channel through which urban expansion impacts migrants' choices regarding self-employment.

¹⁰ Before we add IV, we usually need to discuss the endogenous issues in the baseline model and prove its effectiveness through a series of IV tests. First, based on the Durbin-Wu-Hausman test, we obtain the p -value of the endogenous test, which is < 0.000 . The null hypothesis that all independent variables are exogenous variables is thus rejected at the 1% significance level. In other words, the model has an endogenous problem. Second, the results based on the weak IV test show that the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is high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critical value with the tolerance of 10% provided by Stock and Yogo (2005), which means that there is no weak IV in our model.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identifiable test results of IV, the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also rejects the null hypothesis that the IV are not identifiable at the 1% level. We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the estimated IV results are reliable.

Table 5

Robustness Check III: IV-Probit Estimates for the Impact of City Size on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All migrants	Urban-to-urban migrants	Rural-to-urban migrants	All migrants	Urban-to-urban migrants	Rural-to-urban migrants	All migrants	Urban-to-urban migrants	Rural-to-urban migrants
	(1)	(2)	(3)	(4)	(5)	(6)	(7)	(8)	(9)
First-stage									
1953 Pop * Average trend	1.8412 * ** (0.0042)	1.7991 * ** (0.0116)	1.8535 * ** (0.0045)						
1964 Pop* Average trend				1.0718 * ** (0.0025)	1.1130 * ** (0.0069)	1.0691 * ** (0.0027)			
Railway 1933							0.0248 * ** (0.0017)	0.9503 * ** (0.0048)	1.2664 * ** (0.0154)
Second-stage									
Pop	0.0057 * ** (0.0007)	-0.0006 (0.0016)	0.0072 * ** (0.0008)	0.0028 * ** (0.0007)	-0.0024 (0.0016)	0.0061 * ** (0.0008)	0.0231 * ** (0.0015)	0.0078 * * (0.0032)	0.0248 * ** (0.0017)
Other controls	✓	✓	✓	✓	✓	✓	✓	✓	✓
City fixed effects	✓	✓	✓	✓	✓	✓	✓	✓	✓
Year fixed effects	✓	✓	✓	✓	✓	✓	✓	✓	✓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0.010 * **			0.009 * **			0.012 * **	
Observations	766,950	114,251	652,699	747,994	113,739	634,255	987,548	147,487	840,061
Weak IV test	1.9e+ 05 < 16.38 >	2.4e+ 04 < 16.38 >	1.7e+ 05 < 16.38 >	2.0e+ 05 < 16.38 >	2.8e+ 04 < 16.38 >	1.8e+ 05 < 16.38 >	3.9e+ 04 < 16.38 >	6727.638 < 16.38 >	3.2e+ 04 < 16.38 >
IV identification test	9.3e+ 04 [0.000]	1.2e+ 04 [0.000]	8.1e+ 04 [0.000]	9.0e+ 04 [0.000]	1.3e+ 04 [0.000]	7.6e+ 04 [0.000]	3.7e+ 04 [0.000]	5980.126 [0.000]	3.0e+ 04 [0.000]

Note: Reported results are average marginal effects of IV-Probit models.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by cities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The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is used to test for differences in the coefficients of city size between subgroups.

Table 6
Mechanism Exploration.

	Market potential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1)	(2)	(3)	(4)	(5)	(6)
Dependent variable:	In(MP)	Self-employed migrants	Self-employed migrants	Diversified	Self-employed migrants	Self-employed migrants
Pop	0.1099 * ** (0.0003)	0.0017 * ** (0.0003)	−0.0239 * ** (0.0021)	0.0029 * ** (0.0000)	0.0005 * ** (0.0003)	0.0141 * ** (0.0016)
In(MP)		0.0093 * ** (0.0013)	0.0074 * ** (0.0013)			
Pop * In(MP)			−0.0029 * ** (0.0002)			
Diversified					0.2265 * ** (0.0091)	0.2891 * ** (0.0117)
Pop * Diversified						−0.0162 * ** (0.0019)
Other controls	✓	✓		✓	✓	
City fixed effects	✓	✓		✓	✓	
Year fixed effects	✓	✓		✓	✓	
Observations	885,145	885,145		798,720	798,720	

Note: Reported results are average marginal effects of Probit models.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by cities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5.2. Heterogeneous effects across different forms of self-employment

We further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forms of self-employment – an “employer” with paid employees and an “own-account worker” who works on his/her own (without any employees). Specifically, we believe the motivations for engaging in these two types of self-employment activities are quite different, because own-account workers are often vulnerable in the job market and thus self-employment may be a passive choice in the absence of formal or satisfactory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ei et al., 2019). However, self-employment in the form of “employer” generally aims to capture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 obtain a higher income or nonpecuniary benefits (Larsson & Thulin, 2019; Hu et al., 2022). Therefore, we explore the potential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city size on different forms of self-employment among migrants. Table 7 shows the effect of urban population size on self-employment types of own-account worker and employer for all migrants, urban-to-urban migrants and rural-to-urban migrants, respectively. Columns (1), (3) and (5) use the own-account worker’s choice of self-employment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hile Columns (2), (4) and (6) use employer’s choice of self-employment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e find that the impact of urban population size varies between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with and without employe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population size and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is onl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or own-account workers regardless of their migration origins. By contrast, for the self-employed with employees, the coefficients of urban population size take on mixed signs and do not achieve conventional level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re are potential explanations for these empirical patterns. Since most migrants, particularly those from rural areas, have relatively low levels of human capital, it is often difficult for them to secure a satisfactory salaried job. The relatively low entry barriers for own-account workers, coupled with the growing market potential and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resulting from the ongoing expansion of cities, render this type of work an attractive option for migrants. However, urban population size may not contribute to the type of employers with paid employees for two reasons. First, individuals who become employers themselves are likely to be competitive in the job market and have sufficient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ir choice of self-employment is mainly driven by strong motivations to pursue higher income or non-monetary utilities (Larsson & Thulin, 2019). There, urban population size may not be a decisive factor for those migrants to overcome the opportunity costs in the job market and hence choose to be self-employed.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employer-type self-employment has relatively high entry barriers such as the requirement for a certain level of accumulative assets, management skills in a related field, and enthusiasm (Djankov et al., 2006). Those strict requirements are likely to deter migrants from being employers with paid employees, even as cities expand.

6. Conclusion

To date, much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focused on the favorable factors of self-employment behaviors from the family’s and individual’s perspective, little is known about whether larger cities als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migrant’s choice of self-employment. Using a combination of 2011–2018 CMDs survey data and macro statistics covering 28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all else being equal, larger citi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migrants opting for self-employment over wage employment. These findings remain robust across various checks employing alternative estimation methods, sample screening techniques, and addressing endogeneity concerns. We delve deeper into the plausibl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city size affects the probability of becoming a self-employed as opposed to a salaried worker, and conclude that market potential and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are the primary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larger cities facilitate self-employment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grants’ origins, we confirm that the encouragement of self-employment flows disproportionately to rural migrants. Similarly, with respect to the

Table 7
Heterogeneous Effects.

	Dependent variable: Self-employed migrants					
	All migrants		Urban-to-urban migrants		Rural-to-urban migrants	
	Own-account worker	Employer	Own-account worker	Employer	Own-account worker	Employer
	(1)	(2)	(3)	(4)	(5)	(6)
Pop	0.0014 * ** (0.0002)	0.0003 (0.0002)	−0.0005 (0.0004)	−0.0001 (0.0004)	0.0016 * ** (0.0003)	0.0004 (0.0003)
Other controls	✓	✓	✓	✓	✓	✓
City fixed effects	✓	✓	✓	✓	✓	✓
Year fixed effects	✓	✓	✓	✓	✓	✓
Observations	990,951	990,951	147,766	147,766	843,185	843,185

Note: Reported results are average marginal effects of Probit models.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by cities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difference between own-account worker and employer with paid employees, we have also found that only the former would be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city expansion.

In practice, there is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e economies of scale in cities, resulting in the tendency to overlook the beneficial impacts of city expansion. Our study has at least two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tudies and regional policy makers. First, given our evidence that city expansion increases self-employment, with the majority of self-employed migrants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catering, housekeeping and cleaning industries (almost 75 % of the total sample). Consequently, we advocate for a deeper reduction in the *hukou* threshold to facilitate a more rational flow of labor force, thereby reducing the cost of living in larger cities and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migrants and local residents. In recent years, most cities had partially lifted *hukou* restrictions,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migration to medium- and small-sized citie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strict restrictions on migration to large, extra-large and mega cities. Second, considering that the governments of all levels have long advocate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different types of migrants. For instance, although own-account employment cannot directly drive growth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stage, i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Undoubtedly, this research has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s. On the one hand, we lacked longitudinal data with which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impact of city size on migrants' self-employment behaviors, future research can thus further test our hypotheses using panel data.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city size creates more self-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migrants, whether their engagement in self-employment activit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other factors, such as perceptions of citizenship in destination cities, is unknown. Future studies should explore these issues using more detailed micro-level information to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with which to formulate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Funding

National Planning Offic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2ZDA049); Guandong Offic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GD24YSH01).

CRediT authorship contribution statement

Ge Xin: Writing – review & editing, Writing – original draft, Validation, Methodology, Formal analysis. **Fangjin Ye:** Validation, Software, Project administration. **Haoyu Hu:** Writing – review & editing, Writing – original draft, Methodology, Investigation, Formal analysis, Conceptualization. **Wei Wang:** Supervision, Resources, Project administration, Funding acquisition, Conceptualization.

Declaration of Competing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that they have no known competing financial interests o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at could have appeared to influence the work reported in this paper.

Data Availability

Data will be made available on request.

Acknowledgements

The authors are deeply grateful to the editor and the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valuable insights and constructive comments.

Appendix

Table A1

The list of all cities.

Provinces	Cities
Beijing	Beijing
Tianjin	Tianjin
Hebei	Shijiazhuang, Tangshan, Qinhuangdao, Handan, Xingtai, Baoding, Zhangjiakou, Chengde, Cangzhou, Langfang, Hengshui
Shanxi	Taiyuan, Datong, Yangquan, Changzhi, Jincheng, Shuozhou, Jinzhong, Yuncheng, Xinzhou, Linfen, Lvliang
Inner Mongolia	Hohhot, Baotou, Wuhai, Chifeng, Tongliao, Erdos, Hulunbuir, Bayannur, Ulanqab
Liaoning	Shenyang, Dalian, Anshan, Fushun, Benxi, Dandong, Jinzhou, Yingkou, Fuxin, Panjin, Liaoyang, Tieling, Chaoyang, Huludao
Jilin	Changchun, Jilin, Siping, Liaoyuan, Tonghua, Baishan, Songyuan, Baicheng
Heilongjiang	Harbin, Qiqihar, Jixi, Hegang, Shuangyashan, Daqing, Yichun, Jiamusi, Qitaihe, Heihe, Mudanjiang, Suihua
Shanghai	Shanghai
Jiangsu	Nanjing, Wuxi, Xuzhou, Changzhou, Suzhou, Nantong, Lianyungang, Huai'an, Suqian, Yancheng, Yangzhou, Zhenjiang, Taizhou,
Zhejiang	Hangzhou, Ningbo, Wenzhou, Jiaxing, Huzhou, Shaoxing, Jinhua, Quzhou, Zhoushan, Taizhou, Lishui
Anhui	Hefei, Chaoahu, Wuhu, Bengbu, Huainan, Maanshan, Huaibei, Tongling, Anqing, Lu'an, Huangshan, Chuzhou, Fuyang, Suzhou, Bozhou, Chizhou, Xuancheng
Fujian	Fuzhou, Xiamen, Putian, Sanming, Quanzhou, Zhangzhou, Nanping, Longyan, Ningde
Jiangxi	Nanchang, Jingdezhen, Pingxiang, Jiujiang, Xinyu, Yingtan, Ganzhou, Ji'an, Yichun, Fuzhou, Shangrao
Shandong	Jinan, Qingdao, Zibo, Zaozhuang, Dongying, Yantai, Weifang, Jining, Tai'an, Weihai, Rizhao, Laiwu, Linyi, Dezhou, Liaocheng, Binzhou, Heze
Henan	Zhengzhou, Kaifeng, Luoyang, Pingdingshan, Anyang, Hebi, Xinxiang, Jiaozuo, Luohe, Puyang, Xuchang, Sanmenxia, Nanyang, Shangqiu, Xinyang, Zhoukou, Zhumadian,
Hubei	Wuhan, Huangshi, Shiyan, Yichang, Xiangyang, Ezhou, Jingmen, Xiaogan, Jingzhou, Huanggang, Xianning, Suizhou
Hunan	Changsha, Zhuzhou, Xiangtan, Hengyang, Shaoyang, Yueyang, Changde, Zhangjiajie, Yiyang, Chenzhou, Yongzhou, Huaihua, Loudi
Guangdong	Guangzhou, Shaoguan, Shenzhen, Zhuhai, Shantou, Foshan, Jiangmen, Zhanjiang, Maoming, Zhaoqing, Huizhou, Meizhou, Shanwei, Heyuan, Yangjiang, Qingyuan, Zhongshan, Chaozhou, Jieyang, Yunfu
Guangxi	Nanning, Liuzhou, Guilin, Wuzhou, Beihai, Fangchenggang, Qinzhou, Guigang, Yulin, Baise, Hezhou, Hechi, Laibin, Chongzuo
Hainan	Haikou, Sanya
Chongqing	Chongqing
Sichuan	Chengdu, Zigong, Panzhihua, Luzhou, Deyang, Mianyang, Guangyuan, Suining, Ya'an, Neijiang, Leshan, Nanchong, Meishan, Yibin, Guang'an, Dazhou, Bazhong, Ziyang
Guizhou	Guiyang, Liupanshui, Zunyi, Anshun
Yunnan	Kunming, Qujing, Yuxi, Baoshan, Zhaotong, Lijiang, Lincang
Shaanxi	Xi'an, Tongchuan, Baoji, Xianyang, Weinan, Yan'an, Hanzhong, Yulin, Ankang, Shangluo
Gansu	Lanzhou, Jiayuguan, Jinchang, Baiyin, Tianshui, Wuwei, Zhangye, Pingliang, Jiuquan, Qingyang, Dingxi, Longnan
Qinghai	Xining
Ningxia	Yinchuan, Shizuishan, Wuzhong, Guyuan, Zhongwei
Xinjiang	Urumqi, Karamay

References

- Acs, Z. J., & Sanders, M. W. J. L. (2013). Knowledge spillover entrepreneurship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1(4), 775–795.
- Alesina, A., & Zhuravskaya, E. (2011). Segreg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5), 1872–1911.
- Au, C. C., & Henderson, J. V. (2006).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3(3), 549–576.
- Blanchflower, D. G., & Oswald, A. J. (1998). What makes an entrepreneu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6(1), 26–60.
- Boeri, T., Giupponi, G., Krueger, A. B., & Machin, S. (2020). Solo self-employment and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A cross-country perspective on the changing composition of job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4(1), 170–195.
- Cao, G. Z., Li, M., Ma, Y., & Tao, R. (2015). Self-employment and intention of permanent urban settlement: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migrants in China's four major urbanising areas. *Urban Studies*, 52(4), 639–664.
- Carlsen, F., & Leknes, S. (2022). For whom are cities good places to live? *Regional Studies*, 56(12), 2177–2190.
- Carree, M., Congregado, E., Golpe, A., & van Stel, A. (2015). Self-Employment and job generation in metropolitan areas, 1969–2009.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7(3–4), 181–201.
- Chen, J., Davis, D. S., Wu, K., & Dai, H. (2015). Life satisfaction in urbanizing China: The effect of city size and pathways to urban residency. *Cities*, 49, 88–97.
- Chen, Z., Fu, S., & Zhang, D. (2013). Searching for the parallel growth of cities in China. *Urban Studies*, 50(10), 2118–2135.
- Chen, B. K., Liu, D., & Lu, M. (2018). City size, migration and urban inequali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51, 42–58.
- Cheng, Z., & Smyth, R. (2021). Education and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88, 506–529.
- Cipriks, K., Cassells, D., & Berrill, J. (2023). Transgender self-employment outcomes: Evidence from the USA.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 Da Mata, D., Deichmann, U., Henderson, J. V., Lall, S. V., & Wang, H. G. (2007). Determinants of city growth in Brazil.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2(2), 252–272.
- De La Roca, J., & Puga, D. (2017). Learning by working in big citi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4(1), 106–142.
- Di Addario, S., & Vuri, D. (2010). Entrepreneurship and market size: The case of young college graduates in Italy. *Labour Economics*, 17(5), 848–858.
- Djankov, S., Qian, Y. Y., Roland, G., & Zhuravskaya, E. (2006). Who are China's entrepreneu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 348–352.
- Du, H. M., Li, S. M., & Hao, P. (2018). 'Anyway, you are an outsider': Temporary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Urban Studies*, 55(14), 3185–3201.
- Feng, Y., & Ren, J. (2023). Skill bias, financial frictions, and selection into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62, Article 103046.
- Frankish, J. S., Roberts, R. G., Coad, A., & Storey, D. J. (2014). Is entrepreneurship a route out of deprivation? *Regional Studies*, 48(6), 1090–1107.
- Ghani, E., Kerr, W. R., & O'Connell, S. D. (2013).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 India.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3(6), 929–964.
- Glaeser, E. L., Rosenthal, S. S., & Strange, W. C. (2010). Urban economics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7(1), 1–14.

- Gomez, C., Perera, B. Y., & Engelhardt, L. M. (2024). The distinct nature of us based femal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36(3–4), 312–340.
- Hanson, G. H. (2005). Market potential, increasing returns and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7(1), 1–24.
- Harris, C. D. (1954). The market as a factor in the localization of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44(4), 315–348.
- Hoang, M. C., & Schiller, D. (2023). Which firms benefit the most from agglomeration? New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country with consistent measure of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86, Article 101620.
- Hu, H., Wang, W., & Ye, F. (2022). Tracking the role of self-employment on perceptions of citizenship: Evidence from 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8(8), Article e2576.
- Hu, D. B., Zhai, C. Z., & Yan, Z. (2023). Do social interactions foster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online and offline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79, Article 101965.
- Huang, D., He, H., & Liu, T. (2021). City size and employment dynamic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recruitment website dat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31(12), 1737–1756.
- Huang, J., & Xin, G. (2022). To get rich is glorious: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anti-poverty campaig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7(2), 271–294.
- Huang, G., Xue, D., Guo, Y., & Wang, C. (2020). Constrained voluntary informalisation: Analysing motivations of self-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in an urban village, Guangzhou. *Cities*, 105, Article 102760.
- Jacobs, J. (1969). *The economy of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 Jonsson, S., & Ouyang, Q. L. (2023). Effects of cultural origin on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16, 308–319.
- Kamayashi, R., & Kato, T. (2017). Long-term employment and job security over the past 25 yea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LR Review*, 70(2), 359–394.
- Keeler, Z. T., & Stephens, H. M. (2023). What matters for lagging regions? The role of self-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diversity in distressed areas. *Growth and Change*, 54(4), 962–1001.
- Kim, E., Hewings, G., & Nam, K. M. (2014). Optimal urban population size: National vs local economic efficiency. *Urban Studies*, 51(2), 428–445.
- Larsson, J. P., & Thulin, P. (2019). Independent by necessity?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necessity and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 in 70 countri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3(4), 921–934.
- Li, M. H., & Goetz, S. J. (2019). The 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self-employment across China's planned economy era.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7(4), 1301–1330.
- Li, J., & Rose, N. (2017). Urban social exclusion and mental health of China's rural-urban migrants - A review and call for research. *Health & Place*, 48, 20–30.
- Li, W. C., & Tong, D. (2023). The benefits of having an entrepreneur-mother: Influence of mother's entrepreneurial status o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mong children.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8(6), Article 106329.
- Li, L. X., & Wu, X. Y. (2018). Number of siblings, credit constraint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4(7), 1253–1273.
- Liu, T., & Wang, J. (2020). Bringing city size in understanding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6(4), Article e2295.
- Liu, G., Xin, G., & Li, J. (2021). Making political connection work better: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firms in China.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9(6), 593–611.
- Liu, C. Y., Ye, L., & Feng, B. (2019).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ntrepreneurial tran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2(3), 681–696.
- Lu, Y., Ni, J., Tao, Z. G., & Yu, L. H. (2013). City-industry growth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7, 135–147.
- Lukes, M., Feldmann, M., & Vegetti, F. (2019). Work values and the value of work: Different implications for young adults' self-employment in Europ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82(1), 156–171.
- Luo, S. Y., Yimamu, N., Li, Y. R., Wu, H. T., Irfan, M., & Hao, Y. (2023). Dig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 could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mprove green innovation in China?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32(4), 1847–1871.
- Ma, S., Wu, X., & Gan, L. (2019). Credit accessibility, institutional deficiency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54, 160–175.
- Ma, M. L., Zhao, W. S., Wan, G. X., Deng, T. T., & Yang, Y. (2023). Specialization versus diversity: The role of city size in tourist cities. *Tourism Economics*, 29(8), 2081–2102.
- Marshall, A. (192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 Nie, P., & Sousa-Poza, A. (2018). Commute ti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urba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48, 188–204.
- Ning, G. J., & Qi, W. (2017). Can self-employment activity contribute to ascension to urban citizenship? Evidence from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45, 219–231.
- Nunn, N., & Qian, N. (2014). 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6), 1630–1666.
- Omar, F., Levanon, A., & Waismel-Manor, R. (2023). The causal effect of type of employment on work-family conflict.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70(2), 713–730.
- Pan, L., Mukhopadhyaya, P., & Li, J. (2019). The changing texture of the city-size wage differential in Chinese cities - Effects of skill and identity. *China Economic Review*, 53, 191–210.
- Pan, F. H., & Yang, B. F. (2019).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geographies of startup cities: Evidence from China.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2(3), 743–758.
- Pokharel, R., Bertolini, L., Te Brömmelstroot, M., & Acharya, S. R. (2021).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iti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epal: Does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matter?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90, Article 102904.
- Qiu, L. J., Zhong, S. B., & Sun, B. W. (2021). Blessing or curse? The effect of broadband internet on China's inter-city income inequality.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72, 626–650.
- Quigley, J. M. (1998). Urban divers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2), 127–138.
- Rajkhowa, P., & Qaim, M. (2022). Mobile phones, off-farm employment and household income in rural Indi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3(3), 789–805.
- Redding, S. J. (2013). Economic geography: A review of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In D. Bernhofen, R. Falvey, D. Greenaway, & U. Kreickemeier (Eds.), *Palgrav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Rosenthal, S. S., & Strange, W. C. (2008). The attenuation of human capital spillover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4(2), 373–389.
- Sato, Y., Tabuchi, T., & Yamamoto, K. (2012). Market size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2(6), 1139–1166.
- Schmalz, M. C., Sraer, D. A., & Thesmar, D. (2017). Housing collateral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Finance*, 72(1), 99–132.
- Shen, J., Chen, C. L., Yang, M. Y., & Zhang, K. Y. (2019). City size,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7(1), 110–131.
- Stephens, H. M., Partridge, M. D., & Faggian, A. (2013).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gging region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3(5), 778–812.
- Stock, J. H., & Yogo, M. (2005). Asymptotic distribution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statistics with many weak instruments. In W. Donald, K. Andrews, & J. H. Stock (Eds.), *Identification and inference for econometric models: Essays in honor of Thomas Rothenber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Praag, M., van Witteloostuijn, A., & van der Sluis, J. (2013). The higher returns to formal education for entrepreneurs versus employe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0(2), 375–396.
- Wang, W. (2021). The heterogeneity of agglomeration effect: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Growth and Change*, 52(1), 392–424.
- Wang, J., Yang, Z. Q., & Qian, X. P. (2020).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shrinkage: Examining the role of local industrial diversity. *Cities*, 99, Article 102646.
- Wang, Z. P., & Zhu, J. N. (2013). Evolution of China's city-size distribu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1949 to 2008. *Chinese Economy*, 46(1), 38–54.
- Wei, X. H., Jiao, Y., & Growe, G. (2019). Language skills and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China.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3(4), 981–999.
- Wu, C., Fu, Q., Gu, J. X., & Shi, Z. L. (2018). Does migration pay off? Returnees, family background, and self-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 *China Review*, 18(1), 59–77.
- Xiang, J., Liu, C., & Li, Y. (2021).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real estate and self-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Modelling*, 94, 873–884.
- Xin, Ge., & Chen, J. (2023).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responses to COVID-19 in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43(2), 163–175.

- Xin, G., & Huang, J. (2024). Making the people's voice heard: pathways of E-participa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https://doi.org/10.1080/23812346.2024.2400634>
- Xing, C., & Zhang, J. (2017). The preference for larger citie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rural-urban migrants. *China Economic Review*, 43, 72–90.
- Xu, M., Tan, R., & He, X. (2022). How does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ffect energy efficienc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endogenous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Energy Economics*, 108, Article 105901.
- Yang, X. L., Hong, X. Y., & Li, W. C. (2023). “Only childre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Spillover effects and mechanisms.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79, Article 101994.
- Yin, Z. C., Gong, X., Guo, P. Y., & Wu, T. (2019). What drives entrepreneurship in digital economy?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Modelling*, 82, 66–73.
- Zelinsky, T., Hudec, O., Mojsejova, A., & Hricova, S. (2021). The effects of population dens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ase-study of Slovakia.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78, Article 101061.
- Zhang, C. (2020). Skill diversity of cities and entrepreneurship. *Regional Studies*, 54(3), 403–414.
- Zhang, C. (2020). Clans,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8(1), 100–123.
- Zhang, P., Wei, X., & Mao, G. R. (2024). Cultural diversity,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62(3), 1135–1155.
- Zheng, S. Q., & Du, R. (2020). How does urban agglomeration integration promote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vidence from regional human capital spillovers and market integration. *Cities*, 97, Article 102529.
- Zheng, L., & Zhao, Z. (2017). What drives spatial cluster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vidence from economic census data. *China Economic Review*, 46, 229–248.
- Zhou, M., & Guo, W. (2020).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having a second child am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home ownership.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6(2), Article e2289.
- Zhou, G., & Liu, L. (2024). The effect of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on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China. *World Economy*, 47(6), 2264–2286.
- Zhu, C., Lee, C. C., Hong, J., & Shi, X. (2023). Multidimensional cultural distance and self-employment of internal migran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86, 58–81.
- Zhu, C., Shen, J. H., Lee, C. C., & Liu, S. Y. (2022). Does religion belief matter to self-employment of rural elderl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83, Article 101548.
- Zou, J., & Deng, X. J. (2023).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xplanation from human capital and risk aversion. *Habitat International*, 137, Article 102852.

CRA

证书编号: CRABKGS2505251512

荣誉证书

华南农业大学 的参赛作品《**剧力深耕银发场：基于一线与新一线城市老年人情感需求及微短剧市场发展现状研究**》在中国商业统计学会主办的“正大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本科组总决赛”中，荣获 **三等奖**。

团队学生成员：许景焜、李欣彤、雷骐通、王培豪、王润涛

指导教师：**胡浩钰**、何凯、刘思蓓

颁发机构：



颁发日期：

2025 年 5 月 26 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领导批示办理表

紧急程度: 密级: 收文编号: 信 202500716

来文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收文日期	2025-12-11	办文编号	信息〔2025〕520号
来文标题	关于以电竞产业为新引擎推动我省“赛事经济—城市消费”融合发展的建议				
批示内容:					
办理意见: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办理表

文件呈阅

紧急程度: 密级: 收文编号: 信 202500711

来文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收文日期	2025-12-10	办文编号	信息〔2025〕514号
来文标题	关于以电竞产业为新引擎推动我省“赛事经济-城市消费”融合发展的建议				
领导批示:					
审核意见:					
办理意见: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领导批示办理表

紧急程度：密级：收文编号：信 202500726

来文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收文日期	2025-12-15	办文编号	信息〔2025〕529号
来文标题	关于以电竞产业为新引擎推动我省“赛事经济—城市消费”融合发展的建议				
批示内容：					
办理意见：					



少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办理表

文件呈阅

紧急程度: 密级: 收文编号: 信 202500711

来文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收文日期	2025-12-10	办文编号	信息〔2025〕514号
来文标题	关于以电竞产业为新引擎推动我省“赛事经济-城市消费”融合发展的建议				
领导批示:					
审核意见:					
办理意见:					

华南农业大学信息

(咨政建言)

〔 2025 〕 第 133 期

党政办公室、研究室、科学研究院

2025 年 12 月 6 日

关于以电竞产业为新引擎推动我省“赛事经济—城市消费”融合发展的建议

一、国际成熟电竞发展模式与城市经济联动机制

（一）美国以“市场主导、赛旅商融合”为引擎推动电竞产业高度商业化。据测算，电竞产业每年为美国 GDP 贡献超 50 亿美元，提供逾 10 万个就业岗位。产业以市场主导、联赛运营为核心，动视暴雪推出城市主场制联赛，如守望先锋联赛采用城市特许经营和“主客场”赛制，叠加 NBA、NFL 等传统体育资本入局，促使电竞加速融入主流体育生态。同期涌现的专业电竞场馆，如拉斯维加斯卢克索酒店改建的 HyperX 电竞馆，与购物中心深度融合，形成“赛事+商业”复合空间。总体来看，美国依托职业联赛体系、专业场馆和高度市场化运作，将电竞与旅游、商业深度嵌合，大型赛事持续带来客流和旅游收入，赛事 IP 及衍生品延伸消费链条，推动电竞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韩国以“政府引导、全民参与”为依托实现电竞产业国家战略化。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将文化产业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大力发展游戏等内容产业，铺设宽带与网吧网络，并于 2000 年成立电竞协会，将电竞纳入体育管理体系，并配套兵役优惠等政策，为产业壮大奠定制度基础。调查显示，目前约 45% 的韩国民众将电竞作为日常爱好，赛事转播热度与传统体育相当。《英雄联盟》韩国联赛（LCK）已成为世界级 IP，每年决赛吸引大批境内外粉丝赴韩观赛，带动旅游、餐饮、零售等消费，据估算综合经济效益已超 3000 亿韩元。韩国经验表明，在政策扶持与市场运作双轮驱动下，电竞既是主流文化现象，也是拉动经济增长、塑造国家软实

力的重要抓手。

(三)新加坡以“电竞+旅游”为路径打造新兴区域产业枢纽。自 2021 年以来，新加坡连续举办 Free Fire 世邀赛等国际赛事，其中 2021 年总决赛峰值观众达 540 万。2024 年，BLAST 公司首次将 CSGO 全球总决赛落地新加坡，门票售罄；随后，新加坡旅游局与其签署合作协议，约定未来数年将举办多场世界级赛事，预计带来数千万新元的综合收益。基础设施方面，新加坡已建成东南亚首个专业电竞体验中心，全岛电竞及游戏相关企业超过 220 家，借助东南亚电竞年均逾 20% 的高增速打造区域电竞枢纽。通过“观赛+游览”一体设计，新加坡在赛事期间集中开展城市宣传与文化推广，带动航空、酒店、餐饮、购物等消费，将电竞培育为继会展、传统体育之后的新型旅游支柱产业。

二、国内代表性城市电竞产业引领新消费模式的实践

(一)上海以主场经济为牵引构筑电竞产业全链条集聚高地。作为中国电竞产业领跑者，2024 年上海线下电竞赛事数量占全国 17.8%，位居第一；全市电竞俱乐部约 50 家，处于全国首位。依托“主场城市”战略，上海布局多座专业电竞场馆，2025 年上半年网络游戏产业收入达 832.83 亿元，其中电竞产业收入为 32.54 亿元。静安“宇宙电竞中心”集聚百余家头部企业，形成赛事运营、直播、俱乐部训练、电竞教育等完整链条，并通过最高 1000 万元场馆补贴和 500 万元赛事奖励放大集聚效应。静安体育中心办赛期间，大宁商圈销售额同比增长约 30%。

（二）成都“以赛事引流、文旅融合”为抓手打造区域数字文创新名片。作为西南数字文创中心，成都 2024 年承办线下电竞赛事数量占全国 15.3%，仅次于上海。依托《电竞产业三年行动计划》，成都引入 AG 超玩会、OMG 等俱乐部，AG 主场赛事中七成以上观众来自外省，单季直接拉动消费逾 1.5 亿元。成都推动“电竞+文旅”深度融合，在宽窄巷子打造“英雄联盟电竞小院”，并承办 DOTA2 预选赛、王者荣耀世冠杯和 2025 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在大运会期间叠加电竞嘉年华，引导赛事人流向景区、商圈延伸，塑造“年轻、可游”的城市新形象。

（三）武汉以“项目驱动、产城融合”为核心重塑华中电竞产业新地标。武汉依托斗鱼等平台重启“电竞之城”建设，在光谷规划电竞产业集聚区，启动总投资 21 亿元的“武汉光谷国际新文化电竞中心”项目，核心为专业电竞馆，2025 年建成，目标是年办赛 100 场以上、孵化 100 家企业、带动 1 万人就业、实现百亿级年收入。武汉连续主办英雄联盟嘉年华、LPL 赛事及全国颁奖盛典，并培育高校联赛、城市赛等本地 IP，在“顶级赛事+自主赛事”双轨驱动和直播平台导流下，逐步构筑“电竞+商圈+高校”的华中电竞新高地。

（四）杭州以“赛事+科创+文旅”融合构建长三角电竞产业新一极。借助 2022 年亚运会，杭州提出建设“电竞名城”。近年来，杭州连续承办 LPL、KPL、NEST 总决赛及全球电竞领袖峰会，亚运会更将电竞推向国际舞台。到 2024 年，杭州集聚网易雷火、电魂网络等头部企业，拥有电竞俱乐部 10

余家并孵化《黑神话·悟空》等现象级作品。当前，杭州正以“电竞+文旅+数字内容”为抓手，成长为继上海之后的新一极电竞消费中心。

三、我省电竞发展现状与情况对比

（一）广东电竞产业发展核心现状

一是政策体系全面升级，“双核多点”布局成型。2025年5月，广东省印发《关于推动广东电子竞技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构建涵盖七大项18条的专项扶持体系，明确广州、深圳“电竞双核”战略定位，支持珠海、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城市形成“多点支撑”的产业布局，目标2030年前引进2项以上国际顶级赛事，推动广深进入全球电竞影响力城市行列。各地市同步跟进，广州黄埔区出台“游戏电竞高质量发展10条”，东莞发布《关于推动东莞市电子竞技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形成省市联动的政策矩阵。

二是产业规模领跑全国，外设制造优势突出。东莞作为“中国电竞外设之都”，2024年电竞全产业链规模与外设产业规模均突破340亿元，集聚700余家相关企业，覆盖键盘、鼠标等全品类外设，凯华电子研发的机械键盘轴体按键寿命达8000万次，技术水平国际领先。全省层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基础，已形成“研发+制造+赛事+直播”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广州GZG电竞俱乐部“回城”落地后，迅速斩获上海电竞大师赛冠军，成为城市名片级战队。

三是赛事经济初显成效，消费转化潜力释放。2024年东莞电竞嘉年华暨莞港澳台青年电竞交流活动期间，商圈人流

量超 12 万人次，直接带动消费 3000 万元；广州通过引入顶级赛事与本土战队深度绑定，实现“赛事引流—文旅消费”的初步转化，GZG 战队与琶洲试验区合作，计划每年落地不少于 2 场大型赛事、4 场次级赛事，形成常态化办赛机制。用户消费方面，全省电竞用户契合 Z 世代主导特征，付费意愿多元，游戏周边购买、主播打赏、门票消费等占比均超 30%。

四是区域协同加速推进，融合创新初见端倪。广州推动“广府文化+电竞”融合，GZG 战队 Logo 融入羊、木棉红等城市符号，开发粤剧、醒狮元素周边产品，探索“广州制造+电竞竞技”合作模式；东莞依托制造业优势，推动电竞外设与赛事场景深度结合，举办“潮流东莞”系列活动，实现电竞与露营、音乐、动漫的跨界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机制逐步建立，计划通过港澳国际资源优势，推动广东电竞产业国际化跃升。

（二）核心差距

广东电竞产业的核心优势在于政策支持力度大、制造业基础雄厚、消费市场广阔，但短板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赛事 IP 能级不足**，缺乏国际顶级赛事落地和本土头部联赛培育；**二是融合深度不够**，“主场—商圈”“电竞—文旅”联动机制不健全，消费转化链条较短；**三是全产业链协同不足**，上游研发、中游赛事运营与下游直播变现的衔接不够顺畅，与广深“双核”定位匹配的产业生态尚未完全形成。

四、我省依托电竞产业提振消费的建议

（一）强化“双核多点”布局，构建主场—商圈联动新格

局。一是打造标杆性电竞消费载体。支持广州、深圳在核心商圈（如广州琶洲、深圳福田 CBD）新建或改建符合国际赛事标准的专业电竞场馆，推动东莞等“多点”城市依托制造业优势，打造“电竞外设体验中心+商圈”综合体，形成“赛事观赏—装备体验—即时购买”的消费闭环。二是创新“城市战队+商圈”绑定模式。以广州 GZG、深圳本土战队为核心，推动战队总部与商业综合体深度合作，设立“战队主题体验店”，开发融入广府文化、潮汕文化的周边产品；在赛事期间，联动商圈推出“战队应援套餐”“观赛消费券”，将战队粉丝转化为商圈客流。三是培育夜间电竞消费集聚区。结合广东夜经济优势，在广州北京路、深圳南山等商圈设置户外裸眼 3D 观赛大屏，配套电竞主题夜市、剧本杀、电竞酒店等业态；支持珠三角城市在赛事日延长商圈营业时间，推出“观赛+夜宵+住宿”优惠套餐。

（二）构建“顶级+本土”赛事体系，延伸消费周期。一是加速国际顶级赛事落地。建议成立省级电竞赛事引进专项工作组，对接国际电竞联盟，重点引进英雄联盟、DOTA2 等顶级赛事，对落地国际赛事的城市给予最高百万元承办补贴，力争完成“2 项国际顶级赛事”目标；借鉴新加坡旅游局与 BLAST 公司合作模式，将赛事与大湾区旅游推广捆绑。二是培育多层级本土赛事 IP。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电竞联赛”“广东高校电竞嘉年华”等本土品牌赛事，联动各地市形成“省级总决赛+市级预选赛+高校选拔赛”的赛事体系；支持东莞、佛山等城市举办“电竞外设锦标赛”。三是建立赛事消费延伸机

制。将单日赛事扩展为“主题周”活动，联合商圈、景区发放“二次消费券”，延长赛事热度周期。

（三）深化数实融合，打造全链路消费闭环。一是**搭建省级电竞数字服务平台**。整合票务、互动、电商功能，联合开发电竞类统一入口，实现“线上购票—线下入场—装备购买—文旅预订”一站式服务；推出“观赛打卡任务”，构建“线上种草—线下消费—线上反馈”的闭环。二是**强化 AI 与沉浸式技术赋能**。依托广东 AI 产业优势，支持高校与企业联合研发电竞 AI 解说、战术分析工具，推广 AR/VR 观赛技术，在广州琶洲、深圳前海建设元宇宙电竞体验中心。三是**激活线下 IP 变现潜力**。鼓励商圈开设电竞主题快闪店、联名零售店，授权本土企业开发粤剧脸谱电竞鼠标、醒狮造型键盘等特色衍生品；支持电竞俱乐部与广州轻工、双鱼集团等本土企业跨界合作，推出“电竞+老字号”联名产品，拓展线下消费场景。

（四）推动“电竞+”跨界融合，培育消费新增长点。一是**深化电竞与文旅深度融合**。编制《广东电竞文旅融合发展指南》，在赛事环节融入粤剧表演、功夫展示等元素，提升文化辨识度。二是**强化人才支撑与业态创新**。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计划，吸引顶级赛事运营、战队管理人才落户，支持广州体育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开设电竞运营、装备研发等课程，培育本土专业人才；鼓励探索元宇宙电竞、云电竞等新业态，对相关创新项目给予百万元以上的扶持资金。三是**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建立省级电竞产业协调机制，简化赛

事审批流程；制定电竞场馆运营、直播转播等地方标准，规范行业秩序；发挥文创产业基金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电竞内容研发、赛事运营等领域，形成“政策引导+资本赋能+市场运作”的良性循环。

（撰稿人：胡浩钰，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州市重点建设智库——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凤亮，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公开方式：

报 送：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政务信息处

联系人：杨松青 顾逍

电话：020-38632819

华南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

证 明

经济管理学院:

贵院 2025 年 10 月报送的决策咨询报告《中美“对等港口费用”政策对中国造船业的冲击与应对》(华南农业大学咨政建言〔2025〕第 116 期)(作者: 胡浩钰), 获广东省有关部门综合采用。

因采用证明为密件, 不予公开。特此证明!



华南农业大学信息

(咨政建言)

〔2025〕第 116 期

党政办公室、政策研究室、科学研究院

2025 年 10 月 27 日

中美“对等港口费用”政策对中国造船业的 冲击与应对

一、“对等港口费用”政策对中国造船业的冲击与挑战

（一）对造船市场份额和接单量的影响

第一，美国港口费措施直接冲击国际船东在华下单意愿，未来会对中国船企的新接订单与市场领先优势构成实质性下行压力。过去二十年，中国已跃升为全球头号造船国。然而，知名船舶经纪公司克拉克森（Clarksons）的数据显示，**2025 年上半年全球新船订单量同比下降五成以上，其中中国船企新接订单降幅更大，按修正总吨（CGT）约 58%，按载重吨（DWT）约 70%，较全球平均降幅高出约 5~9 个百分点。**表明在行业总体回调的背景下，“建造地口径+到港前缴费/核验”的制度设计，对“中造×美线”资产的边际抑制作用尤为明显。份额层面，**2024 年中国船企一度取得约 70% 的全球新接订单份额，2025 年上半年降至约 52%；**而韩国份额快速回升，欧洲、日本也在若干细分市场取得进展。进一步按船型细分发现，2024 年中国在大型油轮（VLCC 等）订单的全球份额约 71.7%，2025 年上半年回落至 21.2%；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LNG）方面，上半年新增 8 艘全部由韩国船企承接。综合判断，“对等港口费用”政策正在强化全球造船竞争格局的结构性调整：一方面，对美暴露度高、价值密度高的船型容易出现订单向非中造承接地重配；另一方面，

中国在非美暴露或区域化运营的船型上仍有明显的交付效率与方案性价比优势。总体而言，相关措施在削弱中国船企新增份额与增量动能的同时，阶段性抬升了韩国与个别欧洲、日本船企的承接概率与填补速度，这一变化值得在后续的结构竞争策略与产能布局中持续跟踪与应对。

第二，当前“存量高位—增量放缓”的剪刀差正在抬升未来产能利用率的不确定性。现阶段中国造船业呈现出存量稳、增量弱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船企手持订单量仍同比增长约 32%**，头部船企排产已延伸至 2029 年以后，切实保障了未来数年的交付能见度，短期完工量与产线节奏基本不受冲击。另一方面，自 2025 年以来，全球新造船询单与签约意向明显降温；在美方港口服务费等政策扰动与合规不确定性前置的共同作用下，船东观望情绪抬升，部分海外客户重新评估在华下单的费用—合规—部署组合风险，旨在规避未来不确定开支。若该趋势延续下去，中国造船业会面临一个“强存量×弱增量”的过渡期。具体来看，其一，随着现有在手项目逐步转入 2026—2027 年的集中交付窗口，**新增订单减速在产能利用率上体现为边际走弱**；其二，产品结构与毛利结构存在“由高向中”的被动迁移风险——若对美暴露度高、价值密度高的船型新增放慢，而非美暴露或成本敏感型船型占比上升，则平均单船价值与综合毛利可能承压；其三，合规工程与交付复杂度因“对美版/非美版”的双版本配置成为常态而持续抬升，前端非制造成本与跨系统对接成本随之增加。放眼长期，尽管依托完整的本土供应链与

绿色—数字—智能技术迭代优势，中国在全球造船“三足鼎立”格局中的基本盘不会动摇，但在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滚装汽车运输船、超大型箱船等高端赛道，随着订单“下单地—部署地—合规口径”的再匹配趋势已经显性化，追赶节奏可能出现阶段性放慢。

（二）对中美航线布局和港口贸易结构的影响

中美互征港口费的政策落地，迫使航运企业系统性重估“航线—船队—资产属性”的匹配关系，并可能对双边航运版图产生持续性重塑。首先，在美线暴露度高的中资承运人将首当其冲。按照航运研究机构 Alphaliner 的测算，新政预计在 2026 年为全球前十大班轮公司合计带来约 32 亿美元的新增运营成本，其中中远海运集团的成本增量约为 15.3 亿美元，占比接近一半，意味着其在中美主干线上将承受显著且持续的现金流压力。有分析报告指出，在港口费全面施行并常态化计收的情景下，中远海运每年的新增支出占其现有运营成本的比例可能接近 50%——该假设虽取决于运力组合、靠泊次数与费用口径，但足以说明成本曲线的陡峭化特征。为此，相关企业已启动船队优化与网络重构：一方面，有组织地将约 20 艘中国建造的大型集装箱船自美西航线转投亚欧主干线或其他非美暴露网络，以降低“中造×美港”组合触发收费的频率；另一方面，以期租/长租方式引入韩国建造船舶执行中美航线，通过资产属性替换实现合规成本的外部化与分散化。

在价格策略上，部分承运人还尝试通过运价附加费机制向市场转嫁部分新增成本——例如对上海—洛杉矶航线征收每箱约 1,000 美元的附加费。然而，受全球运力阶段性富余与需求回落的掣肘，多数班轮公司在提价节奏与幅度上保持审慎，以避免价格一份额的恶性循环，所以常见做法是内部消化成本与精细化调度。换言之，即通过缩短靠港清单、合并挂靠、优化航速与空箱回流来降低单位费用，辅以“对美版/非美版”的资产配置和航线版本化管理以提升弹性。总体来看，成本端的制度性抬升正在倒逼航运企业从“单航线优化”转向“全网络与全资产维度的再配置”，其结果不仅是短期的运力替换与班期微调，更可能在中期重塑中美之间的运价形成机制、靠泊结构与船型组合。对头部中资承运人而言，核心挑战是如何在合规框架内保住干线网络的服务完整性与客户黏性，同时通过资产属性多元化、合同条款（政府征费附加条款）前置化与精算化靠泊策略，把制度性成本的边际冲击控制在可承受区间内。

其次，航线挂靠和港口选择正在出现调整迹象。按照美方现行口径，相关费用对单艘船实行“按航次、在首次靠美港征收，且每船每财年最多计费 5 次”的次数约束。出于对“次数上限×首次靠泊”的精算管理，中资班轮公司正倾向于降低具中资/中造属性船舶直靠美国港口的频次，而是通过第三国中转、合并挂靠等举措来降低触发收费频率。来自德迅（Kuehne+Nagel）的市场跟踪数据也显示，实际受影响的在美靠泊中造/中资船舶数量低于先前预期：多数承运人已通

过机队置换与网络微调来“去暴露”，包括将中国建造或中资拥有/运营的船舶撤出中美干线，改由第三国建造且非中资拥有/运营的运力执行。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单纯“换旗”不足以规避对“由中国实体拥有或运营”的认定，毕竟“建造地”更是随船终身的不可变属性，因此市场更常见的是通过期租/长租引入非中造船舶实现资产属性替换，并非简单依赖国旗变更。上述调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中美直航比例阶段性下降，经加拿大、墨西哥等第三国枢纽（如温哥华、普林斯鲁珀特等）转运后再入美的绕行与海铁联运比重上升；同时，班期设计、箱流组织与堆存周转的复杂度增加，隐性成本与时效扰动风险相应放大。对此，美国监管与政策层陆续关注到潜在的“规则套利”路径，围绕对经邻国中转后入境的美国货流施加等效费用等方案出现了讨论与倡议，但相关适用范围与合规边界仍在博弈之中，法律与操作可行性尚待评估。总体判断，短期内企业将继续依赖“次数管理+资产替换+中转方案”的组合来降低触费频率；在中期，若反规避条款进一步收紧，网络再配置与合规协同的长期成本曲线仍将继续抬升。

最后，航线配置与港口分工被动重构，正在对既有港口—贸易结构产生再分配效应。在“按航次、首靠即征、年度次数上限”的费用约束下，承运人为最小化触费概率不断优化挂靠组合与网络节点，客观上削弱了部分港口在原有干线体系中的枢纽地位与货源黏性。在中国沿海，出于降低费用暴露的考虑，涉美属性较强的邮轮与班轮已开始调整靠泊计

划。例如，美国豪华邮轮“里维埃拉号”在政策生效后两日临时取消上海靠泊、改赴釜山，据业内测算意在规避约 117 万元人民币的“船舶特别港务费”，引发旅客维权与舆情波动。此类事件揭示出旅游邮轮与高价值班轮靠泊对费用与不确定性高度敏感，所以旅游型母港与集装箱枢纽港或将出现边际外流，从而对旅客消费、船供、岸电/引航、拖轮与堆存等港口服务收入形成负向冲击。与之对称，在美国一侧，受中资承运人收缩在美投放运力与“中造×美港”组合主动规避影响，美西港口也将面临部分亚洲货源流失风险。有机构测算，2024 年约 13%的中资远洋船舶曾挂靠美国港口，若新收费在主要航线形成 5%~8%的系统性加价，并通过附加费传导至货主，边际贸易量可能弹性下滑，带动美国相关港口的吞吐量、周转效率与码头就业承压。鉴于洛杉矶—长滩在前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中已出现货运回落，新一轮“港口费—合规”博弈大概率进一步重塑亚太—北美网络的枢纽—支线格局：一方面，直航比例下降、经第三国转关上升；另一方面，釜山、新加坡、温哥华等具备枢纽能力与腹地通达性的替代节点将获得中转与海铁联运的增量份额。整体而言，费用—不确定性—时效三重约束正在促使货主与承运人以“综合物流成本”而非“航程最短”为目标函数重新选择港口与通道，既有港口层级的相对位序与功能分工因此进入动态再平衡阶段。

（三）对造船企业运营成本和法律合规负担的影响

“对等港口费用”政策不仅影响市场订单，还在成本—合规—履约链条上传导，对中国造船企业形成系统性压力。一方面，随着订单获取与履约环节的边际成本上升、利润空间被迫压缩。由于美国政策使得中资船东和部分国际船东对在华造船持观望态度，中国船企为争取新订单可能需要让利优惠或提供更灵活的交付安排，被迫压缩利润空间。同时，订单流失导致的产能利用率下降也将摊薄固定成本。若美国进一步对中国船舶征收进口关税或限制关键设备出口，造船企业在材料采购和供应链上还会面临额外成本。尽管中国大型造船集团目前订单饱满，短期内能够维持盈利，但中小造船企业容易更快感受到接单量不足和资金流压力，上游配套厂商面临的局势同样变得艰难。总体而言，美方措施增加了中国造船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中方船企不得不预留风险成本，以便稳妥应对潜在的订单变更与贸易摩擦引发的经营波动。

另一方面，法律合规负担加重现象更为突出。面对美方的精确打击，中国造船和航运企业纷纷加强合规应对与法律防范，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审查和制度建设。一方面，造船企业需要严格评估自身业务是否涉及美国法规管辖范围。例如，生产环节是否使用美国的关键零部件或技术，以及交付的船舶是否可能触发美国制裁或费用。企业开始定期进行出口管制合规审查，避免出现因无意违规而遭受美方重罚的前车之鉴。为此，不少中国船企成立或扩充了专业的合规管理部门，聘请法律顾问解读海外政策，制定内部合规手册和培训流程。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积极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具体地，在政府牵头下，行业协会和骨干企业联合欧盟、日韩等利益方准备在 WTO 对美方措施提起合规性诉讼，质疑其歧视性质；中国船东协会倡议成立“国际航运公平联盟”，联合全球 20 多家主要船东共同抵制单边限制措施。这些法律和国际游说行动需要企业投入人力物力协同配合，同样增加了隐性成本。此外，中国船企还需格外留意美国随时出台的追加措施（如限制供应美国零部件的岸桥、征收新关税等），提前制定科学可行预案。

二、“对等港口费用”政策对中国造船业冲击的应对举措

（一）政策层面

中国政府应该持续牵头推进，形成政策合力，与利益相关方共同携手应对外部冲击。一是**推进多边谈判与诉讼机制**。中国政府应充分利用 WTO 框架和国际多边场合，与欧盟、日本、韩国等航运造船大国协调立场，对美方单边收费措施提起争端解决程序。通过多边压力，争取美方撤销或调整不当收费，避免将双边矛盾长期化、制度化。在国际海事组织（IMO）等平台上，中方也倡议制定港口费争端应对机制或准则，强调航运应遵循非歧视和互惠原则，遏制此类单边行动蔓延。二是**完善中美双边磋商渠道，寻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例如，可探讨中美在航运补贴透明度、造船产能合作等方面开展对话，尽可能消除美方疑虑，为取消港口费创造有利条件。

三是完善国内反制和支持政策。2025 年 9 月修订生效的《中国国际海运条例》已增设反制条款，授权政府可对歧视性举措采取对等收费、港口限制等措施。这一法律基础目前亟待细化配套安排，确保一旦美方加码，中国可迅速升级反制方案（如提高费率、限制美籍船舶进出港口等）以增加其违约成本。此外，针对国内航运造船企业因港口费政策受到的冲击，政府有必要考虑设立专项支持机制。一方面，对承担额外费用的航运企业给予阶段性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帮助其平稳运营；对造船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和出口信用保险优惠，鼓励多元市场开拓。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还应加强政策沟通，指导企业用好用活已修订条例赋予的权利，同时广泛收集行业诉求，在国际谈判中充分维护企业权益。

（二）企业层面

在企业层面，中国航运与造船企业需要主动调整战略，提升自身韧性，化危为机。一是**优化市场布局，降低对美依赖**。面对美国航运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应加快开拓“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等多元市场。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航运需求增速放缓，而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区贸易活跃度提高。造船企业可着力挖掘这些地区的船东客户，深耕非美市场以弥补美国订单下滑的缺口。航运公司则可适时调整航线网络，提升欧亚、亚非等航线运力投入，避免营收过度依赖美线。事实证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的部分，能够很快被对东盟等其他市场的增长所弥补。因此，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可有效分散政策风险，促使企业在任何单一国家施

压下都有替代空间。二是**加快绿色智能转型，提升差异化竞争力**。美国瞄准中国高端造船领域发难，倒逼行业加速创新升级。中国船企应该顺势而为，加大在绿色环保、高技术船型上的研发投入，巩固领先优势，增强长期抗风险能力。例如，进一步攻关 LNG 动力、氨燃料动力等绿色船舶技术，以及无人船、数字化造船等智能化方向。当前中国在新能源船舶订单中份额依然领先（2025 年上半年中国承接全球绿色动力新船订单 61.8%）。企业应努力维系此类优势，通过技术进一步降低建造成本，提高产品不可替代性。一旦中国造船在关键领域实现自主突破、不再受制于人，美国的遏制手段将难以奏效。此外，航运企业还应顺应国际减排趋势的需要，加速船队升级，订造更加高效节能的船舶，以新船替换老旧船队，提高整体竞争力和利润率。三是**强化法务合规体系，构筑国际经营“防火墙”**。企业务必高度重视合规运营，在国际业务中坚持“两手抓”理念：一手抓内部合规防控，另一手抓外部维权合作。具体而言，内部要建立合规审查制度，定期评估业务环节是否触及美国出口管制、制裁清单等红线，及时调整原料采购和技术来源，必要时采用国产替代或非美组件，避免陷入制裁陷阱。对于新增订单，尤其美国船东或涉及赴美航线的项目，法律团队应预先介入审阅合同条款，明确费用责任和不可抗力情形，切实将政策风险降至最低。外部方面，积极参与行业联盟和法律行动，联合其他受影响企业共同向有关当局陈情施压，依法抗辩美方不合理措施。

在政府指导下，企业可收集损失证据，为 WTO 诉讼和后续谈判提供扎实支撑。

（撰稿人：胡浩钰，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报告系 202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504094）、
2024 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GD24YSH01）
的阶段性成果）

报 送：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政务信息处

联系人：杨松青 顾逍 电话：020-38632819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内部文件 妥善保管 不得外传 不得公开发布)

证 明

华南农业大学:

贵校报送的决策咨询报告《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力“百千万工程”》(作者:罗明忠、杨怡、胡浩钰、黄伟婷、陈佑铭),已在《南方智库专报》(第1618期,2025年9月18日)刊发上报广东省领导,获得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胡劲军同志批示。

特此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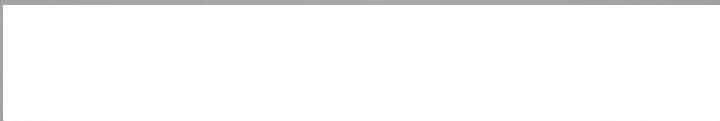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5年11月6日
收文: 1448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领导批示办理表

紧急程度: 密级: 收文编号: 202524129

来文单位	省社科联	收文日期	2025-11-04	办文编号	建设〔2025〕1783号
来文标题	张少康同志在《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力“百千万工程”的建议》上的批示				



办理意见:



创新理论的“思想库” 决策咨询的“智囊团”

南方智库专报

(第 1618 期)

2025 年 9 月 18 日 广东省社科联 签发人 李宜航

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助力“百千万工程”的建议 ——“为广东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策”(十五) 罗明忠、杨怡、胡浩钰等

提要：课题组调研发现，试点县（市、区）系统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但当前仍面临“政策配套不完善、融资渠道狭窄、村民参与性不高、产业基础支撑薄弱”四大堵点，亟须各级部门加强高位推动，拓宽资金渠道，激活内生动力，全面助推乡村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1

创新理论的“思想库”

决策咨询的“智囊团”

南方智库专报

(第 1618 期)

2025 年 9 月 18 日

广东省社科联

签发人 李宜航

领导批示：

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助力“百千万工程”的建议
——“为广东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策”（十五）
罗明忠、杨怡、胡浩钰等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自 2024 年 7 月以来，华南农业大学课题组持续对广州、佛山、江门、茂名、清远和揭阳等地的整治实践开展跟踪调查。调研发现，各试点县（市、区）系统推进整治工作，有效破解了“地碎、村乱、业弱、设施差”等长期制约农村发展的难题，逐步形成了以“规划引领、制度创新、社会参与”为特点的“广东经验”。然而，当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仍面临“政策配套不完善、融资渠道狭窄、村民参与性不高、产业基础支撑薄弱”等四大堵点，亟须各级部门加强高位推动，拓宽资金渠道，激活内生动力，全面助推乡村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广东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六大”做法

（一）重构空间格局，规划引领系统治理 从化区构建“规划分区—示范片区—整

治项目”层层传导的整治体系，显著提升了城乡环境治理效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与生态效益。**南海区**“强集中”布局农业空间，“强管控”保障产业空间，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集约高效和产业体系升级。**高州市**构建“全域规划—片区策划—实施方案—年度计划”的整治规划实施体系，实现了城乡治理目标的逐层分解与精准落地，推动了全域人居环境与综合发展的持续优化。**黄埔区**通过城乡土地资源有序有效流动和高效集约配置，打造了“良田连片、产业集聚、村庄集中、生态优美”的土地保护利用新格局。

（二）重建制度体系，集成改革激发活力

坚持体制机制集成创新，创新性推出“指标池”“地券”“房券”“绿券”等制度，逐步形成政策闭环。**从化区**推进跨区域协同治理、跨镇街连片整治，激活配优各类资源要素，加快从化全区资源要素流通。**南海区**

创新构建了“1+4+4”政策体系，以地券、房券、绿券、金券为核心，聚焦利益平衡。普宁市形成“市级统筹、镇级实施、部门联动”格局。其中，双枝山村安居楼创新“村民自筹+村集体筹资+企业垫资”模式，配套设施预计可使村集体年收入增加 300 万元。

（三）重塑连片农地，规模经营提质增效

南海区通过农业用地入市管控等措施，将 1000 多个零散租户整合成 50 多个优质企业，建成 10 个千亩现代农业产业园。黄埔区整治后耕地集中连片度提升 10.12%。新会区大鳌镇恢复耕地种植水稻 1461.86 亩，新增耕地约 868.63 亩。普宁市赤岗镇打造“千亩方”耕地集中整治区，通过“田长制”强化耕地监管，为“百千万工程”提供空间与要素支撑。高州市打造“万亩方”集中连片耕地整治区，提升耕地质量与利用效率。佛冈县水头镇利用农业空间规模增效+科技赋

能打造“2个千亩方+5个百亩方”高标准农田。

（四）重整产业集群，融合发展增强动能

从化区鳌头镇整合土地资源引入规模化现代农业企业，搭建“国企+民企+农户”合作框架，发展主粮种植、休闲观光、种子研发等多业态农业，为一二三产融合提供现实例证。黄埔区迳下村依托“政府+村社+国企+金融机构”协同机制，拆旧建新压减农房至282栋，释放2.15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南海区通过“拆旧拓新”“筑巢引凤”整合大量产业空间，为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空间利用效率提供了一条新路径。高州市曹江镇盘活旧粮管所等低效用地，引入高凉菜博物馆、农产品加工企业，打造“高凉墟”产业节点；根子镇柏桥强村公司通过荔枝文创、研学旅游，带动村集体、村民增收。

（五）重生绿美环境，生态优先协同发展

黄浦区探索“生态修复+产业导入”融合模式，构建“生态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四级公园体系，有效促进了区域生态环境改善与绿色产业协同发展。南海区以丹灶镇金沙岛湿地公园为试点探索生态价值（GEP）核算，金沙岛生态产品总值较整治前增加了48亿元，增幅达40%。新会区通过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绿美保护地建设等“六大行动”，在银湖湾及主要流域构建以落羽杉为骨干的绿色水岸，推动形成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多元共赢。高州市推动生态人文融合，大力开展生态修复，打造美丽景观，实现了自然环境显著改善、历史文脉有效传承与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佛冈县汤塘镇、水头镇、龙山镇三地协同推进生态治理与历史文化保护，筑牢区域生态屏障，通过系统实施环境修复、强化文化资源整合、共建区域生态网络，显

著提升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与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普宁市**以练江流域整治为核心，有效解决了工业污染问题，并通过开展白坑湖（银湖）生态修复，带动了周边大片耕地复耕复种，形成了生态修复与农业复产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六）重组多元资源，共建共享实现共赢

从化区构建“政府统筹+国企主导+多方协同”机制凝聚合力，建立“基础补偿+激励补偿”机制保障农户权益，推动项目区村集体年增收 15 万元以上、村民年收入增长 10-20%，带动就业 256 人。**黄埔区**凝聚政府、国企、社会资本多方合力，带动迳下村集体资产从 3492 万元增至 2.9 亿元，创造就业岗位 700 余个。**南海区**凝聚各方合力，以财政资金撬动 270 亿元社会资金参与，累计争取到 846 亿元各类资金用于支持全域整治项目。**新会区大鳌镇**以“村民自筹+村集体筹

资+企业垫资”模式建设安居楼。高州市泗水镇探索“国企+强村公司+农户”新模式，整合全村资源，重点打造了33家庭院经济户。滩底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为5.2万元。佛冈县实行“腾笼换鸟+链式”发展，盘活利用水头镇旧卫生院、低效空置厂房用地，引进社会资本打造商业综合体东汇广场、魔芋食品加工产业园等。

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广东经验见雏形

（一）规划引领，顶层设计与差异化整治并重

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划分农业、生态、城镇、产业等功能区域，实现规划从顶层设计到具体项目落地的全链条贯通。突出表现：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区域特色的规划体系；探索差异化模式，避免“千镇一面”的整治路径。例如，佛冈县采用“摸、落、谋、统、优、探”六字工作法，建立问题、

需求、项目清单闭环管理机制，将整治实施方案与镇村国土空间集成规划深度衔接。

（二）制度创新，激发土地综合整治内生动力

构建“指标流转、资金反哺”“盘活存量、引入增量”“放权赋能、高效监管”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激发了政府、市场、集体和农民等多元主体参与整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主要是：破解指标流转壁垒，建立跨区域资源统筹机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农村土地资产活力；优化项目审批监管，提升治理效能。

（三）多措并举，多元拓宽整治资金来源渠道

创新投融资机制，构建了“财政引导、金融支持、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可持续资金保障体系。新会区三江镇通过“镇国资+

村经联社”设立强村公司吸纳社会资金，形成“财政+专项债+社会资本+政策性信贷”协同资金体系。黄埔区迳下村组建“政府+村社+国企+金融机构”协同团队，推动拆旧建新与产业导入，通过增减挂钩腾退建设用地 37.32 公顷，导入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等产业，达产后年产值 17.8 亿元。高州市首创“F+EPC+O”模式，整合财政资金，形成“政策性金融+专项债+社会资本+集体自营收益”的多元筹资路径。

（四）社会参与，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合作共赢

依托“三资云”平台规范农村集体资产交易与监管，形成“政府得发展空间、企业得产业载体、村集体得增收渠道、村民得实惠”的共赢格局。从化区在编制试点实施方案前，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准备工作。各地鼓励农民以土地经营权、闲置宅基地使用权、

资金等入股合作社或项目公司，获得长期稳定的分红收益，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和“所有者”。高州市泗水镇滩底村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微改造、精提升”将特色荔枝文化、岭南风格融入农房风貌；建立完善“强村公司+农户”运营管理机制，激发群众首创精神，打造既有文化味，也有烟火气的特色庭院经济，走出一条“小规模、大群体，小商业、大产业”的乡村经济共富路。

（五）因地制宜，推动示范建设打造崭新样板

从化区以“生态优先”筑牢“湾区屏障”，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深度融合生态修复和产业发展。南海区以“集约高效”破题“发展空间”。推动“三旧”改造升级，赋能产业新空间；强化城乡融合治理，重塑空间价值；着力政策机制创新，激活存

量资源。普宁市以“产业联动”破解“人地矛盾”。通过“农业+”模式激活乡村价值；通过集约宅基地，保障发展用地；发挥社会力量，坚持共建共治共享。高州市以“整田赋能”做强“现代农业”。通过“特色引领”，打造农业产业矩阵；衔接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新农村。新会区以“土地增值”点亮“侨乡文化”。通过“一块皮”（陈皮）带动“万亩田”；坚持侨乡风貌保护与活化。佛冈县以“城乡融合”探索“广清一体化”。将“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推动产业协同布局，承接功能转移。

三、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面临的堵点

（一）政策约束：相关政策不配套，联农带农力量薄弱

一是部分地块用途调整与原有规划存在冲突。特别是整治项目涉及的土地调整、指标使用与“三块地”改革的配套政策（如

入市规则、收益分配细则、抵押融资办法) 仍需进一步衔接和细化。**二是**现行政策对补充耕地、增减挂钩类项目债券支持存在政策壁垒, 缺乏明确的增减挂钩跨县域交易收益分配机制、增减挂钩(拆旧复垦) 归还指标实施路径, 以及实施主体、监管主体责任不明确, 不同部门间协同机制不明晰。**三是**由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调整永久基本农田的审批层级高、流程长, 目前尚未明确处理机制, 对实地为非耕地的高标准农田, 农业农村部门依旧按照耕地标准严格管控, 不允许审批设施农业用地, 调整永久基本农田效率总体偏慢。

(二) 融资受限: 投融资机制不健全, 资金筹措有难度

一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减挂钩指标交易产生的收益, 如何在国家、集体、成员个人之间公平合理分配, 缺乏完善的收

益分配机制。而且整治项目总投资大，社会资本引入存在不确定性，部分项目（如生态修复、未来社区基础设施）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资金平衡压力大，后续运营维护资金保障机制需完善。二是整治项目统筹涉农资金科目多、额度少且不集中，各部门拨付时间不统一，管理和使用范围限制严格，统筹难度大。且受限于土地指标交易范围有限、项目收益周期长、风险补偿机制缺失，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不足。三是整治周期通常为3-5年，受制于“抵押品不足”，银行贷款期限多为3年以内，贷款难。部分整治项目主要依赖指标交易收益和政策补贴，项目综合内部收益率较低，社会资本吸引力不足。

（三）土地撂荒：土地流转困难，村民参与积极性较低

一是土地整治中涉及到土地权属的调整和变更，历史遗留问题多，部分土地权属

存在争议，部分地块（尤其涉及低效闲置、拟入市地块）的权属关系复杂，给整治工作带来困难。**二是**部分整治项目与农民利益的关联度不够紧密，村民认识上“脱实向虚”，对整治政策的知晓率低，一些村民担心土地整治会影响自己的利益，存在抵触情绪，给项目的推进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三是**部分全整治项目因地块长期撂荒、权属界限模糊，导致测量和青苗清点效率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盘活利用等改革措施在实操层面，仍面临产权界定、收益分配、抵押融资等配套政策不完善的问题。**四是**项目涉及农户众多，部分租地协议未签、补偿未落实；现有补偿标准偏低，加之村庄建设用地不足，难以满足村民需求，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前期工作推进缓慢。

（四）产业空心：基础支撑弱，村民集体收入增速慢

一是部分土地整治项目产业导入相对滞后，无法保障项目后期的用地保障。部分项目面临市场波动、企业履约能力等问题，导致产业链、康养旅游等项目的市场培育和风险防控能力弱。一些整治后的土地仍然处于闲置或低效利用状态，未能吸引优质产业项目落地。二是部分整治项目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利益联结松散，导致项目“建而不用、用而不活”。部分地区将整治等同于“拆旧建新”“土地归并”，忽视产业培育，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三是部分地区盲目跟风发展乡村旅游，但因缺乏文化挖掘、交通配套不足，游客量未达预期，可能导致项目烂尾。

四、进一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对策

（一）高位驱动，推出政策“组合拳”

一是深化规划协同与审批改革，加强多规合一动态衔接。完善政策配套文件，建立

针对全域整治项目的绿色审批通道，探索容缺受理、并联审批，破解规划落地瓶颈。二是强化土地要素支撑保障，深化土地配套政策落地。严格落实“先安置后拆旧”“先建后拆”，探索建设用地周转规模使用及后续增减挂钩（拆旧复垦）规模归还管理的配套细则和实施办法。探索建立非耕高标准农田动态调整机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土地权属问题。

（二）广开门路，创新资金筹集体系

一是拓宽资金渠道，整合涉农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用好国家政策性金融工具，探索与社会资本合作的 PPP 模式，加大专项债申报力度。二是鼓励多元化融资与合作，探索利益平衡机制。完善各主体利益平衡链条，创新开展股权投资，探索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多元发展模式。建立跨乡镇“区域+项目”资金平衡机制，建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互助基金。充分利用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形成的地理信息、土壤信息、生态数据，脱敏后形成数字资产，探索数据变现途径。**三是**加强对融资渠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营造良好的项目运营环境。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标准规范体系，制定差异化的验收、考核和评估标准。严格落实“全过程监督”，强化数据共享。

（三）精准施策，保障不同主体利益诉求

一是探索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积极引导金融机构、社会资本、村集体等多方参与。鼓励集体资产集约经营，鼓励集体经济组织主动参与改造提升。**二是**深化不同主体地位。推广“村集体持股”合作模式，建立“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利益联结机制，确保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三是**厘清村民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认识。统一思想，宣传动员，讲清“大道理”和“小算盘”。帮村民算清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后的经济账、环境账、家庭账。建立“共商共建共治”流程，健全“一事一议”机制，成立“矛盾调解小组”，及时化解整治过程中出现的土地权属、邻里边界等纠纷。

（四）因地制宜，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规划先行，产业引领。加强产业导入规划与实施，有序引导宅基地复垦，重点发展维护成本较低的产业。探索“生态补偿+产业反哺”双轨制。**二是要素整合**，资金保障。围绕“一村一品”，延长农业全产业链。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采用 EOD（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PPP 等模式，解决资金难题。**三是数字赋能，智慧管理**。利用“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技术，实现智能监测全覆盖。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赋能决策。强化科技与人才支撑，深化数字管理平台应用，引进和培育熟悉土整政策、乡村规

划、产业运营、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责任编辑 李静）

【撰稿人：罗明忠，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试验室振兴执行主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教授。杨怡，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胡浩钰，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首聘副教授。黄伟婷，华南农业大学硕士生。本科生陈佑铭参与调研。本报告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112）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支持**】**

（联系人：李静 联系电话：020—37277397 13570707118）

报：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四套班子领导

送：各地级以上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学术研究》杂志社 承办